

中国民主季刊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2026年01月 第1期 卷4
VOL. 4 NO. 1 JAN. 2026

中国与民主资本主义体系：第四次产业革命
中的制度竞争

许成钢 / 王天成

变化如何可能？中国的公民社会与政治机遇

亚当·金 / 李聿脩

知识分子与反抗的共同体

陈健民 胡平 吕频 张艾枚 陈奎德 吴强

文革思维：从苏区反 AB 团和延安整风到平
定土改和文革（上）

郝志东

台湾的精英和解

约翰·希格雷 黄东益 林泽民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INSTITUTE FOR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中国民主季刊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主编 Chief Editor

王天成 Wang Tiancheng

编辑 Associate Editor

余浩风 Yu Haofeng

运营协调 Operational Coordinator

芮朝怀 Rui Zhaohuai

社交媒体管理 Social Media Manager

张杰 Zhang Jie

技术、推广总监 Tech & Promotion Director

杨子立 Yang Zili

主办、出版 Organization & Publisher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Institute for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电邮 Email: cjd@chinademocrats.org

网址 Website: <https://chinademocrats.org/>

电子版刊号 ISSN (electronic): 2996-2420

印刷版刊号 ISSN (print): 2996-2412

CC BY-NC-ND 开放资源

不得修改和用于商业目的

转载须注明作者、出自本刊



国际顾问委员会 (International Board of Advisors)

白夏 Jean-Philippe Béja	盖思德 Roger Garside	苏晓康 Xiaokang Su
陈健民 Kinman Chan	郝志东 Zhidong Hao	王飞凌 Feiling Wang
陈奎德 Kuidé Chen	何包钢 Baogang He	文贯中 Guanzhong James Wen
陈志柔 Chih-Jou Jay Chen	胡平 Ping Hu	吴国光 Guoguang Wu
郭丹青 Donald Clarke	许田波 Victoria Hui	吴介民 Jieh-min Wu
孔杰荣 Jerome Cohen	林培瑞 Perry Link	许成钢 Chenggang Xu
戴大为 Michael Davis	黎安友 Andrew Nathan	杨凤岗 Fenggang Yang
戴雅门 Larry Diamond	夏伟 Orville Schell	张伦 Lun Zhang

国际编辑委员会 (International Editorial Board)

阿古智子 Tomoko Ako	廖雨诗 Yushih Liao	曾建元 Chien-Yuan Tseng
蔡霞 Xia Cai	李西潭 Yeau-tarn Lee	王兴中 Hsing-Chung Wang
陈杰 Jie Chen	李思磐 Sipan Li	王柯 Ke Wang
陈育国 Yuguo Chen	罗世宏 Shih-hung Lo	吴玉婷 Andrea Worden
程映虹 Yinghong Cheng	艾华 Eva Pils	吴强 Qiang Wu
冯崇义 Chongyi Feng	任思梅 Johanna Ransmeier	夏明 Ming Xia
马思中 Magnus Fiskesjö	石小琳 Katrin Kinzelbach	许秀中 Vicky Xu
柯蕾 Chloe Froissart	古思亭 Kristin Shi-Kupfer	叶耀元 Yao-Yuan Yeh
何晓清 Rowena He	艾美丽·庞 Amelia Pang	张崑 Kun Zhang
郭汤姆 Thomas Kellogg	贡嘎扎西 Kunga Tashi	赵荔 Li Zhao
卓玛加 Dolma Kyab	楚克斯 Rory Truex	

目录

访谈

8 · 中国与民主资本主义体系：第四次产业革命中的制度竞争

许成钢 / 王天成

32 · 变化如何可能？中国的公民社会与政治机遇

亚当·金 / 李聿脩

50 · “人们希望一切都能改变”

侯芒明 / 张崑

笔谈

72 · 知识分子与反抗的共同体

陈健民 / 胡平 / 吕频 / 张艾枚 / 陈奎德 / 吴强

透视中国

88 · 文革思维：从苏区反 AB 团和延安整风到平定土改和文革（上）

郝志东

108 · 极权主义及其形成机制的心理暗流——一种新定义与分析视角

徐贲

126 · 低人权优势的化解之法——与秦晖先生商榷

文贯中

民主转型

144 · 台湾的精英和解

约翰·希格雷 / 黄东益 / 林泽民

徐行健 译 / 王天成 审校

制度设计

166 · 全球视野下的政治筹资

迈克尔·平托·杜辛斯基

言晓义 译 / 余浩风 审校

读书

192 · 社会运动与知识分子互相创造

192 · 评博佐基《匈牙利滚动式转型与知识分子角色》

李聿脩

简记

200 · 全球民主人权事件

弥正平

208 · 英文摘要 ABSTRACTS IN ENGLISH

216 · 《中国民主季刊》征稿启事

217 · 《中国民主季刊》订阅方式

◎ 致谢: 黄奕信为本期所有画作作者

Contents

8. INTERVIEWS

China and the Democratic Capitalist System: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enggang Xu / Tiancheng Wang

32. How Is Change Possible?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in China

Adam King / Yuxiu Li

50. “People Hope That Everything Can Change”

Marie Holzman / Kun Zhang

CONVERSATION

72.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mmunity of Resistance

Kinman Chan, Ping Hu, Pin Lü, Aimei Zhang, Kuide Chen, and Qiang Wu

POLITICS & SOCIETY

88. Cultural Revolution Thinking: From the Anti-AB League Campaign and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to Land Refor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art I)

Zhidong Hao

108. Totalitarianism and the Psychological Undercurrents of Its Formation Mechanisms: A New Definition and Analytical Perspective

Ben Xu

12. How to Resolve the “Low Human Rights Advantage”: A Discussion with Mr. Hui Qin

Guanzhong James Wen

144. DEMOCRATIC TRANSITION

Elite Settlements in Taiwan

John Higley , Tong-yi Huang , and Tse-min Lin

Translated by Xingjian Xu

166. INSTITUTIONAL DESIGN

Financing Politics: A Global View

Michael Pinto-Duschinsky

Translated by Xiaoyi Yan

192. BOOK REVIEW

Social Movements and Intellectuals as Mutual Creators:

On Bozóki's Rolling Transition and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Yuxiu Li

200. NOTES

Global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Events

Zhengping Mi

208. ABSTRACTS IN ENGLISH

216. Call for Submissions

217. How to Subscribe

◎ All artwork in this issue by Yixin Huang

访谈

许成钢
王天成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1期
2026年0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中国与民主资本 主义体系：第四 次产业革命中的 制度竞争



许成钢



王天成

编按：“产业革命本身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它是一种社会现象，需要整个社会制度做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民主资本主义制度”，重要的华人经济学家、斯坦福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钢教授说。为什么迄今的历次产业革命都首先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产业革命的发生？中国是否会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再次落后？这次正在兴起的产业革命可能会带来哪些社会问题？与民主资本主义相比，极权主义体系在应对这些社会问题时是否会处于劣势？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对许成钢教授做了这个深度访谈。许成钢教授著述丰富，最新著作是2025年出版的、包括中文英文两个版本的《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

王天成（以下简称“王”）：许教授，首先祝贺您的《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出版后迅速引起广泛的反响，并感谢您接受这次访谈。今天我们主要讨论民主资本主义与产业革命的关系，中国是否会在正在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落后。

在过去近 300 年中，人类历经了三次产业革命，现在第四次革命已揭开序幕。第一次产业革命始于 18 世纪中叶，蒸汽机的发明开启了机械动力时代；第二次始于 19 世纪下半叶后期，以电、钢铁、化学、原油等方面的技术发明、进步为标志；第三次始于二战后，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空间技术、生物工程等为关键特征，也称“信息技术革命”、“数据革命”。正在开端的第四次革命，由 AI 即人工智能驱动，虽然并不限于人工智能。

为什么这四次产业革命都首先发生在西方？您认为根本的原因在制度，产业革命并非一种纯技术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们是民主资本主义的产物，为什么？民主资本主义是否等于民主加资本主义？

许成钢（以下简称“许”）：实际上，历次产业革命都产生在美国英国，这是历史事实，而不是理论的结论或者推论。首次产业革命是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产生的。英国的“光荣革命”建立了一个——用今天的用语——叫做“民主资本主义”的制度，虽然当时其实还不是民主制度，它是宪政制度。

王：“光荣革命”在英国所确立的虽然是代议制、分权制的君主立宪体制，但从今天的标准看，它离民主还有明显差距，因为财产资格限制，有投票权的是一小部分人。到 1832 年，英国才开始扩大选举权。

许：民主资本主义的概念是韦伯（Max Weber）在 20 世纪初提出的。他用这个概念刻画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他所谓“民主资本主义制度”，指的并不是今天的民主概念，更强调的其实是宪政和法治。宪政和资本主义两者是不可分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所谓资本主义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而且私有财产不是少数人、个别人拥有私有财产，而是社会上广泛的人们普

遍拥有私有财产。如果没有宪政，广泛拥有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够稳定的，私有财产是不能得到保护的，所以，宪政是资本主义的基础。

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就是产业革命产生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自从产业革命发生后，产业革命反过来又加强了资本主义制度。当时，英国还在跟法国打仗，打了很长时期的仗。产业革命前，英国在欧洲比西欧大陆其他国家并不明显更发达。产业革命使得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大发展，使得英国的力量全面超过了制度不同的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这个背景是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转变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国的产业革命使得英国特别强，其他的国家是在改变制度后才能模仿英国，跟上产业革命的步伐。

王：在历史上，英国对于欧洲相当长时间内像指路明灯，类似当代许多人将美国视为世界的灯塔。欧洲大陆的人仰慕英国的宪政、自由、繁荣，法国一些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到过英国。

许：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都不单纯产生于技术。资本主义的产生有自己的道理。只有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才可能有产业革命。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地是美国和英国。美国的基本制度实际上是来自英国的。美国独立战争的重点是美国跟英国之间的矛盾。但美国最基本的制度，根源来自英国，是英国制度的变种。因此人们称这类制度为英美制度——英国的宪政是君主立宪制，美国是共和制、没有君主，但都是民主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制度为产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反过来，产业革命又加强了资本主义制度。

全世界民主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发展，是过去三次产业革命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产业革命是高度互补的关系。在没有产生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之

前，人类历史不存在产业革命这个现象。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产业革命只产生在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什么历史事实是这样的？社会科学必须要解释为什么是这样。

王：为什么两者有这种联系？

许：最概要地讲，产业革命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条件。第一是知识的产生、人才的产生需要宪政的保护。独立自由的大学制度、研究制度，需要宪政。宪政保护下的大学制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大学独立、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个人不需要担心会因为言论受到惩罚。充分的自由是成批的大量新思想、科学和技术大发展涌现的必要条件。第二，新的思想怎么能够变成实际？这需要企业家和资源的配置。企业家的产生背后是资源的配置。所谓的“企业家”，是有资源支持的创业人群。资源从哪里来？任何产业革命，从第一次产业革命起，很重要一部分就是资本主义的金融制度。金融资源怎么配置，金融制度是怎么运作的？没有宪政保护的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存在大规模运作的金融市场。金融业最早发达集中在威尼斯、弗罗伦萨；金融市场首先是产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但是后来真正变成特别大规模的金融市场首先是在英国伦敦。这是英国发生产业革命的先决条件之一。“光荣革命”奠定的制度条件使得伦敦的金融市场大规模发展。当时施行宪政的国家只有英国，所以，金融制度能大规模发展的就只能在英国而不是别的国家。

宪政制度对企业家的保护，对资源配置的保护，对企业家的财产、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些都是产业革命能发生的先决条件。产业革命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它对原来已有的秩序和技术——技术和社会秩序是连在一

起的——有重大破坏作用。产业革命包括破坏的方面，不都是正面的，有很强的负面冲击。发生产业革命时，新的东西来了，破坏了旧的东西，怎么维持秩序，怎么重新调整，都靠宪政制度。

王：淘汰旧的、采用新的。

许：对。一个社会的制度有没有能力来面对严峻的挑战，决定了产业革命是否能在这个社会发生和展开。民主资本主义制度靠自身的特点来帮助它应对，这就是过去两百多年里产生在英美的三次产业革命的基本规律。

王：202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研究新技术与持续增长的人，其中之一是《增长的文化》、《启蒙的经济》等著作的作者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他的主要观点是什么？莫基尔专门分析过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在 15 世纪前技术上曾有过领先的中国。他的分析对于今天的中国是否依然有重大启发意义？

许：实际上，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二次给讨论产业革命的制度背景的人了。第一次是给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

王：《西方世界的兴起》的作者。

许：对。人们多数没有认真了解诺斯关于产业革命的工作，因为给他颁奖的理由没有提到产业革命。实际上，他的工作的主体是围绕为什么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这个问题的。诺斯最主要的、通常在学术界最了解的工作，是制度的路径依赖理论。他讨论为什么宪政制度产生在英国而不是别的地

方，然后讨论宪政制度如何支持了产业革命。

与诺斯对比，莫基尔强调启蒙运动作为产业革命的基础。他喜欢的用语叫做“文化”，强调文化为产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但他说的文化实质上是人的认识，人们的共识，基本上说的是非正规制度。他与诺斯的差别更多是用语方面，而非实质方面。用语本身并不总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实质。具体一点讲，他强调的是他所谓的“学术共和国”，英语是“Republic of Letters”，指的是学术思想的自由交流。他强调产业革命的先决条件是跨国的自由交流。他讨论在进入民主资本主义之前的启蒙时期，在规模不太大的西欧国家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客观上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保护。知识分子在一个国家里受到了迫害就跑到另一个国家去。他强调这是产生新思想的必要条件。

这种自由交流、自由流动，大量产生出来莫基尔说的“有用的知识”。所谓“有用的知识”，指的就是和产业革命相关的意识形态、认知、科学和技术等。他记录了有用的知识是怎么大量产生的，是如何在学术共和国里产生的，是如何为产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归根结底，他讲的是产业革命的产生需要有一个制度背景，在没有这种制度的情况下，有用的知识不可能大量产生，于是产业革命就不可能产生。

他的书里边专门有一章讨论西欧与15世纪之前的中国对比。至于15世纪之前，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是不是比欧洲更发达、更领先，这本身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确定。他书里引用的是李约瑟的论断，说那个时候的中国科学技术上比欧洲发达。但是为什么中国没能产生产业革命，就是所谓“李约瑟之问”。其实这个问题也并不是李约瑟最早提出来的，

在李约瑟之前二十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辩论过。明初之前的中国是不是科学技术上比欧洲更发达，这是有争议的问题；但在产业革命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全面大幅度落后，这是无需争论的问题。从一个有争论的状态变成了不需要争论的状态，这需要解释。

莫基尔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在英国、在西欧存在着所谓的学术共和国，但中国不存在这样的制度。所以，归根结底，他的解释就是两边的制度不同，一边的制度是相对开放的，另一边的制度是封闭的。所谓“相对的开放”，并不是说欧洲的制度就好得不得了，而是说在那个时候欧洲的制度，尤其是英国，对于思想的发展，对于意识形态的约束少了很多。这是认知、科学、技术能发展的必要前提。他认为中国自古就没有这个必要的前提。

王：我们转向目前处在早期的、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这场革命需要多久，但迄今一些特别重大的、令人瞩目的突破，如 ChatGPT，是首先在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的。

中国在战略上对发展人工智能高度重视。虽然不排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可能会取得某项或某些或许很重要的成就，但是否可以断言，封闭的、极权主义的体系，将使中国再次在这次新的产业革命中落后，总体上至多处于追赶、模仿者地位？

许：产业革命本身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产业革命需要整个社会制度做基础，反过来又影响社会制度。人类历史上，历次产业革命的制度基础都是民主资本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极权主义制度，但在策略上有所放松。开放的确

为科学、技术、经济带来了很大好处。在改革开放开始前，由于冷战和极权主义制度完全封闭的状态，中国极端落后。开放给中国带来模仿和快速追赶的机遇。以美国为例，在1990年代以来的几十年里，美国吸收的最大的留学生群体来自中国，差不多占美国三分之一的留学生人数。西欧和日本都有相似情况。

王：很高的比例。

许：不仅来美国留学的人数如此之多，几十年积累的、很多过去的留学生，有些在美国变成了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在高科技领域里是主力、骨干领导。这些人中有一小部分在学有所成之后永久性回国了，大多数人虽然没有永久性回国，但是很多跟国内有大量交流，包括在国内授课，在国内领导或指导研究。这帮助中国在科学技术上迅速缩小了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但人们必须要清楚地看到全貌，看清楚知识的来源在哪里、中国怎么会在短时间里缩小了差距。

在学术界之外，还有另一个非常重大的部分，就是改革开放时期一度对国际上最先进的跨国公司的开放，导致它们在中国设立极为重要的研究基地。世界上几乎所有最重要的高科技公司，比如微软、谷歌，等等，都在中国设有研究基地。最突出的，就是微软在北京的亚洲研究中心。它是微软在美国之外的最大研究中心，不仅仅为中国市场服务，而是和微软在美国的研究中心平行的机构，是微软的核心研究机构。

这个研究中心不仅在中国招募科学研究人员，也派遣大量的研究人员到中国去。这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我对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做过多年研

究，和中国的人工智能专家们有很多来往、互动甚至合作。中国资深人工智能专家们公认微软的亚洲研究中心是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黄埔军校。这句话的含义很重，就是说中国大量的人工智能专家是靠微软培养出来的。而这只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另一个重要例子是苹果公司。苹果公司内部报告披露它在中国培养的工程技术人员、技工和工人总数达到了两千八百万到三千万（包括苹果公司的供应链合作伙伴）。为中国培养大量工程师、技术员和技工，极大帮助中国缩小了跟西方先进制造业方面的差距。特斯拉是又一个重要例子。它在中国大规模建厂造电动车，为了保证供给链（supply chain）也培养了大量的人才。特斯拉没有披露数字，但情况其实跟苹果公司相似，就是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

所有这些例子说明，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包括制造业的能力，是如何大量流入中国的。

我还想提到一个重要例子，就是药厂，也就是中国的生物制药业。今天人们看到它发展非常快，缩小了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实际发生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前面已经讲到的，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在西方接受了极好的训练之后，已经成为学术领导人，回国和部分地回国。另外一个原因，对于国内帮助非常重大的原因，是最近二十年来西方药厂在中国大量进行临床试验。其中很多在中国建立了固定的机构，或者合作企业。这些总部设在中国的外国或中外合资药企，很多媒体都不加区别地当作中国药企。笼统加总后，媒体报道称“中国的新药研发超越了美国”（日经中文，2025/12/30）。

王：为什么要在中国做临床实验？

许：因为许多临床试验的监管规则在美国和欧盟都非常严格，中国会给他们一些放宽的标准等好处。此外，中国癌症病人数字特别大，在中国药监局放宽限制的条件下，实验性新药可以尽早在中国试用。这在缩短研发周期、降低成本方面特别有吸引力。但是，中国药监局系统性地规定，所有来中国做临床试验的药厂，都必须不加保留地披露新药的所有基本信息，包括与监管无关的信息（民主资本主义的监管原本应该只为了保证安全和有效）。这实际上就是以强制方式获得技术。这也大大帮助了中国生物医药业迅速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长期以来在中国做临床试验的外国药厂普遍抱怨这一点，但在药厂激烈竞争下，他们感到束手无策。

如果中国一直保持开放，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不断缩小。但是，极权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要与民主资本主义隔离，即封闭。当民主制度发现极权主义制度的敌对态度，最终会有反应。这就引发了脱钩。为什么民主国家会发现存在问题呢？那是因为，极权主义制度担心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动摇自身制度的根基。这就是最近十几年里中国发生一系列逆向的发展，包括对外和对内的，不仅仅冲击国内一些最大规模的私营企业的发展，也发生在对外关系上，比如战狼外交，又比如为减轻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大规模对外倾销。

中共对内对外的做法，刺激了民主制度的反应。我们现在见到的脱钩，直接与这些相关。一旦真的脱钩，中国就会返回到封闭状态。如果真的返回到封闭状态，在产业革命进行的背景下，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会重新拉开。目前脱钩仍然在过程中。

这次产业革命的核心是人工智能，中国在过去开放时期得到的巨大好处仍然还在，而且还在发展中。但中共强调的所谓自力更生或者科技自强，其实就是自我封闭的政策。目前和短时期里，中国和发达经济之间的差距的整体的趋势并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清楚，因为开放带来的好处仍然还在发展中。在最前沿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取决于中国自我封闭的速度。目前交流并没有完全中断，但是在迅速减少。

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大趋势。极权主义制度强制产生的大趋势是越来越封闭。因此脱钩的趋势越来越清楚。在最前沿的技术上，交流的减少就会使得差距再次拉开。具体到人工智能上，美国的闭源大模型代表最前沿的水平。在这方面，中国与他们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王：我们转向一个历史教训。前苏联已成历史烟云，您提到它也曾不惜举国之力试图赶超美国，在 1950 年代还发射了卫星、造出了氢弹。这种为了赶超的追逐所取得的某些成就，曾显得颇为光鲜，引起西方一些人的惊叹和艳羡，但是赔了很多钱，最终把自己拖垮了。

为什么举国体制是赔钱的？为什么前苏联和中国的极权主义体系，在投得越多就会赔得越多的情况下，也要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并且将其当作极其重要的国家战略？

许：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到产业革命的性质，回到为什么产业革命只能发生在民主资本主义制度这个问题。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产业革命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民主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资本主义是什么？

王：资本主义是要挣钱的。

许：产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大发展、资本主义大挣钱的过程。产业革命的过程是产生超级盈利、超级赚钱机会的新的科学、技术、商业模式。当一系列的科学技术商业化之后整个社会因为巨大盈利而快速变化，这才成为产业革命。因为超级赚钱，才使得科学技术和新商业模式大发展，形成创造性破坏。

为什么创造性破坏造成了社会的痛苦，在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下还能发展？这是因为创造性破坏的过程特别挣钱，当挣钱特别多的时候，在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下，就能找到机制帮助重新配置资源，补偿那些被破坏的时候产生出来的损失。民主资本主义能把产生的损失补救回来，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这样发展。在极权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战略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发展不是因为赚钱、而是因为有战略的重要性。当战略发展是靠赔钱、靠补贴推动时，那个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长期看，大规模看，系统性赔钱的一方必定输给系统性大赚钱的那一方。

比如，在前苏联，核武器、火箭，所有这些都是战略竞争、地缘政治、军事问题。当科学技术影响到地缘政治、军事的时候，苏联不惜代价调动全部资源和力量来竞争。实际上，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内容不是核武器，也不是火箭，而是电子技术、半导体、集成电路。这些东西在民主资本主义阵营里非常、非常赚钱。但是，在共产极权主义阵营里发生的是什么呢？他们自从七十年代以来，举多国之力，调集大量资源来追赶，因为他们意识到电子技术是战略竞争最重要的领域。但这跟资本主义体系发生的正好反过来。在资本主义那里，这些东西的发展大大帮助了经济，巨大投

资为了赚钱。极权主义阵营里大量调动资源，赔了钱来追赶，为的是保持战略领域的差距不至于太大，最后，赔钱就使得自己被拖垮。

有人说苏联最后垮台是因为经济上垮了，也有人说苏联经济上垮了是因为美国搞星球大战的骗局。什么是星球大战？其实，所谓“星球大战”，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半导体、集成电路、电子工业。现在，非常相似的事情正在发生，就是人工智能。在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投资的人们认为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赚钱的领域。人们预料，在初期的几年里，这个领域要赚的钱大概就已经达到十几万亿美元。现在投资者千亿美元往里投。为什么敢投？因为投了上万亿的钱，以后挣的是十几万亿。但是，在中国方面呢？主要投资是政府的，因为企业找不到赚钱的机会。中共认为人工智能决定军事、地缘政治的未来，在战略竞争上，一定要保持差距不能太大。为此，即便赔钱也必须大规模投入资源。这跟当年苏联非常相似。

极权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在资本主义世界里面，任何东西的发展前提是能不能赚钱。不能赚钱的东西，在资本主义世界是不会发展的。但是，在极权主义制度下，衡量标准、资源配置标准都不是按挣钱来考虑的。所以，极权主义制度可以靠大量赔钱在科学技术上追赶。中国现在的经济处于非常严重的困难中。面对持续两年多严重通货紧缩的危机，整个经济在衰退。在面对经济危机的时候，它的资源原本最好的配置，应该是来应对、挽救经济上的困难。但是中国政府把大量原本应该帮助恢复经济的资源，拿来投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上和美国竞争。

中国经济上最大的困难来自于内需不足。但是政府不关心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反而把资源放到供给侧去了。人工智能这种技术，商业上实现之后

是大幅度增加供给。因此这种资源配置对中国的经济是雪上加霜。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投资到人工智能带来供给侧重大的、革命性的变化，是因为经济中存在严重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是，在中国问题反过来，是大量失业，劳动力过剩，产能过剩。在这种情况下赔钱发展自动化增加供给，是雪上加霜。更雪上加霜的是，目前大量资金给错误配置到了不该配置的方面去。

所以，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角度看，中共的经济政策是背道而驰。长远看，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产业革命现在才刚刚开始，在它达到高潮的时候，在资本主义世界获得了大量收益的时候，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上的差距肯定大幅度拉开。远远不单纯是技术上的差距，而是由产业革命带来的经济的差距。

王：这里面有一个有悖论。你刚才提到了，中国之所以不惜赔钱追求技术发展的战略，有地缘政治、军事在里面，好像它一定要这么做，才能够保持自己的力量。另外，我们也能够看到，它也想证明自己的制度并不差、有“优越性”，你能够发展，我也能够发展。但是，悖论在于，它可能会最终把自己拖垮。

我们回到刚才已经触及的问题，就是差距是否在越拉越大。最近一些年，看到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一些快速发展，国内不少人表现出一种亢奋，一度还曾有“厉害了我的国”之类民族主义色彩的话语；在海外，也经常有商界人士、观察人士谈论或者说担心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正在或很可能超越美国和西方。但是，您的判断是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正越来越大，可否做一些说明？在正在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更具体地说，在人工智能领

域，差距是否也在越拉越大，可以从哪些方面看？

许：因为时间限制，我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人工智能方面，不是所有方面。首先，人工智能的发展是由三个最基本方面来决定的，就是计算能力——简称“算力”——和算法、数据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里最基础的部分是算力。从算力的角度讲，中美之间的差距是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而且扩大的速度非常快。这是什么意思？最简单的一个统计就是人工智能方面的总的计算力。人工智能的总的计算力，指的就是把一个国家用于人工智能的总的计算能力——这里略去技术参数的统计——全部合在一起的总数。从这个角度看，中美之间的差距是在拉开，而不是在缩小。因为算力是芯片提供的。因此，在使用技术参数之外，更简单的方式就是看芯片的统计。

中国芯片制造的能力比美国落后好几代。当然，这里我要强调民主资本主义体系，而不是单纯讲国家。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我们讲到计算能力的时候，指的是民主资本主义体系，而不只是美国。绝大多数先进芯片是台积电制作的，而台积电之所以能够制作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是依赖了民主资本主义体系提供的其他东西，比如说光刻机是荷兰的，光刻胶最主要来自日本。芯片是国际民主资本主义体系整体合在一起的力量，而不是一个国家。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基本概念、也是基本事实，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从来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度突出一个国家是违反事实的，是错误的。当某一个政客过分鼓吹某一国的利益的时候，其实，他违反了民主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民主资本主义的运作从来是国际性的。资本主义靠的是市场，市场是国际性的。离开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

资本主义就没有了。极权主义制度下的中共讲自力更生等等。自力更生是违反资本主义最基本原则的。极权主义本来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是跟资本主义对抗的基本力量。

我们刚才讲到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与中共脱钩。脱钩里边最突出的就是在芯片方面的制裁，就是不允许卖给中国最先进的芯片。中国实际上没有能力生产人工智能所需要的芯片。华为的昇腾芯片比民主资本主义体系的芯片落后几代。即便如此，它的芯片中的晶粒，即最核心的部分，绝大多数都是过去台积电造的。2024年底，台积电发现一个隐名埋姓的第三方替华为订货制造晶粒之后，就停止了供货。此后，华为昇腾芯片的产量大幅度下降——不仅质量上不去，由于良率低，即便差几代的芯片也无法大规模量产。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靠走私和其他钻漏洞的方法等等，获得相当数量的先进芯片。在制裁下，中美在AI算力方面的差距不是一个数量级。几周前，美国政府批准英伟达对中国供应H200芯片。那是美国2022年的前沿技术。而英伟达在那之后已经有了新的两代的芯片。面对严重的算力瓶颈，中国对H200芯片的需求极大，达到了2百万片。问题是在台积电面对严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什么时候能帮助英伟达生产这些H200向中国供货？如果供的快，这可以在近期大大缓解中国面对的算力瓶颈问题。

另一个方面，跟人工智能发展连在一起的是投资。两边投资量的差距也不在一个数量级。这又回到了前面讲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是什么意思？产业革命是什么意思？在资本主义经济里，投资都是私有公司、不是政府的战略决定的，公司认为能赚钱才会投资。它愿意、能够成万亿投

进去，是因为认为要赚的钱比这要大很多。产业革命从来就是这样发展的，历次的产业革命，每一次、每一波新东西来的时候，都是这样发展的。不能赚钱，就谈不上产业革命。

在资本主义的市场上，怎么估计会有这样的赚钱可能性呢？投资者怎么验证呢？他们看你有多少用户，已经获得了多少收入。在这方面，两边的差距重大。以 Open AI 为例子，它现在的用户已经达到了十亿，年度收入已经上百亿了。而且，它的年度收入的增长速度是一年三倍，也就是 300%，以这个速度在快速增长。所有其他主要大模型的年收益都是每年三倍的增速。Google 2025 年上半年的总营收比前一个半年增长了一倍，从 \$500 亿变成了 \$1000 亿。Google (Alphabet) 报告说，营收大幅增加的原因在于所有的产品里边都带了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极其大规模收益的增加。

当人工智能给公司带来这么大规模的收益增加时，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的投资者预期未来有更高的收益，因而大规模增加投入、驱动更快的增长。这已经清楚表现在美国 2025 经济的强劲增长上。那么，在中国呢？在人工智能行业中人们普遍抱怨看不到收益的来源是什么。虽然在名义上，比赛造了什么模型，比赛模型的考试结果，从技术上看去似乎没有显然扩大差距（技术上有很多争论，涉及如何评价以及中国的情况）。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归根结底不是讲模型的参数，考试的结果，而是看在市场上有多少人花钱买你的服务，看你的收入，有多少投资投进来。中美在所有这些商业和经济方面目前已经是一个不同数量级的差距，而且重要的是这个差距还在迅速进一步拉开。这个迅速拉开的差距是最实质性的，比所有的技术参数都更具实质性，更说明在产业革命兴起时两边的差别。

王：AI 时代会带来过去梦寐以求的许多便利，同时也有理由担心将会产生、散布更多的虚假信息。在中国极权主义的体系中，这种担忧的理由要更多。据您的观察、了解，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信息流通的冲动，目前正在如何影响或者侵入人工智能的本土发展？它对于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在本土与国际上的竞争力正在发生怎样的影响？

许：如果用投入的资金来讨论，目前人工智能最大的部分是大语言模型。大语言模型在极权主义制度下，变成了共产党的宣传工具。问题不仅仅是虚假信息，而在于系统性地变成了他们的宣传工具。在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公司要面对一系列的道德准则。每一个公司在训练它的模型、准备拿出来使用的时候，必须保证它的模型符合民主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道德标准，比如，不能为恐怖分子提供造武器的能力，不能够搞儿童色情，不能够侮辱少数民族，等等。

但是，在中共控制的社会，人工智能模型直接就是共产党的宣传工具，不仅仅是遵守共产党的规则，而是主动、创造性地做共产党巧妙宣传的工具。已经有无数的人对中国的大语言模型做过测试，我自己也做过，会看得很清楚，大语言模型变成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后会成为帮助共产党强化执政的工具。这一点都不奇怪，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过去都使用无线电、电视、电影等当时的先进技术做宣传工具，现在最先进的工具就是人工智能。所以，第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共产党把人工智能看作是一个绝对不能落后的战略竞争，这是其中一部分考虑。同时，另一方面，这也形成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特点，就是它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宣传工具。但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某一个党的宣传工具，它是在民主自由的条件下发展。在如此

不同环境里产生出的大语言模型，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根本不同的。这点会被更多国家普遍认识到。

王：共产党很重视人工智能，作为战略重心发展。但是，作为宣传工具，这会影响中国人工智能的品牌，成为它的一种负担。

许：事实上也是这样。当我们讲到市场的时候，为什么中国的人工智能市场打不开局面，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讲全球人工智能的市场，你就会看到两边的差距在拉开。

王：赚钱就会有问题了。

许：中国的人工智能往往是用非常低的价格甚至免费的方式送，主要是送开源模型。这不仅没有收入，也少了宝贵的反馈数据。中国 AI 模型在服务方面完全打不开国际市场。而美国的人工智能最终都是要盈利，目的是为盈利的，各种收费的商业服务在迅速发展扩张中。

王：每次产业革命不仅仅是技术的发展，也会带来社会的改变。例如，第一次产业革命使得物质产品的生产从家庭和小作坊转移到了机械化的大工厂，将农业和以手工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变为工业和以机械动力为基础的经济。由此衍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如劳资关系、工人权利、福利保障等，给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管理带来了很大挑战。

第四次工业革命从过去三次革命的机械化、自动化，上升到了智能领域。虽然现在还是早期，是否可以初步预测到它将可能带来一些什么重大社会

问题？与民主资本主义体系相比，极权主义系是否在应对这些问题上也处于劣势？

许：在民主资本主义体系，它所产生的社会问题现在大致可以猜到。直接冲击经济的最大问题是自动化。自动化会造成很多行业和职业市场大规模的变化。比如，现在第一轮冲击的就是计算机程序员。大量的公司已经不再需要初级程序员了。学计算机的人大学毕业后进入公司，他开始的工作本来很自然是初级程序员。但是现在，在美国这个需求变得很低了，大部分公司不需要初级程序员了，因为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了。这种情况会非常快蔓延到其他领域，比如会计公司、律师事务所等等的初级工作。获得法律学位的人进入律师事务所，刚开始都是律师助理，但这些基本都可以用人工智能取代了。

在劳动力市场发生巨大变化、面对巨大冲击的时候，就会造成社会问题。怎么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任何东西都是为了赚钱。这些公司使用AI能赚钱。为什么能赚钱？因为可以用机器取代人。但是，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就会带来社会问题。民主资本主义制度靠自身的制度寻找解决办法，靠民主制度。首先，民主制度才能保护私有产权。另一方面，当有很多人失业的时候，民主制度需要寻找解决办法。这不是顶层设计的，主要不是哪个党或政府安排的，而是民主制度自身会有适应社会发生的变化的反应，人们会发出声音，包括反对的、抱怨的，驱动得利的和受损的人们共同寻找妥协的办法。靠人们共同努力，共同推动，靠各种智慧来想解决办法。

反过来，在极权主义制度下，问题就不同了。在极权主义制度下，人工智

能是一个战略竞争领域，不是赚钱手段。中国内需不足，失业问题严重。人工智能一旦带来大规模自动化，取代大量的工作，就会进一步加重失业，在经济上不仅没带来好处，反而加重负担。真的走下去，社会怎么办？

王：现在中国的失业就很严重了。

许：是。这会给极权主义制度带来极其重大的社会负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赚了很多钱的情况下，需要考虑的是怎么用赚来的钱补偿失业者。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供给侧这边不仅没有赚钱还因为投资而赔钱，本来就失业严重，现在赔钱还造成更多的失业，怎么办？因为害怕制造出更多的失业，就限制使用自动化？这是非常可能的情况——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实际上不能真的推动自动化，因为一旦推动带来失业，中国经济无法承担。为了避免无法承担、无法面对的挑战，它就有可能最后系统性地不使用。这样，就导致了一方面为了战略竞争要投资发展，另一方面，当它不能大规模、系统性在商业上使用的时候，就不能赚钱。于是，最终不能走得远，只能落后。

最终落后是由它的制度决定的，不是因为工程师、科学家个人的能力问题，而是因为你的社会不需要、不能承担这个技术。把注意力只集中在科学家和工程师上讨论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是对问题的系统性误解。

王：我想到你刚才提到的一个术语，就是“创造性破坏”。这意味着在中国这种极权主义体系，创造性破坏会受到阻碍。创造性破坏是产业革命所需要的。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除了莫基尔，还颁给了另外两位研究创造性破坏的经济学家。

许：对。什么样的制度能承受创造性的破坏？只有民主资本主义制度能承受，靠的是宪政民主制度。在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性不是单纯创造本身，不只是科学技术，而是在商业上创造出了价值、创造出很多的钱。在这个背景下有破坏，就能想办法把破坏的部分花钱赎买回来。举一个例子，就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候，在伦敦泰晤士河上开始用装有蒸汽机的渡轮。原本是大量的人工摆渡，船上装了机器以后就把那些人都代替下去了，但是大规模代替了人工之后，失业的人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当时的英国已经是一个宪政社会，虽然不是民主社会。工人并没有选票，但是基本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所以他们是可以闹事的。那些新建的机器船公司，因为能赚很多钱，就和摆渡工人签定了合同：你原来挣多少钱，我赔你、每年赔、一直赔。公司用了机器之后，它的成本实际上是下降了，而且速度又快，载客能力大大超过了以前。

王：用了机器以后，赚了更多的钱，赔得起。

许：对。这就是关键，在产业革命中，资本主义制度的关键就是挣得多、赔偿得起。所以，在民主资本主义，赚了大钱后，可以讨论赚钱方赔偿损失方，就把社会问题化解了。这样的例子无数。现在，人工智能会带来重大的后果，包括负面的，怎么办？实际上，比如比尔·盖茨，他在人工智能上是属于投资最多的，很早就提到过，人工智能大规模投资就是最后要赚钱的，一方面你投了钱是为了赚钱，另一方面，你要想到你赚钱给社会带来了问题，怎么面对？他建议，以后要给所有的机器人征税，拿回来反贴给受损的人。

王：用机器人来养人。

许：要不然，给社会带来的问题，你没办法面对。产业革命的前提就是很赚钱，赚得很多，所以赔得起。刚才我们讲到程序员。还有自动驾驶的出租车很快就要普及，一旦普及就面对着大量的出租车司机失业。怎么办？这是非常基本的社会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我刚才讲到，过去伦敦泰晤士河发生的事，是用那个方式补偿的，将来怎么办？可以想象，一部分是靠补偿，另一部分就是自动化以后，会产生许多新的行业来替代。但是新的行业人们的工作技能怎么培养和训练？培养和训练很可能是需要免费的，不但是免费的，甚至你还要付钱给人家帮助他接受训练，这样人家才会高兴。

王：不然的话，可能有些人会愤怒。因为他们过去的教育，其实是付了很多代价的，再次投资教育，对他们来说压力很大。

今天已经占用了你不少时间，非常感谢你，许教授。感谢你精彩的评论和洞见。新年快乐！

许：新年快乐。再见。

访谈

亚当·金
李聿脩

中国民主季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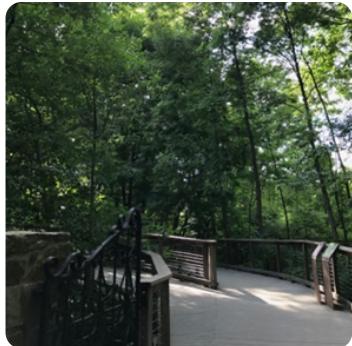
第4卷 第1期
2026年0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变化如何可能？ 中国的公民社会 与政治机遇



亚当·金



李聿脩

编按：“政治机遇总会来的。但是如果中国的公民社会没有准备好，也可能错失政治机遇”，国际共和研究所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主任亚当·金 (Adam J. King) 说。金先生多年来与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许多国家的在地合作伙伴，共同致力于促进公民社会、选举、媒体自由、公共财政管理、移民劳工和少数民族权利、青年公民行动、女性政治参与等，他还曾在孟加拉、柬埔寨、蒙古、东帝汶等国家观察选举。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旅居伦敦的青年政治学者李聿脩对金先生越洋做了这个访谈。金先生的工作给了他一种难得的优势，来比较与思考许多亚洲国家——当然包括中国——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发展问题。他认为，尽管公民社会在中国非常受限、极端脆弱，但还是大有希望，国际社会应该准备好支持中国的公民社会。

李聿脩（以下简称李）：近年，学术界有个颇有争议的趋势，就是认为威权国家也有公民社会，通常称之为“威权体制下的公民社会”。有种观点就认为，互联网与中国新生的公民社会有个共同演化过程。还有一种观点

认为，中国在 2000 年以后出现了“协商型威权主义”，即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民间组织存在，这些民间组织并不一定总是被动、总是受打压，政府也利用民间组织来改善民生（所以这些民间组织与民主化无关）。但 2013 年习近平上台以后，对本国和外国在华非政府组织的打压力度，比以前显著加强了。

你认为中国存在公民社会吗？在谈及东南亚公民社会的时候，也有学者会提到公民社会的“逆流”：非公民社会（uncivil society）。非公民社会这个提法，真正流行起来大概是受到斯蒂芬·柯特金（Stephen Kotkin）2009 年出版的《非公民社会：1989 年与共产主义集团内爆》（Uncivil Society: 1989 and the Implosion of the Communist Establishment）一书影响。但现在非公民社会主要指社会的反民主化、反自由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保守倾向，比如官办非政府组织（GONGOs）跟某些政权的死忠分子，都可能是非公民社会的重要构成力量。这些情况在中国同样存在。在你看来，东南亚国家非公民社会跟中国有什么不同？或者中国的非公民社会有什么独特之处？

亚当·金（以下简称金）：中国确实有公民社会，只是这个公民社会比较特殊。但我认为中国公民社会运行在受国家控制的有限空间内，不但很受限，还极端脆弱。说起公民社会，我会想到 2000 年代中国公民社会的“黄金时代”。

说那段时间是黄金时代，不是没有原因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那时候距离改革开放时间足够长，公共空间有充分的成长时间。1995 年 9 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其辅助性会议“95 北京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在北京怀柔县进行（其举办盛况给当时才 6 万人口的怀柔县带来 3 万

多外宾和 2 万多工作人员——编者按），从那以后“非政府组织”理念就开始在中国推广开来。这对当时许多中国人来说是相当大开眼界的事情。推广非政府组织理念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当时国家还相对宽容，非政府组织在很多领域开辟了新空间。有意思的是，中国当时的公民社会都在谈中国情况有多糟糕，但现在回顾来看，那时候对社会活动家来说竟是最好的时候。

你讲的情况让我想起两件事，这两件事都造成了黄金时代终结。第一件事是 2008 年汶川地震。当时中国的公民社会迅速有力地动员了社会。但这种情况对中共来说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中共甚至有点受到了惊吓。这让我想起 1999 年“法轮功事件”（即“425 上访事件”：该年 4 月 25 日有超过一万名法轮功学员前往中办国办信访局集体上访，引起中共高层震动。其后不久，北京当局开始全面镇压法轮功——编者按）。我并不认为此前中共政府害怕法轮功，但中南海外面突然之间冒出上万人，中共当局肯定吓得不轻。在当局眼中，2008 年汶川地震跟 1999 年“法轮功事件”有相似之处。中共政府看见民间有这么强大的社会动员力，看见公民社会如何组织有序和高效运作，不感到后背发凉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

第二件事显然就是习近平上台了：习近平上台以后才真正严厉打击公民社会。虽然中共政权一直就是列宁主义体制，但是直到习近平才真正开始大力加强对公民社会的列宁式管控。至于你方才讲到的非公民社会，其急速增长就跟这个有关系。政府越是打压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与非公民社会之间失衡就会越严重。中国到现在仍然有公民社会，只是其存在遭到了严重削弱而已（以至于跟非公民社会相比，显得严重不成比例）。

亚洲（尤其东南亚）的非公民社会总体来说要更加“有机”一点。某些狭隘的爱国团体，我们不会说他们是公民社会，因为他们更倾向于支持国家。但亚洲这些组织要稍微“有机”一点，他们的民间自发组织性质（与中国相比）要略大于官方性质。中国的非公民社会要么是由国家授权的，要么是由国家培养或指导，其结果就是忠于共产党的组织和官办非政府组织，铺天盖地涌入到各个社会领域。所有这种组织都在挤压独立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

尽管如此，我仍认为至少有两个理由表明中国公民社会还大有希望。其一是中国社会体量庞大。有这样大的体量和人口规模，任何政府都没办法完全清除国家内部的不同声音，哪怕是中共政府也一样办不到。另一个原因是民众自己。中国民众有主动改善社群和互帮互助的强烈动机和愿望，因为他们发现政府实际并不能满足每一项社会需求。有鉴于此，我相信就算中共当局强力镇压，也没办法完全扑灭公民社会火种。

李：公民社会到底有没有能力对专制政权构成实质性挑战呢？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蒂芬·柯特金对此显然是持怀疑态度。柯特金有个著名观点就是说东欧前共产主义阵营倒台，是因为统治集团发生了“内爆”，并不是因为公民社会抵抗，东德、罗马尼亚和波兰就是典型案例：这些共产政权垮台是因为统治集团自身原因（即突然信任崩塌，造成“政治挤兑”和政权从内部瓦解），社会甚至都没有集结起像样的反对力量。

当然，对公民社会的悲观态度也并非没有争议。从2024年孟加拉“7月革命”来看，有研究显示，其公民社会就被认为是推动革命的关键力量。但公民社会也并不一直成功。比如泰国的公民社会就经常遭非公民社会反扑。

泰国的“黄衫军”就被认为是比较典型的反公民社会组织。继黄衫军之后，还有“忠诚泰人党”、“人民保皇中心”等极端保皇派。2020-2021年泰国抗议活动期间，这些反公民社会组织还大肆攻击反政府示威者。

中共政府也有大量的死忠群体，这些群体对公民社会也造成严重破坏效果：除掀起网络暴力打压不同意见之外，还煽动针对不同意见群体的人身攻击、举报和告密，包括经常性污蔑和抹黑等等。这种情况使中国的潜在反对群体遭到政权和非公民社会两面夹击。但也有人提出，中国之所以缺乏社会运动是因为公民社会不健全，对此你怎么看？根据你对亚洲国家的长期深入观察，公民社会不健全国家有没有可能也形成社会动员、实现社会运动？或者说，依据你对亚洲各国的了解，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要实现政治变革的“社会道路”在哪里？

金：在中国，公民社会也许不会有别处那样强大。在中国的语境中谈论公民社会，其强弱皆不是与生俱来的属性，因为中国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是由政府决定的。过去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公民社会经历过扩张，有过黄金时代，后来又收缩了，但这跟公民社会或国民自身能力没什么关系，而是更多取决于政治宽容度。有段时间，政府想利用公民社会提供社会服务，公民社会就受到更多宽容。但近年情况变了，中共的需求变了，现在中共想控制或者摧毁公民社会。尽管如此，即使是现在的中国，公民社会也没有完全根除。我想，这是因为收不回来了：中国现在无论如何也回不到1950-1960年代了，那时候公民社会几乎荡然无存。

至于说在公民社会很弱的情况下，社会动员有没有可能呢？我认为还是有可能的。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南韩和台湾威权时代的公民社会发展很

不充分。他们的公民组织比现在中国还要强大，但仍然受到了严厉限制。不过，一旦他们遇到政治机遇，还得到国际社会援助，其公民社会结构就迅速扩张起来。他们的公民社会起初就是潜伏着的，并不活跃。

至于说在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要实现政治变革的社会道路，就有必要再提一下：中国的公民社会远远没有消亡，只是在较低水平运作。我觉得用“冬眠”可以准确形容这种状况。如果中共政权发生了合法性危机，或者发生了政治动荡，又或者政府因为别的原因被迫开放一定空间，你会看到公民社会活动家又迅速浮出水面。也就是说，政治机遇很重要。南韩和台湾以前就这样。一直以来，我考虑得最多的是，国际社会是否准备好以及是否有能力去支援中国的公民社会。一旦历史窗口打开，利用好机遇才是关键。

李：有人认为亚洲公民社会有更显著的集体主义特点或者更强调秩序和稳定。也有人指出亚洲公民社会的非公民社会倾向更突出。还有一种较常见的观点称亚洲公民社会的国家嵌入程度更深（即国家对公民社会影响及公民社会对国家主体的呈现程度较深）。根据你对亚洲公民社会成长历史的见证，在你看来哪些特点是亚洲国家普遍存在、但又跟西方国家很不相同的？

金：这个问题如果归结到其核心上，兜兜转转又来到了普世性和文化相对主义之争。单就我个人而言，我是肯定支持普世性的。文化绝对重要，这是肯定的，但文化还不至于影响大到可以改变人的根本需求。人根本上需要的是同一种东西。因为工作需要，我在世界各地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有趣的是，如果你开诚布公与人交流，你会发现每个地方的人要的差不多是同一种东西：他们要物理和经济上的安全，要个人自由和尊严，要能够

为自己家庭创造美好生活，要自主，要公平……其具体诉求可能有所不同，但本质上他们要的东西是同一回事，不管哪个国家，不论哪种文化，皆如此。

亚洲国家和社会的组织与管理当然可能不同，但其核心价值还是一回事。也有人说亚洲价值和民主并不能共存。这种说法肯定有问题。驳斥这种说法的案例还少吗？日本、南韩、台湾、蒙古等等都可以证明：亚洲价值观跟民主可以共存。根本不存在某些只有亚洲社会才有的，跟民主发展和政治开放相冲突的属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就没有差别了。比如你提到了亚洲社会的国家嵌入程度问题。即使是亚洲民主国家，也有各自的官僚传统。比如台湾，有时候你简直可以说台湾的官僚体系有威权主义性质，但这并不妨碍台湾社会民主、自由、开放。亚洲国家的政府（即使民主政府也一样）对社会的干预程度较深，对公民活动的监督也较密切，当然，这只是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而言。亚洲国家的公民社会通常是跟政府一起发展的，较少脱离政府各行其是。

大约 12 年前，我因公务频繁访问柬埔寨。柬埔寨并不是个自由开放的国家，但让我十分震惊的是，其公民社会相当丰富多彩、相当活跃、相当有创造性。这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的公民社会通常集中在非政治领域，但人们仍然围绕社会需求和公共服务自发组织起来，甚至也涉及一些人权问题。柬埔寨 2013 年大选过后，我还在想，要是有真正自由公平的选举，该国反对派是会赢得大选的。

总的来说，公民社会之成败要取决于政权，跟文化偏好没有多大关系，跟人民的组织动员能力也关系不大。驱策公民社会发展的动机是普遍的，就算是某些亚洲国家高度压迫的政治环境，只要给予一定的政治空间，也一

样会产生公民社会。

李：在中国有种悲观情绪差不多蔓延到了全社会。中国民众对改变社会失去了信心，还经常互相埋怨。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反抗中共政府，就互相推卸责任，到处找原因（就是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你讲到有关柬埔寨的情况对中国社会来说有很重要的启发：如果柬埔寨都能够创造性使用公民社会（至少比中国民众想象的要好），中国也一样可以。

金：理应如此。但我完全理解中国民众对现实有多灰心丧气。1987年苏联人也一样灰心丧气看不到希望，结果几年过后苏联就倒台了。所以情况还不好说。

李：你提到苏联，正好让我想起中国社会的国情论或特殊论。经常有人拿苏联和东欧来跟中国做比较，但是中国社会还流行一种常见说法，认为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跟中国没有可比性，其理由包括中国更特殊、更残酷、更恐怖、更独裁等等。社会运动长期缺席，中国民众等了太久看不到改善，就失去了信心。他们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现状。但实际上并非如此。2022年的反封控抗议规模相当庞大，超出很多人意料之外。在抗议爆发之前，许多民众还以为自己没有能力反抗清零政策。但突然爆发的反封控抗议实际上表明，中国社会还是存在某些潜力的。等条件成熟，公民社会也不是不可能卷土重来。

还有个问题是我们在比较关心的，就是中国发展模式对邻国公民社会是否产生负面影响。2025年11月26日，香港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火灾。许多市民将批评矛头指向主权移交以来香港全面政治倒退造成的腐败跟体制失

灵。主权移交以来，香港政治倒退是有目共睹的，要说其政治倒退没有受中国大陆影响是不可能的。从西方视角来看，你是否认为中国模式的“强威权主义”也对邻国产生了负面影响？向邻国输出中国模式，在哪种意义上是成功的，在哪种意义上是失败的？

金：我认为中国模式对其邻国来说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其输出并没有多么成功。要说中国对邻国造成的负面影响，我认为其恶劣影响主要在于中国是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同时还给其他专制国家打掩护。想想要是中国是个民主国家，世界该有多好啊。中国这种体量对欧洲国家来说太大了，对其亚洲邻国来说也同样如此。我一般不说中国是威权国家，我认为它就是个极权国家。当然其他国家也有用跟中国同样策略手段的，比如说网络审查、电子监控、司法压迫、或者用法律手段对付人民等等。比如越南跟中国模式算是最接近的吧？但越南并不是沿袭中国模式。越南和中国都是马列主义的共产政权。越南不像朝鲜，越南在经济上发展还算比较成功。越南跟中国一样调整了自身体制以适应经济发展，朝鲜却没有跟上。环顾中国的邻邦，其实没有国家明目张胆采纳中国模式。哪怕柬埔寨和缅甸也没有沿袭中国治理模式。像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还有一定民主规模。有些国家或许效仿中国镇压不同意见，但远远谈不上沿袭中国模式。

我认为中国模式真正失败的地方，其实是中国并不想其他国家简单模仿自己：中国要的只是其他国家顺从自己。也就是说，不采用中国模式，但是顺从中国政府。其他国家很难咽下这口气，毕竟他们又不是中国的附庸国家。所以输出中国模式实际上并不是为了真的输出中国模式，而是为了输出服从中国的模式。这两种动机是绑定在一起的。但其他国家并没有真的

要买账，毕竟归根结底都是要维护自己主权的。就比如越南吧，越南在某种程度上站在美国一边，不是因为亲美，而是因为恐中。恰恰因为恐中，越南才不敢完全变成中国的样子。偏偏是中国在（间接）迫使越南“更越南化”。越南不得不如此，因为“中国化”（意味着全面服从中国）会对越南主权造成严重威胁。缅甸在大约15年前开启民主化进程图的是什么？还不是因为害怕被中国吞没的生存恐惧。对缅甸和越南这样的国家来说，防止被中国吞没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可能开放自己融入世界。站在越共的立场来看，越南即便不要民主化，也不会亦步亦趋效仿中国，冒着被中国吞没的危险。

李：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公民社会的未来前景。有部分学者，比如斯蒂芬·柯特金和梅瑞迪丝·魏斯（Meredith Weiss），对“威权体制下的公民社会”持严重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公民社会在推动对威权政权的政治变革方面几乎没有重要影响。基于你对亚洲各国的了解，公民社会的前景与社会功能真有那么暗淡吗？在这种环境下，公民社会还能争取到哪些可以争取到的小胜利？如果我们希望推进社会变革，普通公民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他们应当做些什么？

金：我认为公民社会的前景没有那么暗淡。我前面讲即使在公民社会看起来死掉的地方，公民社会也不过是蛰伏起来，像冬眠一样。公民社会是什么呢？若爆发抗议或社会运动，公民社会就是用来支撑和维持它的。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需要保护（即使是专制国家也不例外），谁来保护呢？还是公民社会。一个社会要迎来社会变革，靠的是什么呢？就是公民社会。你看像孟加拉和尼泊尔这样的亚洲国家，其公民社会就是在塑造社会变革和政治转型轨道。所以我对公民社会持乐观态度，即使是中国也不例外。

我密切关注中国事务很多年，亲眼目睹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衰。大批人权律师被抓捕、教堂被关闭、非政府组织被取缔、维权活动被非法化、主动互帮互助的社会团体甚至被当成罪犯打击……即便如此，还是有民众前仆后继地站出来继续做事情，还是有个体冒着巨大政治风险悄悄地组织社会。专制压迫之下的公民社会也有一定韧性（即能够承受压力，回弹复原）。一旦政权开了一道小小的口子，比如孟加拉和尼泊尔，公民社会就突然冒出来了。这说明公民社会其实根本就没有真正消失，只是转入到不可见的地方蛰伏起来了。

至于说如何争取小胜利——这话听起来可能没劲，但单单是存在于国家官方体系之外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只要能尽可能维持公民社会网络，哪怕就是很小的公民社会组织，在政府社会服务功能失效的地方继续向社会提供服务，就已经是大成功了。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公共服务日渐累积，叠加在一起，就会非常重要。

至于普通人能做什么呢？要推动社会变革，显然直接上街抗议是很危险的。哪怕是读一些有关公民社会的书籍呢，也绝不会毫无用处。比如《独自打保龄球：论美国社群之兴衰》（Robert D.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2000）这本书就讲了构建公民社会网络的重要性。阅读这类书可以帮普通人澄清基本概念，还会教普通人怎样建立和维持公民社会网络，现实中这些网络就支撑着公民社会。除此之外，普通人还可以去宗教团体或职业协会做义工。这种经历可以帮普通公民增长社会阅历，还能扩大公民社会网络和增强其内部团结。当然，他们还可以学习使用 VPN 翻墙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个人很相信“政治机遇”(political moments)这种东西。我们不知道政治机遇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政治机遇会引发什么样的变革，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但总会有政治机遇出现，一旦出现，就会有人意识到这是政治机遇。遇到政治机遇窗口打开的时候，公民社会就会激活起来，而普通人也能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政治机遇就是实际上塑造一个国家未来的东西。

李：我想问问你对中国未来社会运动的看法。首先，你怎么看尼泊尔2025年“Z世代抗议运动”暴力失控现象（除了安全部队滥用武力之外，也有指控称不明人士趁机混入示威者群体故意诱导暴力升级，但示威者也有暴力行为造成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还包括袭击警局和抢夺枪支）？暴力失控现象是不是意味着该国公民社会对抗议活动失去了控制（尤其考虑到去中心化的抗议活动无法维持抗议活动秩序和战略协同性）？在抗议活动中往往会发生暴力螺旋现象，也即安全部队和示威者任何一方的暴力行为都可能引起暴力报复，导致政治暴力螺旋升级，其结果就是和平有序的示威活动总是被诱导朝着暴力方向升级（有时候也是当局有意为之，以便给镇压示威活动制造“镇压暴乱”的口实。这种诱导手法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非常突出）。

中国社会有一个相当普遍的担忧，以为离开中共统治，中国就会陷入内乱。这种担忧也许不是毫无原因的，因为中国社会自组织化程度较低、原子化程度较高。根据近年中国知识界的一些反思，1989年“六四事件”就存在一些失控现象。这里指示威者之间未能形成内部协调机制，无法进行战略上的灵活调整，没有先争取一些小胜利来换取一些战略缓冲空间（以便更长期坚持斗争和争取更多更大的胜利）。组织和动员上的无序状态实际上

也是公民社会失控的表现。根据你对亚洲各国了解，你能否给中国未来的社会运动一些中肯的建议，比如如何在社会运动中防范公民社会失控？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社会运动如何进行长远战略规划和如何及时实现社会妥协等问题。

金：我确实密切关注了孟加拉和尼泊尔的抗议活动。但是很难解释为什么有的地方暴力失控，有的地方暴力受到节制。我看香港 2019 年的“反送中运动”至今还是很有启发性的。那场运动是和平抗议，也一样没有领导中枢，所有示威者都本着道德理念的指引，像水一样以柔克刚。但暴力还是发生了。反送中运动的暴力是应激型的，也就是说由警方镇压升级诱发的，并非示威者主动要升级暴力，尽管也有很小一部分激进分子可能招致批评。但是总的来说，如果组织化程度低、镇压极其严酷、或者真实民怨表诉渠道全部堵塞，暴力就更容易发生（或者失控）。比如示威者占领立法会——其过程是非暴力的，毕竟示威者没袭击任何人——就是因为市民意识到民愤未得到正常回应：人民感到别无选择。

至于 1989 年“六四事件”，我认为关键的是有解放军将领（徐勤先将军——编者按）拒绝执行对人民开枪的命令。中共显然也汲取了历史教训，所以才反复要求解放军和武警对党忠诚，要求其严格执行党的命令。在我看来，中国社会运动要取得成功，要防范暴力螺旋升级，光是严格要求公民社会自我克制显然不够，还需要相当多数的安全部队拒绝执行对人民开枪的命令。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军队究竟是把党放在优先地位呢，还是把国家和人民放在优先地位。

对中国未来的社会运动来说，暴力对抗军警是不现实的。社会运动不能给

中共当局制造“镇压暴乱”口实，反而需要想办法占领道德高地。社会运动须要有清晰、具体而且现实的目标，其策略须灵活，其组织须有序。这些是为了敦促掌握武装和权力的人做正确的事情。

李：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领导者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也把道德高地当成反抗者的武器，把政治当成道德实践。这与部分现实主义政治派别所推崇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背道而驰。在情境对弱势群体不利的情况下，现实主义政治法则反而要让位给“道德政治”，这时候最弱的武器反而变成了最强的武器。道德政治可以说就是“弱者的武器”。这可能就是匈牙利小说家康拉德·哲尔吉（Konrád György）和哈维尔都在讲的“反政治的政治”，与“官僚政治”（排斥道德作为政治的优先法则）本质上不同之处。有很多政治反对者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种差别（也即仍然把道德当成是一种政治软弱）。

金：共产党自身也是一个关键变量。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期间，中共花了很长时间才决定武力清场，原因在于政治精英内部存在分歧：他们无法就应对策略达成一致意见。但这种情况在习近平掌权期间不会发生。不过，在“后习近平”时代，党内精英仍然有发生分裂的可能性。这可能给政治变革创造窗口期。

你之前说，有人担心没有共产党领导，中国就会天下大乱……

李：孟加拉和尼泊尔抗议活动都发生了不可原谅的暴力行为。但也有政治转型是和平进行的，比如菲律宾的“人民力量革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就是和平进行的，这种情况还有不少。井然有序的抗议活动跟

暴乱并不能划等号，尽管有的政权故意诱导暴力，使和平抗议偏离轨道，给“镇压暴乱”制造口实。事实上，除了一些守旧派毫无依据的恐惧之外，也找不到任何实质证据证明只要反对共产党就一定会天下大乱。

金：我确实认为中国在中共统治下，永远不会充分发挥其国家和人民的潜力。中共巴不得利用人民对混乱的恐惧来巩固其统治。根据当局的官方宣传，说是共产党带领国家走向富强的。但实际上中共拖累这个国家的时间也很长。如果没有中共，中国的国家潜力会不会发挥更充分呢？实际上中共官方宣传的叙事口径故意忽略了这一层面，因为现实是政权压抑着国家和人民自由发展、充分发展的潜力。

不应该用这种恐惧心理（即以为没有中共就会天下大乱）来阻止这个国家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如果中国真的要实现某种伟大抱负的话，列宁主义体制肯定不是中国人民发挥其潜力的最佳手段。不去探索改善国家的更好途径，单纯满足于维持现状（即维护中共统治）也一样可能扼杀一个国家的生命力。随着中国经济环境持续恶化下去，以后连维持现状或者回到以前的改革开放路线，也会变得不切实际。

李：我们来给今天的访谈简单收个尾吧。许多人认为习近平时代的威权主义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看法背后有一个显著的假设就是：如果习近平时代是威权主义巅峰，那么“后习近平时代”威权主义就可能回落一些。眼下我们还看不到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根据你对亚洲国家的了解，单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看，中国的专制体制是持续强化的可能性高呢，还是逐渐弱化的可能性更高？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在国家压迫之下，还有没有主动改善公民社会的空间？对此你有哪些比较好的建议

给我们的中国读者？

金：坦白说，我并不认为习近平时代达到了中国威权主义巅峰。当然前面已经提到，我更愿意用“极权主义”这种说法。习近平执政超过12年了，他面临的国内局势越发严峻，这是很难处理得好的。不管是经济衰退，还是人口萎缩，还有日渐升高的地缘政治压力……遵照经验法则来讲，独裁者晚年没几个愿意自由化。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持续收紧限制，不断巩固政权根基。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习近平继续执政）往后每年都会是威权主义巅峰。（如果不发生社会变革）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如果习近平再统治10年，你可以想象体制的压迫性年年“破纪录”会是什么样子。

但中国社会并不会那么逆来顺受，不管多严重的压迫都能承受不吭声。任何社会都有其极限，（考虑到其历史因素）中国社会也许要比别国承受极限更宽一点，但一样有极限（改朝换代的周期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表明其社会存在承受极限）。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破那个承受极限，但总归会有那么一天，所有人都受不了了。不过，我们确实需要想一想“后习近平时代”会是什么样子。习近平会留下一大堆“政治遗产”，但这些“政治遗产”也会给后来者造成巨大挑战：他们会在被迫政治转型和接续习近平“政治遗产”的两难困境中艰难挣扎。“后习近平时代”出现一个领导人软化意识形态声调当然也不是不可能，但不要指望他会支持民主开放或政治开放。我认为这不现实。

总的来说，大的趋势是中国的威权主义控制会不断增强，逼近某个极限的时候，政治转型还是会发生。普通中国民众有什么可以做呢？我认为其中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他们需要认识到，不管社会压迫成什么样，总有一定

的喘息空间。即使表面上看起来不可能，也要尽自己所能去创造反对空间。并不是要注册在籍的正式的非政府组织才算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也可能会包括社区委员会、业主协会、社区团体、社会互助网络、家庭教会和非正式宗教团体、志愿者组织、食品银行等等。如果我是中国读者，最重要的事就是保持社会参与，尽力与他人建立和维持联系。这看起来就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情，但如果整个社会都这样做，那差别就不得了了。总有办法在政治空间之外开辟新的空间，这取决于不断创新、不断尝试。现在可以说，中共政权政治合法性全都凝聚在习近平一人身上。但习近平总会死。习近平死后党内角逐政治合法性是不可避免的。政治机遇总会来的。但是如果中国的公民社会没有准备好，也可能错失政治机遇。

李：非常感谢你接受采访和你精彩的评论。

访谈

侯芷明
张崑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1期
2026年0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人们希望一切都能改变”



侯芷明



张崑

编按：“别担心，我走了以后，你去找玛丽，”一位中国流亡者生前曾这样嘱咐其妻子。他所说的玛丽，就是法国巴黎的中国问题专家 Marie Holzman，中文名“侯芷明”。侯芷明集学者、作家、记者、翻译家的身份于一身，长期担任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的中文教授。她以当代中国和中国异议人士为研究重心。从 1995 年开始，她被中国政府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单，迄今已 30 余年。在这一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访谈中，侯芷明教授追述了自己在一些关键时刻的所感所思，她接触或目睹过的中国民主运动中的重大事件，以及参与过的、在国际上为促进中国人权状况所做的努力。感谢旅居巴黎的历史学博士张崑先生接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对侯芷明教授做这个访谈。它是本刊对国际上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系列访谈计划的一部分。

张崑（以下简称“张”）：你出生在 1952 年的巴黎，一个战后重建、又充满思想激荡的年代。能否先请你回忆一下童年、少年时期的家庭氛围？

侯芷明（以下简称“侯”）：我生命的前三年几乎都是在密歇根州度过的。所以我从小就听美式英语。当然，美式英语很容易被小孩子接受。我母亲

说法语。就这样，我的童年算是……早期的国际化，由于我母亲当时英语不太好，她只跟我说法语，而我和其他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会用我自己也不懂什么意思的英语跟他们聊几句，其中不少成为此后我父母很喜欢提起的趣事。

后来，我和父母一起回到法国……我父亲在二战后加入了美国军队，他当时年纪太小，没有参加过战争，但他参与了战后美国在韩国的军事驻留与教育项目。在那里，他教韩国学生英语，他说那段经历非常棒。学生们都很可爱；他在韩国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他有很多机会继续深造并获得奖学金。他收到的第一份奖学金让他得以在日本学习汉学一年半。于是，我们三人乘船、火车等等，一路旅行。我们去了埃及、印度、柬埔寨等等，最后才抵达日本。我对那次旅行记忆犹新，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在日本待了一年半，期间我的日语变得非常流利。但不幸的是，等我五岁半再回到日本的时候，我变得只会说法语了，日语完全忘记了。这很可惜，后来在大学里，我不得不重新学习日语。好在学习汉语也能顺便学习日语。我始终认为，我的大脑如此彻底地沉浸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这对我的语言学习大有裨益。

之后，我就成了一个非常普通的法国小女孩。但很显然，我受到了当时历史的影响。而那段时期，也就是 20 世纪 60 年代——确切地说，是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其历史背景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法国发生了许多恐怖袭击，因为当时有很多非常保守的人认为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领土，所以绝对不能让阿尔及利亚独立。甚至还发生了刺杀总统戴高乐的未遂事件。那真是一段相当可怕的时期。有两件事深深地影响了我。

第一件事是我的小学老师。有一次她走进教室……她告诉我们，我记不清她具体说了什么，但她哭了，因为她的丈夫刚刚去打仗了。显然，她非常害怕失去丈夫。我当时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我仍然能感受到她的悲伤和痛苦。

第二件事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注：法国实施家庭医生制，每人都可以就近找一位医生签约为长期关系的家庭医生）因为一个 OAS（当时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极右翼组织）的成员治疗伤口，却没把他交给警察，而被判了监禁一年。结果，整整一年，我们家都没有家庭医生。一年后，他回来了。他跟我们讲了他在监狱里的生活，他被关押在雷岛（Île de Ré）的政治犯监狱里。每天晚上，他都会和其他政治犯一起调鸡尾酒喝。他以前就爱喝酒，从监狱回来后干脆成了真正的酒鬼。

他是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政治犯”。但同时，这也让我对政治犯监狱有了非常独特的印象。因为他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一点也不像在演戏。

后来，1968年，我16岁了，那时的情况截然不同了。

张：1968年五月风暴时你在巴黎？

侯：我住在郊区，但去巴黎很方便。我认识了丹尼尔·科恩-本迪特，你知道，他是“五月风暴”的领导人，现在他对法国政坛仍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他是法德混血。我和他们有接触，但并没有积极参与，因为我年纪太小，而且主要是因为那时我父亲第三次带我们出国。这次我们去了台湾。我稍

后会谈到那段经历。

张：那时，法国有多少毛派分子？

侯：几乎人人都是。我的感觉是——我不能肯定地说——参与“五月风暴”运动的人中，95%都是不同程度的毛派分子。

张：你对法国的毛派有什么印象？

侯：我很难理解他们。我的意思是，我之前看过一些《毛主席语录》，但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苏联入侵布拉格，当时那个年轻人，我记得好像叫扬·帕拉赫，在布拉格市温赛斯拉斯广场自焚身亡（注：后来该广场以他为名）。这件事非常震撼，因为它是共产主义中欧的缩影。所以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毛主义者，更不是苏联支持者。

张：你随父母第三次出国，去台湾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时的你，对“中文”与“中式生活”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侯：那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愉快。首先，因为台湾当时仍然很日本化。而我对日本文化很亲切，所以很容易适应。我们住在一栋日式房屋里，铺着榻榻米，我很喜欢那里。对我来说有点异国情调，感觉非常愉悦。

张：没遇到适应上的困难？

侯：没有。我们的生活真的很愉快。但真正激发我对中文和中国兴趣的，

首先是我觉得我学得很快。因为我在台湾上的是一所外国人学校，当时台湾有很多美国人，还有军事基地等等。那里的课程很好，老师也很好，我学得也很快。后来我还请了一位家教，他来我家教我一些汉字和短语。我觉得自己学中文……很容易？不，应该说非常容易，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仅仅六个月后，我就能和中国人交流了。之后，我父亲去看望朋友之类的，我也会跟着去。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台湾人社交互动的质量。他们非常热情好客，我们受到了很好的款待。而且，他们的互动中也充满了乐趣。中国人喜欢玩猜拳、剪刀锤子布之类的游戏。他们喜欢在公园里散步。他们有一种集体生活的氛围，这非常令人愉悦。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在法国，就比较正式，有点拘谨。你会带一束鲜花，喝一杯鸡尾酒，诸如此类。我不会说它很死板，但当时确实要正式得多。我当时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师生关系、教授之间的关系等等，都给我很温暖的印象，这或许有点不真实，因为我对那里的社会并不了解，但这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回到法国后，因为我生性比较懒散，我就想不如直接跳级读大学二年级吧。他们用中文面试了我，随即就同意了。于是我跳过了大一。我当时非常高兴，因为这意味着我两年就能拿到学士学位，而不是三年；三年就能拿到硕士学位，而不是四年。就这样，在法国待了三年后，我又回到了日本，待了将近三年。因为当时中国是闭关锁国的。就这样，1972-1975年，我先是待在日本。1975年我在台湾待了六个月。然后，九月份，我去了中国。

张：你为什么对中国感兴趣呢？

侯：因为那是我的研究课题。我学过中文，顺便又重新学了一遍日语。到日本的时候，我就又开始说日语了。我很喜欢日本的审美，喜欢那里的人民。

但那不是我的研究课题。我的研究课题是中文。

张：那段历程在你的记忆中是怎样展开的？有没有一些“决定性瞬间”？

侯：要知道我们这一代人中，很多人信奉毛主义，而我不是，因为我去了台湾，那里不是毛派的地盘。当然，那时的台湾也是独裁的。1975年蒋介石去世的时候，我刚到台北。那一夜狂风暴雨、电闪雷鸣，非常壮观，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第二天早上醒来，得知蒋介石去世了。这感觉很奇怪。我并不迷信，但即便如此，那晚也令人难忘。就这样，我以某种方式见证了蒋介石的逝世，整整一个月，电视上都在哀悼，没有轻松的节目，一切都是悲伤，悲伤，悲伤。然后我到了北京，76年，这一回是毛泽东。就这样，我两种情况都看到了。最有趣的是比较这两者，它们本质上是如此相似。

张：相似？

侯：是的，因为它们的仪式是一样的：先是大家都得哭，然后是电视上也类似，接着是大家都要戴黑纱，等等。两边的仪式非常相似。这真的让我印象深刻。我当时想，“中国毕竟是中国，两边都是中国”。这句话不适合现在，现在两边完全不一样，可那个时候其实很相似。

但当时，我并没有在台湾感受到独裁统治。台湾确实有政治逮捕等等，但白色恐怖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那之后，我从未感到。唯一让我感到一丝拘束的时刻是去看电影的时候。电影开始前，要唱国歌，所有人都要起立。你能感受到一点独裁统治的气息，比如对领导人的尊重等等。但那只是个细节。我年轻的时候不太关心政治，也不太政治化。但对我来说，

在台湾的生活很完美。没有任何问题。

张：你那个时候去大陆，会感受到很大的反差吗？

侯：是的，反差非常大。比如，在台湾，你可以租一套合租公寓，那套公寓里住着三个法国女人和两个台湾男人。其中一个法国女人甚至嫁给了一个中国男人。这在中国大陆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刚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外国人被当成魔鬼对待，和普通中国人建立友好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学校的同学和职员那里，你可以和他们聊聊天，但非常谨慎；你不能什么都聊。在台湾，你根本不会考虑这些！比如，我记得有个男人娶了个法国女人，他最大的恐惧就是要服兵役。因为 18 岁后，你必须服三年兵役。但我们就此谈论得很坦诚，没有任何禁忌。至少，我从未感到过丝毫禁忌。在台湾的时候，如果我想去台南或者台中，只要在火车站买票就行了。

而到了中国大陆，哎呀，想去哪儿旅行，都需要授权，需要证明，买票几乎不可能。所以对我来说，差别是巨大的。

张：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吗？

侯：冲击倒是没有，虽然我知道中国不一样，也略有耳闻。但我几乎所有的法国同学都是毛派，而我被当成了彻头彻尾的白痴。

因为我父亲是美国人，我自然而然地受到了美国文化的影响。在美国，阶级意识并不强烈。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等。在当时的美国，一个优秀的工人，收入可以和大学教授一样多。可以说，社会差异状况完全不同。

我认为，作为一个拥有美国和欧洲双重血统的人，我受到了这种影响，但显然，我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政治理想。我受到的影响方式不同。我在17、18岁的时候读过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我最喜欢的是布科夫斯基，他的《风继续吹拂》是一部杰作。布科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一样，都曾在苏联被监禁，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作家。对我来说，共产主义是可怕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它意味着自由的缺失和权力的暴力。

当我抵达“中国”时，我途经台湾。台湾的人说共产党是魔鬼，是恐怖分子等等。当然，我当时也有这种想法，这与我的信念相符。当我开始在中国生活时，我的信念发生了变化。不是说我接受了共产主义，我一直都反对它。在中国，我非常清楚地看到，自由在任何层面都不存在。我的同学，其中一个戴了丝带，就遭到批评。在这里，即使她留着长发，也不可能绑丝带。我亲眼目睹了自由的缺失。它非常暴力。我在中国待了四年，直到北京之春之前，当时我想：“中国人那样生活，是因为他们想那样生活，那是他们的问题，与我无关。”我接受了这一点。

张：这期间几个令人影响深刻的“瞬间”：1968年“五月风暴”的时候你在巴黎，1975年蒋介石去世你正在台北，1976年毛泽东去世你在北京……

侯：第四个时刻是1978年。对我来说，那是最重要的时刻。它改变了我的一生。

张：1978年“北京之春”、西单民主墙出现时，你当时是在北京的留学生？

侯：我是1975年去的中国，起初，我在北京语言学院留学。1978年民主

墙出现时，我已经不是学生了，到了法新社做初级职员。

这期间，康生去世、周恩来去世、1976年发生四五运动、9月毛泽东去世，我一直都在北京。

我参加了康生的葬礼，葬礼在紫禁城举行。场面盛大，白色的花朵，美妙的音乐，所有的一切都美轮美奂，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那毕竟是康生，他并不是个心肠好的人。后来周恩来去世的时候，我在北京语言学院。我们有一个洗手间，就是那种水槽，冷水。我总是很早就去洗手。当时有个中国女生在那里刷牙，一边刷一边哭。那时我并不知道，她已经知道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了。看到有人一边刷牙一边哭，我感到很震惊。然后，她告诉我：“周总理逝世了。”这件事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当一位伟大的政治人物去世时，我们会举行仪式，但我们不会哭，因为那不是我的表兄，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的父亲。接下来的几周，所有老师开会的时候，都在窃窃私语。我没听到，但我知道他们在谈论这件事情。他们不能让我们听，因为这太敏感了。

印象里，肃穆时期一直持续到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非常可怕，它改变了整个北京。因为在那之后，气氛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开始到处种豆子、南瓜、玉米，人行道上也种满了。那真是太好了，非常惬意。那时，建筑业三十年都没怎么发展，居民楼里空间紧张，已经没有地方了。于是，生活外溢到公共空间，人们就把火腿摆在楼外面。正值夏天，热闹非凡，有点像是在庆祝。然后，毛泽东去世了。人们也哭了，但方式却不一样。当时我在北大，有个中国姑娘，她来参加我们一起看电视直播的毛泽东世纪念仪式的聚会。第一天晚上，她回来跟我说了几句。我问她：“你看到了

什么？”她告诉我，“我的很多朋友都在哭，但我不会哭”，其实她很正常，还有点单纯。第二天晚上，她回来告诉我，有人问她跟我说了什么。她当时有点傻，就说：“我说我没哭。”真是糟糕！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彻底变了。她几乎再也不跟我说话了。这真的让我很受伤。

之后是华国锋，但对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一切照旧。我们还是去看样板戏。我们已经看过无数遍了，但我们还是得去看。电影也是一样，没什么乐趣。但在语言学院，我和一个女人成了朋友，我们有时会一起去公园聊聊天。后来，到了 1976 年，我虽然去了北大，但一直和她保持联系。所以，那时我们偶尔还会见面。有一天，警察来问她：“你和这个女人见过 13 次。为什么？”之后，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心想：“13 次？我都不记得了。”我以为我们可能只见过七八次。那时，她很害怕。我也很担心她。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 1978 年春天开始，邓小平掌权，随着他开始巩固权力，气氛也开始发生变化。例如，贵州的作家和诗人那年夏天去了北京，张贴了大幅海报，上面写着一些相当支持民主和自由的诗歌——虽然没有明说，但意思很明确。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邓小平下令释放了 1976 年运动的参与者。这些人，比如王军涛等被释放出狱，我相信，他们比以前更加渴望自由，因为他们经历过牢狱之灾。当你出狱后，你不想再回去；你希望一切都能改变。你能感受到那种氛围。

张：“人们希望一切都能改变”，当时人们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侯：你能在社会上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人们开始问我一些关于我生活水平的奇怪问题。他们会说：“你从来不打扫房子吗？”我会问：“为什么你这么问？我打扫。”他们会说：“不，因为你有机器人。”实际上，我认为他们指的是洗衣机、冰箱之类的东西。这一切开始传入中国，但很晚。所以，他们对我们的生活有一种完全错误、完全理想化的印象。但与此同时，你也能感受到一种对现代化的向往，对不同事物的向往。这就是为什么在那段时间里，有很多事情深深地影响了我。当然，民主墙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张：最初看到“民主墙”是什么情景？

侯：因为我会读中文，我就注意到那些贴在墙上的大字报。起初，还有些小小的神秘感，但后来那些大字报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而我们，每天都是晚上出去看大字报，因为白天害怕警察。记得那年冬天，天气很冷。11月底12月初，气温降到了零下20度。哦，真是太可怕了。我得了肺炎。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得这种病，也是最后一次，虽然得的是轻微的肺炎，但还是病得很厉害。

所以，每天晚上我都裹着厚厚的衣服去。因此，人们其实认不出我。但经常会有一些中国人过来和我悄悄聊天。有一次，其中一个偷偷塞给我一封信；我当时没察觉。后来我在口袋里发现了那封信。之后，中国人的反应让我始料未及。他们都对我说：“我们要自由，我们要人权，我们要这个，我们要那个……”有一个人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走过来问我：“你知道为什么中国没有索尔仁尼琴吗？”我非常惊讶他竟然知道索尔仁尼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我真的非常惊讶。他说：“因为如果我们有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他写不出三行字就已经被关进监狱了。”这句话深深触动

了我。我想：“这一定是真的。”因为我知道在中国，自由几乎不存在。但他居然知道索尔仁尼琴。于是，我晚上会和一些人进行一些简短而焦虑的谈话。正是在这些谈话中，我发现了任畹町、魏京生这些人的大字报。我非常感动，也很兴奋，因为它证明了中国人其实和我们一样。这让我安心了不少。之前我一直觉得，他们和我们不可能一样，这让我很担心。当我发现他们和我们一样时，我非常高兴。

张：这里有一个逆转。

侯：那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时期，我有很多东西要翻译。我翻译魏京生等人的作品，我陪着他们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并做翻译，我们熟悉了起来，那是一段很短暂的时光，1979年3月，魏京生被捕了。

张：今天你如何评价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那一代中国人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后来在中国社会中是如何被压抑、被转化或被延续的？

侯：20世纪80年代初非常令人惊讶，因为社会出现了真正的改变。例如，1979年秋天，魏京生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如果是在两年前，他就会被处决。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毛泽东去世后的两年里，他们仍然处决了一些人。这是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说，政治人物被视为重罪犯，但还没有到会被处决的地步。所以，社会氛围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仍然意义重大。

社会开始运转起来，或许仅仅是因为冰箱和洗衣机的普及，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减少了。生活变得更容易了。我们不必每晚洗衣服，也不必每天去购

物。然后就出现了所谓的百科全书热潮、翻译热潮等等。短短十年间，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什么都读；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的书籍，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我记得当时已经有了米歇尔·福柯的译本，所有大思想家、大企业家等等的译本，还有一些电影可以观看。我参加了在北京和上海举办的第一场音乐会，也是第一场当代音乐会，由让·米歇尔·雅尔演奏。让·米歇尔·雅尔在法国也非常有名。那真是第一场现代音乐会。虽然不是摇摆舞，但有点像，节奏感很强。真正搞笑的是，观众席里虽然有几个年轻人，但大部分都是士兵！

可同时让我无比震惊的，是（83年）“严打”。它来得很突然。西安一位女士因为组织舞会，那舞会既不隐秘，也不淫乱，她竟然被判处死刑。我想说的是，对我们这些观察者来说，20世纪80年代充满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例如，胡耀邦被解职就令人震惊，因为胡耀邦当时地位很高。我曾在爱丽舍宫亲眼见过胡耀邦和密特朗总统在一起，我还去莫鲁瓦（Pierre Mauroy）总理家拜访了赵紫阳。所以，我有机会和赵紫阳以及胡耀邦都聊过天。胡耀邦被解职，对中国和我们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因为这意味着，即使实行了改革开放，邓小平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与此同时，方励之到处都在说“我们需要民主”等等。这些矛盾一方面令人担忧，另一方面又令人兴奋。因为方励之能够频繁地与中国学生交流，并给很多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我认为这为八九运动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当然，苏晓康的电影也功不可没。这两个因素至关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尽管困难重重。可是对我个人而言，特别艰难的是，当你认识当事人，尤其当你真正了解一个人时，感觉就完全不同了。魏京生被判刑15年，我对这种痛苦的体会就会更深。

每当我人生中拥有快乐的时刻，比如和 1980 年出生的儿子一起度假时，我都会想到，我和儿子在度假，而魏京生却身陷囹圄。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正因如此，我才写了那么多关于魏京生的文章，不让他被遗忘。因为如果没有媒体和出版物报道他，这个人就会被遗忘。现在，恕我直言，我又开始关注伊力哈木·土赫提了。伊力哈木·土赫提在新疆被判处无期徒刑，目前被关押在乌鲁木齐的一所监狱里。2019 年，我们为他争取到了欧盟萨哈罗夫奖，他的声誉得以延续。一月份，我要去布拉格参加伊力哈木·土赫提的纪念仪式。我们一直铭记着像刘晓波那样可能死在狱中的人。这一切都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正因如此，我无法停止。

张：谢谢。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从中国回到法国后，继续研究汉学，对吗？

侯：不，不。我在巴黎七大汉学系教书，但我不是那种学术意义上的汉学家。

张：你最早的著作《与中国同行》（Avec les Chinois, 1981）试图向法国读者介绍怎样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如果今天重写这本书，你会有哪些不同的选择？

侯：如果今天重写这本书，我不会有不同的选择。我什么也不能修改，因为它是一份证词。它记录了我当时所见所闻。所以，这是无法改变的。

张：是的，这不仅对你自己是一段非常深刻的记忆，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段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忆。我完全理解。

侯：谢谢。

张：在你的作品中，普通人的命运、日常生活与宏大政治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张力。你是如何处理这种张力的？在研究中国民主运动人物时，哪一位的生命历程最令你触动？为什么？

侯：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人显然是魏京生。因为，1979年3月29日，他被逮捕，后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我当时还年轻，那时对我那个年纪的人来说，15年就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几年后，当我见到赵紫阳时，我对他说：“为什么不释放魏京生呢？太可惜了，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如果他能为中国效力，而不是待在监狱里，那就更好了。”他给了我一个非同寻常的回答。他说：“魏京生还年轻，等他出狱后，还能做点什么。”他说：“如果年纪大了才进监狱，那就完了。”后来，赵紫阳被软禁在家，直到去世。我一直记得他这句话，因为他最终死于软禁之中。这就像死在监狱里一样；他一语成谶，年纪大了才被监禁，再也无法做任何事了。

魏京生在1993年被释放了大约六个月，因为中国要申请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在9月份，他们释放了他，而奥委会的投票在10月份。可是奥委会会觉得受到了侮辱，“你们在耍我们，你们三周前才释放了他。”而中国方面表示“我们提前释放了他”。可是，魏京生已经在监狱里服刑14年半了。那不能算是表达提前释放的善意，六个月不能算，至少提前三年才算。

从1979年3月28日，到1994年3月28日，理论上，是他在监狱的15年刑期。可是，他们等到3月29日他重获自由之后，再次逮捕了他。你能想象吗？太可怕了！这件事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当时，我召集了我认识的所有人，包括罗伯特·巴丹戴尔（1981年至1986年法国司法部长，任内促使法国在1981年10月9日废除死刑）。1994年，罗伯特·巴丹戴尔告诉我：“我

会去北京为魏京生辩护，参加他的下一次庭审。”庭审确实在 1994 年举行。但是，他失踪了一年。于是，我和他的妹妹珊珊一起去了北京。他妹妹到处打听魏京生的下落，因为他失踪了一年。他们只说他活着，但没说具体位置。事实上，他当时身处某个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就像所有被失踪的人一样。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在香港开了个小型记者会，说：“我和珊珊去了北京，打听魏京生在哪儿。”于是，我们印了明信片，问魏京生在哪儿。之后，从 1995 年开始，我就被禁止入境中国，因为我做了这件事。

张：直到今天？三十年了没能去中国了？

侯：是的，当然。所以对我来说，这显然是决定性的因素。然后，1997 年，多亏了江泽民和比尔·克林顿（的政治交易），他被送到了美国。我可以给你讲个故事。他被关在山东的一个盐矿里。那段日子非常糟糕，对健康极其有害。一天晚上，他的狱警过来对他说：“你坐出租车去机场。”那可是一整夜的车程。狱警突然注意到他的裤子，说：“你不能穿着这条裤子走。”于是狱警脱下裤子给了魏京生，让他可以穿着不是囚服的裤子离开。就这样，魏京生穿着狱警的裤子抵达了美国。真是不可思议。他在机场见了家人——他的父亲、兄弟，或许还有妹妹——一个小时。之后，直到今天，他都再也回不去了。

我经常和魏小涛聊天，他是魏京生的弟弟。魏小涛后来在法国去世。他大概在 2000 年或 2001 年（我记不清了）从中国来看望他哥哥，魏京生当时在巴黎出席一个活动，他们见了面。之后，魏小涛坐飞机回国，到了机场，有人告诉他：“你回巴黎去。”就这样，他被流放了。他又回到了法国，我当时有点不知所措。我那时要处理的事务工作量很大。比如张健也刚到

法国，等等。于是我跟魏小涛说：“让你哥哥帮帮忙，这样你就能在美国获得政治庇护了。”因为当时我不太喜欢魏小涛，他跟他哥哥很不一样。但一年后，魏小涛申请的政治庇护被拒绝了，美国人不接受他，魏小涛只能在法国寻求政治庇护。然后我就不得不帮他了。之后，我们成了朋友。我一直陪着他，直到他去世。他 2019 年去世了。我们经常聊天，就我们俩。我对他说：“哎呀，我好累，什么时候可以退休？”他回答：“你永远不能退休。”我问他：“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可怜的玛丽，必须照顾我们这些中国人。”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滑稽，但真的很有意思。他去世前，总是跟妻子说：“别担心，我走了以后，你去找玛丽。”而现在，阿青（音）成了我的妹妹。

张：面对中国异议人士与人权议题，这么多年下来，你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或在某些时期被重新诠释过？还是从来都没有什么变化？

侯：中国每十年都会发生变化。这很不寻常。1966 年，文化大革命。1976 年，毛泽东去世。1985-86 年，胡耀邦被赶下台。但邓小平上台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然后是 1989 年，又是一次巨大的变革。但从 1989 年到 1999 年，出现了一个新的机遇窗口，这显然是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所触发的。因此，他们准备做出很多让步。当时，有一位非常出色的苏格兰女性玛丽·罗宾逊，是日内瓦人权委员会主席。她在中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多次访问中国，正是她促成了“劳改”改为“监狱”，她帮助废除了这项法令。她说这是违法的，而且必须签署两项主要的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国际公约》。但是，中国签署并批准了第一项，但从未批准第二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没

有真正的工会，因为中国没有批准第二项公约（第一项公约里的工会权在中国批准时予以保留，也就是可以不遵守——编者注）。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没有批准该公约的国家之一，也是联合国最重要的五十个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批准该公约的国家。当时，关于死刑的讨论很多。她为此奔走呼吁。那时，中方表示：“好的，我们同意与你们讨论死刑问题。”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英国人权倡导者代表团从英国来到这里。他们非常兴奋。他们告诉我：“你知道吗，中方同意与我们讨论死刑问题。”但我认为那只是缓兵之计，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如此。

然后是比尔·克林顿推行的最惠国待遇。那时美国国会每年都要重新进行“最惠国待遇”审查，所以每年我们都要去奋斗，表达立场，希望能在中有所改善之后再给他们“最惠国待遇”。总之，我们为此斗争了很多年。可是，到了2000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不再需要每年审议“最惠国待遇”。人权时代结束了。这是一个转折点。一切都变成了生意。

张：你曾多次强调，希望让西方听到中国内部对民主的诉求。你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取得了多少成功？最大的挫折来自哪里？

侯：我们取得的最大成就是2008年奥运会。我们在2002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得知北京奥运会即将举办后，我们立即与废除酷刑协会、无国界记者组织、人权联盟、国际特赦组织等众多机构，当然还有我所在的“团结中国”组织联合起来，每月都开会。我们撰写了一本谴责所有侵犯人权行为的小册子。我们组织示威游行，召开了多次新闻发布会，并协助传播有关当地情况的影片。其中有一部影片，名为《前门前》，讲述了所有房屋如何被拆毁，为即将到来的灾难做准备。还有艾未未的言论，他也持非

常批判的态度。总之，我们广泛传播了所有这些信息。当北京奥运代表团访问巴黎时，整个城市都爆发了示威游行。所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巨大的成功一直持续到 2009 年，因为 2009 年是 1989 年之后的 20 周年。在 2009 年，我受邀前往法国至少 20 个城市，谈论 1989 年。这非常重要，所以，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张：那最大的挫折呢？

侯：直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我们还能做（人道救援），这往往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实现的。因为 1975-1976 年我在北京的时候，我认识那里的美国外交官，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其中一位外交官，我就不透露他的名字了，他身居要职。所以，当有政治犯或其他类似情况时，我会请他帮忙争取释放。他成功了好几次。这算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小秘密，但确实奏效了。2000 年之后，就没了！再也没有人被释放了。这是世贸组织的缘故。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就再也不买那位美国外交官的帐了。

张：你与许多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和流亡者有长期私人交往，也常帮助他们处理生活与行政事务。长期接触这些沉重的故事，你如何进行自我调适？

侯：实际上，我想说，直到 2010 年左右，我都深受影响。而且很奇怪的是，我想到一位名叫李和平的人权律师。有一天，我打开电脑，看到李和平被警察逮捕，警察还殴打了他等等。我看到这些，突然间，我意识到，我完全泪流满面。我想，这不可能，因为李和平也不算年轻。他是个颇有名望的人，我想象着他落入歹徒手中，被那样殴打，这让我感到无比恐惧。我的反应与其说是情绪化的，不如说是本能的。我当时都没意识到自己已经

泪流满面，那几乎是我最后一次经历这种事。你必须保持距离。如果你不保持距离——而很多维权人士却不知道如何保持距离——他们会生病，会疯掉，甚至会自杀。我认识几个这样的人。因为经历这一切真的太难熬了。我想那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心想，就算我哭，也于事无补。靠哭救不出来李和平，也改变不了中国。所以，哭也没用，也不值得！

但对我来说，最有作用的还是音乐。我父亲总是听音乐，无时无刻不在听。我是为了音乐四处旅行的人。只要有我感兴趣的音乐会，比如今年夏天我就去了芬兰。去年冬天，我去了德国的德累斯顿。明年一月，我要去巴士底狱听瓦格纳的音乐会。我热爱瓦格纳。我觉得对于热爱音乐的人来说，它意义非凡。我指的是古典音乐，比如，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我年轻的时候当然很崇拜他。但现在，这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对人类灵魂有更深的理解。例如，在我丈夫于2008年去世后，我听到了一首巴赫的曲子，叫做《Bis du bei mir》，意思是“如果你在我身边，我可以握着你的手，我死而无憾”。丈夫去世后，每次听到这首曲子，我都会哭。但同时，它又是如此美丽，如此真切。它超越了世俗，而能够超越日常世界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永远无法超越，永远停留在那个层面，那就太难了。

张：有没有一件小事——可能与孩子、家人或朋友有关——让你在最疲惫的时候重新感到“这一切值得”？

侯：我曾经有个中国朋友，他处境很艰难，他捍卫人权，却总是听到这样那样的坏消息。他一度想要自杀。因此我花了很多时间陪他。有一次，我给他看了我孙子和孙女的照片。我对他说：“你有个十岁的女儿吗？等你

到了我这个年纪，也会有孙子孙女的照片，那时你就会明白，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想他明白了。总之，他最终没有自杀。我们现在是很好的朋友，他一切都好。

张：感谢你为中国所做的一切！再次感谢你接受这个访谈。

笔谈

陈健民
胡平
吕频
张艾枚
陈奎德
吴强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1期
2026年0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知识分子与反抗 的共同体

编按：在非民主国家争取自由的艰巨事业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主要责任是生产和传播知识、思想，基本表现方式则是言论。这固然似乎没有错。但言论通常是个体的，表现空间也总是很有限。“仅仅个人是不够的，还要有集体的行动”，哈维尔曾说¹。

因此，我们在这里引入一个供讨论的概念——“反抗的共同体”²，以方便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就这里的范围而言，“反抗的共同体”涉及两个层面的联结，即知识分子彼此之间以及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联结。例如，对于知识人中极少数敢于发声、受到官方惩罚的“敏感”人物，是竭力避免还是保持接触，抵制官方孤立异议者的企图³？再如，在像1989年那种学生抗议运动发生的时候，是至多只充当政府与学生之间的“信使”、“中介人”，还是加入到抗议的一方当中承担起更大责任？在导致波兰民主化的“团结运动”中，知识分子较早成立了“支持工人委员会”，这对于中国学人是否也是值得借鉴的一种联结？

很明显，联结还是切割、旁观抑或参与，这是向往自由的人们会真切面对、可能带来重大影响的问题。“反抗的共同体”是否一个有价值的设想，如何界定其涵义，可以设定怎样的目标？这样一个共同体如何可能，是否可以、如何从生活的近处开始？其他国家的反对运动中有什么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民主季刊》就这些问题，邀请到了陈健民、胡平、吕频、张艾枚、陈奎德、吴强等学者和观察人士发表评论，结成了以下笔谈。



陈健民（香港“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台湾中研院社会所客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马岳教授于2020年出版《反抗的共同体》，分析港人如何在抗争中产生一种不分老幼贵贱、同气连枝，无论是悲是痛是迷茫，都愿意共同承担

的“命运共同体”。该书集中讨论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中，人们不再依赖“大台”的指示，自己寻找力所能及的位置，去进行“和理非”（游行、集会、组人链、建连侬墙）或“勇武”（以身体、砖头、汽油弹还击警察）的抗争。示威者以“手足”互称，为了避免2014年雨伞运动的内部分裂，提出“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及“和勇不分，永不割席”的口号。最能代表席运动的《愿荣光归香港》一曲中，人们唱出包含“流泪、愤恨、恐惧、彷徨、流血”等字眼的歌词，但亦有“同行儿女”、“来齐集这里，来全力对抗”般的字句，表达一种“全民团结牺牲为香港这片土地奋斗的意象”。不过马岳认为这种命运共同体早于2013年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便萌芽。当时占中三子举办商讨日、民间公投等活动引发对政制改革和公民抗命的争论，“彷彿在反覆诘问每个香港人可以为香港做些什么，以及自己愿意为香港的民主前景和自由自主付出多少。”

所谓“命运共同体”指的是一群人之间因制度、结构或互动而被深度连结，彼此的风险、利益与未来无法轻易分割，因此必须共同承担后果、共同做出抉择。在香港的处境，便是因为政治制度的封闭、政府对民主运动的残酷镇压，令民众觉得不能独善其身，必须紧密团结进行反抗。即是说，这个共同体不是每个港人都会自动成为成员，它是透过实践（互相承认、共同决策、共同抗争）和叙事（我们是谁，我们一起面对什么）而建构出来，以黄色作为标记（黄丝带、黄色经济圈）。

即使港人现时无法做出公开的抵抗，目睹以千计的示威者和反对派领袖被捕，《苹果日报》及《立场新闻》等主要负责人相继入狱，许多有份参与示威、在民主派初选中投过票的港人都有一种无言的内疚，觉得政治犯是代替他们承受囹圄之苦。因此之故，许多港人会到法庭旁听，支持黎智英、邹幸彤、林

卓廷、何桂蓝等以法律抗辩去控诉不公义的制度。亦有许多人会透过探监和写信支持狱中的政治犯。这些支持者自身饱历政治创伤，惟有透过一些非正式的网络围炉取暖，相濡以沫。我称呼这个群体为“受苦共同体”，其实只是“反抗共同体”的另一种形态，是一种对强权的隐性抵抗。

知识份子在这共同体中的角色何在？香港民主运动一直有知识份子的身影，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政治组织中（如太平山学会、汇点）均有大学教授及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参与其中。其后成立的民主党派（如民主党及公民党）亦有不少学者参与其中，甚至成为党主席（如关信基、杨森）。而占中运动中的占中三子，便有两位是大学教授。香港民主发展网络（已解散）多年来亦曾组织学者发表联署声明、在报章撰写文章并到各中学演讲。总的来说，香港知识份子对抗争运动有两大贡献：1）建立论述——批判不公义的制度，说明民主的重要性；2）提高认受性——没有政党背景及商业利益的知识份子形成一股清流参与抗争，有助提高民主运动的认受性。与中国五四运动及捷克“七七宪章”一脉相承，香港知识份子是以“理性论政”及“活得磊落真诚”的精神投入这个“反抗共同体”。



胡平（《北京之春》荣誉主编、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这次笔谈的题目是“知识分子与反抗的共同体”。乍一看去，知识分子似乎是最难形成共同体的。别的群体，至少从理论上说是有共同利益的，因此可以形成共同体。或者说，别的群体本来就是按照其共同利益来定义的。知识分子则不然。因为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就是持有不同观点而互相争论不休。借用早先那套阶级斗争的术语，那就是，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持有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不存在知识分子阶级。知识分子不是共同体。

如果说持有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也有共同利益，那就是他们都需要发表言论的空间即言论自由。但也不尽如此，因为有些主张专制主张极权的知识分子就是反对言论自由的。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认同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这一共同体就是通过争取和维护言论自由而形成的。

记得 2009 年年底，刘晓波被判重刑。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向她的知识界文化界同仁发去询问，请他们谈谈对刘晓波案件的看法。有些人没有回复，而几乎所有的回复者都对刘晓波被判刑表示反对。有些回复者声明他对刘晓波的观点并不赞同，甚至强烈反对，但是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对刘晓波以言治罪。有的人干脆引用伏尔泰那句名言——“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反对刘晓波的观点。或许有些人本来是赞成的，但不敢明说，甚至还要假装说不赞成，免得给自己惹麻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捍卫了刘晓波的权利，维护了言论自由。这种说法的好处是，风险很小——因为你并没有表示你赞成那种“反动观点”，你甚至还表示和反动言论“划清了界限”，当局怎么好整你呢？这件事告诉我们，争取和维护言论自由其实并不艰难也没多大风险。

当局惩治异议人士的一个手法是孤立异议者，要大家与之划清界限。我们要建立知识分子的反抗的共同体，就要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要和“划清界限”划清界限。

这里有两个榜样，第一个是杨小凯。杨小凯潜心治学，他没有参加过异议人士的组织，但从来不忌讳和异议人士公开交往，从不忌讳在异议人士办的刊物上用真名真姓发表文章，也多次参加过反对政治迫害、争取言论自由的签名活动。另一个是徐友渔。徐友渔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但同时他

又和被当局打入另册的异议人士相处无间。由于当局的威胁和抹黑，很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总是避免和体制外的异议人士沾边。徐友渔决意要改变这种情况，他和刘晓波成为好朋友。他和晓波倾心交谈，达成共识：“今后，就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而言，如果看法一致，我们可以在同一份声明或呼吁上发声，让我们的主张以一个系列而不是两个系列的面貌出现，让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界限不复存在。”这样做的人多了，当局孤立异议者的意图就破产了，反抗的共同体就形成了。



吕频（原《女权之声》微博号主编、美国罗格斯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我们需要放下对社会运动的一种想象：思想的火种一旦播下，时机成熟时民众自然响应，届时振臂一呼即可。这种想象既浪漫天真也是等级式的，让智识领袖们有理由安居书斋，将尚未行动归咎于条件不成熟、民众不觉醒。

但现实中的运动不是对启蒙的自发回响。即使会在某个偶然临界点上涌现，也不会自动持续并达效能。从框架设定、动员组织到执行方案，每一步都是具体的工作，而其中需要的经验、勇气和智慧是被极大低估的。还有那些最微小的情感性的和物质性的劳动——谁把食物送进来，谁把垃圾运出去，谁在照顾生病的同伴，谁在安抚崩溃的情绪——才是真正支撑运动的。运动中的许多劳动在幕后、避免被记录、或者不甚被承认，却承担压力、消耗身心，甚至受很多伤。这些弄脏双手却不被充分赋值的劳动，与学术工作对超然和可见性的追求恰好相反。

追求抵抗中的联结，需要做到不把思想生产置于组织劳动之上，这并不是什么道德要求，而是一种务实的必需。

以及，我们应该觉察运动对知识与实践之排位的挑战。学术生产的本质是向过去学习——我们阅读文献、整理档案、分析已经发生的事件，试图从中提炼普遍和预测。但抵抗在当下发生，它打开的是从未被预见的情景，从未被期待或又需要历练的行动者，变化不定和缺乏信息下的决策需求……文献无法训练人们如何行动，而行动所提出的太多问题逼迫当事人进入思想循环：推演，尝试，验证。社会运动要求我必须开动脑筋，无法一个人苦思，而是投身到人群中，感知和回应她们的反馈，而且接受可能很残酷但最珍贵的答案。而当运动下行，我深感枯竭无味，不是因为缺乏阅读材料，而是因为暗淡了许多让思想燃烧的火花。毫无疑问，我不是否认知识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建议理解知识是在行动与反思的往返中生成，在具体处境的逼迫下成形。

我也主张用一种更机动的角度来理解共同体。这是我从女权主义哲学家艾利斯·杨那里学来的。她提出“序列”(series)这个概念：女性之所以构成一个群体，不是因为她们本质性地、持久地共享某种身份，而是因为她们在某时某地处于相似的结构性位置——就像等同一班公交车的乘客，各有各的出发点，各有各的目的地，只是暂时汇聚，因此在这有限的时空中有了共同的目的和利益。反抗或许也是如此。人们因为不想忍受压迫而走到一起，但不必预设他们会有深厚的认同、一致的理念、或长久的联结。共同体在相当程度上是策略性建构和运作的产物，而不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理想状态，等待我们去实现或回归。



张艾枚（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会长）：“反抗的共同体”是一个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概念，其内涵可从三个维度加以界定：第一，“共同体”并非指物理聚合，而是指在精神与价值方面形成认同的群体；第二，“反

抗”意味着对专制秩序的拒绝、对国家权力的质疑与挑战；第三，“反抗的共同体”是指在反抗实践中生成的群体，其成员共享“不服从”的伦理，在相互支持中创造新的社会关系。此一概念强调反抗从个体行为向集体行动的跃迁，其政治与社会影响力应大于个体抗争的简单叠加。

围绕“是否应当与受到官方严厉惩罚的敏感知识人保持接触”的问题，本文认为答案显然是肯定的。然而在现实中，这一判断经常受制于恐惧与风险。以纪念胡耀邦和赵紫阳基金会近年的实践为例：2022年与2024年国际研讨会文集出版后，我们在传播时遭遇明显的困境：我们希望这些研究能够在中国学术与公共空间引发真实对话，但现实却迫使我们必须审慎评估国内同行可能承担的政治风险，从而在事实上限制了公开而大规模的传播空间。

国内学者同样受到恐惧逻辑的制约。例如，有学者原本愿意为我们的国际研讨会投稿，却在得知我们被视为“靠近民运”后选择退出。其退缩并非源于价值分歧，而是源于政治高压下的风险评估。这种风险考量本身就构成了反抗共同体生成的障碍，使其即便出现，也往往只能在体制边缘以有限形式维系。

然而，仍有一些学者面对风险选择绝不退缩。徐友渔坚持“必须与像刘晓波这样的‘烈性传染病带菌者’保持交往”，以拒绝当局孤立异议者的企图。这是对恐惧机制最直接的反抗。阎淮在发表《胡耀邦最伟大功绩是解放一亿政治贱民》一文后，屡遭警察骚扰；但他表示，我不怕，都八十岁了，又没有软肋，他们能把我怎样？这些例子说明，在普遍的恐惧逻辑中，仍有人选择以行动拒绝屈从，通过承担公共责任抵抗恐惧。

正是这种由退缩与坚持交织而成的现实，揭示了中国反抗共同体生成的根本矛盾：困境与希望并存。习近平时期的政治高压进一步加剧困境，但坚定勇敢的抵抗者也使希望得以维系。

将中国情形与波兰“团结工会”以及香港反抗运动相比，可发现三者都在威权压力下形成共同体，也都伴随恐惧与风险。但差异亦十分显著：波兰工会在戒严时代依托教会网络维系共同体；香港在国安法后以去中心化组织方式延续群体联结；而中国的反抗共同体由于缺乏制度性缝隙、弱化的中介组织与缺席的跨阶层联盟，生成更为艰难。

波兰与香港的案例告诉我们：唯有让风险由集体承担而非个体独自承受，恐惧才会失效。能否构筑这样的“风险共享机制”，不仅决定中国反抗共同体的形成与存续，也关系到专制政权能否继续以恐惧为统治的核心逻辑。



陈奎德（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纵览中国》网刊主编）：中国正处于历史性的转型阶段。当此之时，中国知识人如何自我救赎，自我定位，使中国摆脱共产主义进入现代文明世界，是当代中国知识人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毛泽东曾经人云亦云，轻侮知识分子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毛断言历史转型的杠杆只凭枪杆子，知识人无足挂齿。其实，无论是西方四百年来的重要转型，还是三十多年前苏联东欧的史诗式巨变，亦或是中国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八九六四以来的历史演变，是非对错姑且不论，在这些历史场景中，知识人从未缺席，是重大变迁的先声。

1、准立宪过程：极而言之，知识界通过深思质疑答辩的思想交流及其精神成果的呈现凝结，实质上是一个国家的准立宪过程。如洛克 (John Locke)、康德 (Immanuel Kant) 、卢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亚当·斯密 (Adam Smith)、孟德斯鸠 (Baron de Montesquieu)、杰弗逊 (Jefferson)、麦迪逊 (Madison)、柏克 (Edmund Burke)、密尔 (S.J. Mill)…… 之于西方，如康有为讲学《万木草堂》、梁启超参与设计《钦定宪法大纲》、张謇等起草《清帝逊位诏书》、张君劢执笔《中华民国宪法》，胡适、雷震、殷海光的《自由中国》运动…… 之于中国，都形塑了历史演变过程。

换言之，“秀才”并非“造反”，而是“立宪”。他们建立或重塑了公共伦理、宪政架构、人权理念、法治框架。即是说，知识共同体在精神上为政治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2、中国式反智主义：各国知识人的生态环境是各不相同的。作为反抗的共同体，比较其他国家如前苏联和前东欧国家的知识界，中国知识人的生态环境更为险恶严峻。

鉴于毛式“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主义在中共党内的精神遗产，众所周知，中国知识界与执政当局的敌对程度超越了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知识界，不仅是 1968 年苏军碾压过的布拉格以及 77 宪章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不仅是当年波兰的团结工会顾问团，不仅是 1989 年秉烛游行和平抗争的东德知识界、基督徒，中国知识人还经历过知识分子“交心运动”的洗脑，经历过 1957 年整肃一百多万知识人的反右运动，经历过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经历过 1989 年的大屠杀；中国知识界作为反抗的共同体受到当局迫害的残酷程度远超他国。甚至在后毛时代，中共头目周永康还说过，

中国就那么二百多个公共知识分子，把他们全部活埋也是小事一桩。在习近平时代，中共的反智主义更加粗鄙残忍，对知识界的敌意愈演愈烈，言论封锁宛如铁桶，维稳经费超越军费，甚至巨额拨款雇佣小粉红污名化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人作为反抗的共同体，在极端的中国式反智主义环境中，势必付出更高的代价和承担更大的牺牲。这是中国知识人作为反抗的共同体的第一重困境。

3、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中国反抗的共同体的第二重困境，来自其政治实践中的困惑。

自由主义知识人与政治党派运作天然有一种隔膜。他们以独立见识为荣，不容易让渡自己的思想权利而变成政治机器中的螺丝钉。因此在反抗的共同体内出现异议，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强行统一思想将蜕变为列宁主义政党。鉴于此，反抗的共同体必定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群体，这是自由派共同体应当付出的代价。它在短期的政治博弈中或许表现软弱，但它的实力将在长时段的竞争中呈现出来。

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前后，反抗当局的群体分成两派：“勇武”派与“和理非”派。前者强调勇敢激进的抗暴斗争，以年轻学生为主；后者强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以民主党等组织内部年长的政治活动家为主。一度双方曾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但在运动过程中，各自都增强了对不同方式的理解，后来在整个反抗阵营出现了一句潮流用语叫“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它意味着“勇武”派与“和理非”派“和而不同”的联系。这句话充满智慧。目

标一致的派别，即使采取的策略不同，也都遵守了“不分化，不笃灰，不抹黑，不割席”的精神，从而破解了北京当局的分化阴谋。

这也同晚清至民国转折时期中国知识人中的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划分一样，当年致力于结束满清统治的中国士林对双方莫衷一是、难于抉择。革命派以孙中山、汪精卫为代表主张共和制；立宪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主张君主立宪制。双方曾激烈论战。但实际上他们欲达成的基本体制并无根本差异，均属宪政民主体制。只是革命派手法更激烈而已。事实上，当时中国地方精英很多都是既对革命派提供资金，又积极参与立宪运动的。最终，《清帝逊位诏书》体现了双方共享的价值——“重叠的共识”，导致了其共同的成就：帝制覆灭。

此外，如崔卫平教授披露的，1977年签署77宪章的捷克斯洛伐克知识人，也包括了一些认同宪章的体制内官员。这正是宪章的价值力量，而不是无原则的妥协。之后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辉煌成就，为包容性深广的77宪章做了见证。

4、凝聚“重叠的共识”：事实上，反对的共同体内部是存在“重叠的共识”的，否则，就不可能有该共同体了。即是说，共同体有其底线，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重叠的共识是共同体天经地义的基本价值，是共同体形成之始大家默认的前提。

譬如，77宪章的签署者的重叠的共识就是落实《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

Accords)。那是一份东西方 35 国政府（含前苏联、美国、欧洲各国）于 1975 年签署的国际协议，77 宪章签署者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履行它已经签署的人权承诺”。那是无论何种身份背景的宪章签署者重叠的共识。

《赫尔辛基协议》与《77 宪章》之间，是国际承诺转化为国内公民权利运动的经典案例。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法律依据、道德正当性和国际杠杆，后者则是前者在东欧阵营内部最具代表性的实践成果之一。

5、中国知识人与国际社会的互动：目前中国人权状况日益黑暗，但北京当局被国际主流社会孤立，内外交困，故常常被迫声称它将遵守联合国宪章及其相关法律文献云云，以摆脱困境。有鉴于此，中国知识人共同体有必要联手主流国际社会，坚定要求北京严格而具体地遵守和兑现对《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承诺。实际上《赫尔辛基协议》在第 7 章中就特别提到签字国应依据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尊重人权、宗教和信仰自由。

有人或以为国际社会的压力对流氓式的北京政权已不起作用。但人们或没有看清中共当下的危机态势。笔者曾预判，近年来北京高层权斗愈演愈烈，双方均失却了退路；而各方又认定同在一条船上，绝不能让船外知晓。然而，既然内斗已演变成“死亡的螺旋”，这种螺旋上升的逻辑是：当白热化权斗相持不下你死我活时，为压倒对方必定有一方要诉诸船外——民间力量，以冲破僵局，改变平衡。因而，包裹黑箱船体的铁幕势将被撕开一个裂口。近日发生的一个爆炸性消息印证了上述直觉：突然，六四抗命的徐勤先将军在军事法庭被审讯的录像令人惊愕地出现于公众视野。这份在黑箱里已经密封了 35 年的录像，在当下这个诡谲敏感的历史时刻破土而出，

它意味着什么？它将是冲决中国知识人作为反抗的共同体的困境的历史性契机吗？

值此全球动荡不安的大变局中，那或许是举世翘首以待的“中国时刻”。



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博士、原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当俄乌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这场战争的久拖不决乃至可能永久化的趋势终于在民主世界内部引发空前的绥靖压力。在历时近一年的不断拉扯和反复之后，以所谓俄美协议“28条”和新近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为标志，美国向乌克兰和欧洲分别表明了以土地换和平和放弃承担北约义务的新孤立主义指针。这也是否认跨大西洋联盟的意义、否认以民主和威权进行全球阵营划分、也否认美国维护全球和平与民主责任的新绥靖。

而早在此前，过去十年间，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向为标志，发生了一场集体弃绝自由主义的迷失。到今天，这一转向已经囊括了几乎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如果他们还自认知识分子的话），以及知识分子之外更为广大的工程师们、符号工作者、或者新中产阶级、甚至还有那些统治阶层的精英们，他们正集体拜倒在AI脚下。这种集体转向的迷思，堪称一种智识绥靖（Intelligence Pacification），在中国内部呼应着美国的政治绥靖。

这不同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过的一次被污名化的智识绥靖，也就是欧美自由知识分子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同情以及围绕计划与市场经济的大辩论。因为，最终对希特勒奉行绥靖的正是笃信纳粹德国反共宣传的张伯伦以及英国的保守精英们，他们在两种普世模式的竞争中选择了与伦理上更具自

毁性却在审美上更具诱惑力的第三者（恶魔）合作。某种意义上，后者作为一种精神上的逃避和退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识绥靖，一种道德的腐败，无奈却在今天重演了。

换句话说，从 1980 年代仿效南斯拉夫、匈牙利的改革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在二十一世纪新自由主义的余晖中，面对的是来自党国体制通过社交媒体和 AI 崇拜进行的双重绥靖，先后消灭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和知识的尊严。这或许才是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转向第三者的结构性原因。

以 2013 年中共的“9 号文件”为动员纲领，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场对“公知”污名化的运动：在大学清洗“砸锅教授”的同时，社交媒体上官方组织的水军动员污名化每一个敢于违反单位纪律坚持公共发声的知识分子、直至 2025 年 12 月初最新一波对户晨风、阑夕等网络名嘴的清剿。这种远不如斯大林式清洗或者日本 1925 年《治安维持法》残酷的网络暴力所造成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失声，譬如清华大学的许章润和劳东燕分别受到来自官方的压迫和社交媒体的霸凌，以及我个人被清华大学和政治学系的迫害，确实算得上数字极权下的绥靖式镇压。

以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出现了集体的智识绥靖，变得极端保守化和宗教狂热，否认进步主义、普世价值乃至世俗社会，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大众并行不悖，也与愈益极权化的当局和平共处，在国际领域共同推动着一场与美国式绥靖平行的和平运动，与 1930 年代的中国历史惊人的相似。

另一方面，硅谷的超人类主义运动的自我造神，不仅制造出反民主的偶像

领袖，更制造出人们和资本对 AI 技术为代表的硅谷哲学家、企业家等等新弗兰肯斯坦的崇拜，尤其 AI 技术对现有知识的疯狂蒸馏和输出，直接造成对中产阶级符号工作的替代和对知识分子的“取消”。它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大学从 2025 年以来对社科人文学科的消减，釜底抽薪式的绥靖。

如此情形，像极了埃利亚斯 (Norbert Elias) 在他有关长时段文明化的解释，暴力化过程中的绥靖本身终将消解战争。中国知识分子在暴力和迷信的绥靖化后或趋于瓦解，犹如那些在十年前就惊慌失措地拒绝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的状况，其最好归宿或是成为一个因为缺乏公共写作而趋于枯竭的 AI-国家的殉葬品。

抵抗的唯一可能，似乎只剩下效法伯夷叔齐以知识分子遗老自处一条道路了。

注释

- 1 崔卫平《“平行城邦”: 捷克斯洛伐克反对运动的经验》，《中国民主季刊》2023 年第 2 期，153 页。
- 2 本刊主编王天成感谢原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现居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的陈健民教授。在与王天成的视频交谈中，陈教授基于香港离散群体状况强调了“反抗的共同体”的概念。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曾说，就是要跟刘晓波那种“烈性传染病带菌者”保持交往，绝不能让当局孤立异议者的意图得逞。见《周舵自述》（香港：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2019 年），47 页。感谢王丹先生让本刊编辑注意到这个故事，并提供了出处。

透视中国

郝志东 | 作者郝志东为澳门大学荣休教授、社会学学者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1期
2026年0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文革思维：从苏区 反AB团和延安整 风到平定土改和文 革（上）¹

编按：“上世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两百万人死亡，影响了数亿人的生活。这样的结果一定有一些根本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文革思维”，它“现在仍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行为”，澳门大学荣休社会学教授郝志东先生说。今年，2026年，距文革发动整整60周年，本刊特发表此文，以纪念中国当代史中极端荒谬、疯狂的一段岁月，检讨极权主义在中国造成的最惨痛的悲剧之一。

文革思维模式在早期的革命运动中发展起来，在文革中达到顶峰，现在仍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行为。文革思维的特征至少包括：1) 针对任何被怀疑为敌人的人所实行的阶级斗争和敌对思维；2) 用谬误性、专制性、非人性思维来区分敌我；3)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暴力思维。² 文革思维的每个部分都与其他两个部分相关并相互强化。

敌友二分的思维来源于意识形态纯粹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这种特征也并非中国独有。³ 毛泽东在1926年3月出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小册子中说过一句名言，这也是收在毛选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德国哲学家、纳粹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在《政治的概念》一书中声称，敌友二分法是政治的核心。⁴ 因此，为了将敌人（外部或内部）识别为潜在威胁，人们不应该使用理性分析、话语逻辑、客观判断或规范标准，而应该只靠“我们”与“他们”、生与死的感觉。不能有任何妥协。

敌人被“我们”认为是不齿于人类的人，等待着他们的是被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无情消灭的命运。这种对立思维正是纳粹、斯大林和波尔布特的大屠杀、大清洗的逻辑，也是中国土地改革运动和文革杀戮的逻辑，以及宗教

极端主义的逻辑。与大多数社会一样，这种思维及其引发的暴力，无论是为了声望、权力还是物质利益，也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内在元素。⁵除了汉人之间以及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无数的杀戮之外，秦始皇（公元前 259-210 年）曾经活埋了数百名持不同政见的学者，八世纪的安史之乱死了三千六百万人，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运动死了两千万人。

以上这些问题的严重性需要我们深入的研究和反思。本文首先简单介绍我们的研究方法。然后我们叙述贯穿在苏区的反 AB 团运动、延安整风、平定县的土改和文革中的敌对思维、阶级斗争思维。之后我们讨论几个谬误性的思维方式，包括非黑即白、极端思维；只要结论、不要证据；无限推导、无限上纲；思想专制；蔑视人的尊严。再后我们讨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暴力等等。我们强调了这不同运动之间思维的连续性。最后，本文讨论文革思维和当今中国的相关性。

由于文革在当今的中国仍然是一个敏感话题，所以文革思维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本文所讨论的同一种思维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作用及其对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的持续影响，值得学术界更加认真的关注。

一、研究这个问题的方法

本文所依据的案例多来自山西省中部的平定县。在土改时期，全县分为正太铁路以北的平定（路北）和正太铁路以南的平定（路南）两个区域，共有 461 个村庄，总人口约 290,000。由于地区重组，文革开始时全县有 368 个村庄，约 265,000 人。⁶

本文的一部分调查材料来自对平定县一些村庄及县城经历过土改和文革的人们的采访。我们还使用了一些档案材料和当时的报纸报道。这些来源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村庄的相当详细和相对可靠的信息。有关该县在土改和文革中更多调查结果的报告，也见本人的《生死存亡十二年：平定县的抗战、内战与土改》一书以及本人与黎明合著的《平定县里不平定：山西省平定县文革史》。⁷

根据社会学方法论，统计的方法是实证的方法。我们的一些统计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土改和文革暴力的规模。访谈的方法或者当事人的回忆是阐释的方法，看当事人如何解释他们的经验。如果足够多的人在诉说着同样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的可靠性就比较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如下所述，让农民认识到地主是坏人，也需要很强的说服能力。

我们还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也即社会学的批判方法，即从一个历史的角度（苏区反 AB 团、延安整风、土改、文革），看文革思维的沿革，尤其是从权力的角度去看文革思维的性质。

二、阶级斗争与敌对思维：苏区反 AB 团运动、延安的“抢救”运动、平定的土改与文革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引的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揭示的，阶级斗争心态在革命早期就是一个显著的特征。敌我分明，没有灰色地带，来不得半点含糊。在苏维埃红区，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任何反对他们的人都是 AB（反布尔什维克）团份子，应该被消灭。⁸ 于是在 1930 年和 1931 年，在江西和福建苏区，成千上万的红军士兵，其中包括

一些将领，特别是地主和富农家庭出身的士兵和干部，均被杀害。他们被怀疑为国民党派来破坏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分子。酷刑是家常便饭，包括殴打、焚香、割女人的乳房等。

在 1942-1943 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敌对思维与暴力事件仍在继续。斗争对象仍然是那些来自富裕家庭的人以及像王实味这样的知识分子。王实味批评延安的不平等现象。⁹ 共产党认为日本和国民党派了大量的间谍到延安来，这些人必须被消灭。¹⁰ 正如我们下面会详细讨论的，谬误的推理在起作用。如果一个人来自富裕的或有国民党背景的家庭，他就会被自然地怀疑为特务、间谍。建国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的雷任民作为国民党特务被“抢救，”他的妻子是日本的归国留学生，所以就被推断，她一定是日本间谍。¹¹ 人们被殴打、折磨，直到他们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或日本人的特务。¹² 酷刑的方法包括多天的睡眠剥夺、饿饭、殴打等。正如我们后面更多的例子所揭示的，在革命的名义下，人是没有尊严的。

延安及周边地区 40,000 多名知识分子中，总共有 15,000 人被认定为国民党特务，其中大部分来自富裕家庭。¹³ 正如蒋南翔后来在给刘少奇和党中央的报告中写到的那样，可能有少数国民党特务，但 99% 的自己供认为和被认定为特务的人都是被冤枉的。¹⁴ 直到 1945 年，他们中大部分人的罪名才被洗清。一部分人被保留疑问不予结论，继续受到社会部监督，让他们在迫在眉睫的和国民党对决的内战中来证明自己。¹⁵ 其中有 100 多人被处决，包括 1947 年被处死的王实味。¹⁶

可见从共产党成立时起，阶级斗争就是中国革命的主导意识形态，也是 1945 年至 1950 年代初的土地改革的思想基础。为了使土改运动取得成功，

中共需要将阶级斗争的理念、区分敌我的思想灌输到农民的脑海中。但是在平定，就像在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这在一开始并不容易。在中共动员群众来斗地主，说他们是如何如何坏的时候，农民通常的反应是“老财不赖。”¹⁷就像我们在本书关于暴力土改的第四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农民需要了解地主的确是坏的。我们在第四章引述了农民和土改工作队员之间的对话。农民一定要理解他有一年生病了，房东照顾他，并不是因为他穷，别人看不起他，但财主却看得起他。而是因为财主怕他死，因为如果他死了，财主就不会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了。财主的好心被看作是个阴谋。

农民首先要认识到地主确实是坏人。¹⁸然后工作队员会继续帮助农民“挖穷根”，指出地主和富农其实是在剥削农民。“点着火”以后，农民们就会意识到，他们所有的耕地都是被地主偷走的。地主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农民的血汗。认为有“好财主”或“善财主”的思想是错误的。按照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局派来的工作队队长杨献珍在土改会议上说的，如果你这样想，就说明你没有怀有阶级仇恨。¹⁹阶级仇恨、敌对意识的培养是对地主和富农施暴的第一步。

中共建政之后，阶级斗争一直都是意识形态的主轴，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等等运动中，都是如此。到了文革的时候，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的学说已经被彻底灌输到了人们的脑海中。连小孩子也都认为所有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都是坏人，人们对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正如雷锋所说，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平定县的文革就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一个阶级斗争接着另一个阶级斗争。

1966 年，在“破四旧”（即代表着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中，城市和农村人们房顶上的陶瓷兽头被砸毁。五类分子等牛鬼蛇神再次被揪出来批斗、游街、被逼站在凳子上接受人们的审问和批判。

1967 年，各单位开展了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阶级斗争。到 1968 年前后，造反组织被分成了两派，各自都将对方视为反革命的代表，最终导致了两派的武斗。1969-1971 年，“清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对贪污、浪费、投机倒把）运动开始了。阶级敌人从五类扩大到九类，加上了叛徒、内奸、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两派中的一派（红总站）在这一轮斗争中失去了权力，成了反动份子。九种份子中的许多人自杀了。总之，有清理不完的阶级敌人。

1972-1977 年，轮到两派中的另一派（兵团）被称为阶级敌人了。他们在 1968 年两派的武装冲突中造成了三人死亡，他们也被认为是反大寨的先锋。大寨村是毛泽东树立起来的农村发展的典型。

毛一直在清理阶级队伍，但是阶级敌人一直清理不完。直到毛 1976 年去世，中共在 1978 年才决定结束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发展。但阶级斗争或对立思维却仍然在以其他形式存在，正如我们下面将讨论的。

关于这种文革思维，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专门讨论文革思维的学术著作并不多见。但是讨论文革，人们就不可避免地提到阶级斗争是文革的主要驱动力之一。麦克法夸尔“（Roderick Lemonde MacFarquhar）”在关于文革起源的开创性著作中提到，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是

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以及年年、月月、天天都要讲阶级斗争的必要性。²⁰ 怀特 (Lynn T. White) 研究了人们如何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被贴上不同的标签，比如工人、农民、资本家、地主、小资产阶级或流浪汉。²¹ 他们也被分为红黑、好坏两种人。²²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将邓小平第二次打倒的时候，批评他从来不抓阶级斗争，从来不以阶级斗争为纲。²³ 毛泽东曾多次声称（并真的相信）三分之一的国家政权掌握在各种阶级敌人手中，这些敌人的人数有几十万、几百万或数千万之巨，而且还在不断增长。²⁴

因此，在文革期间，不仅地主和资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都被视为人民的敌人；几乎所有党的领导干部都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文革被视为推翻旧阶级的、纯粹的、根本上的“继续革命，”尽管这个所谓的旧阶级并没有对政权构成任何可信的威胁。

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与敌对思维密切相关。只要不是自己的朋友，就是自己的敌人。这种判断不仅基于阶级，还基于国籍、宗教和社会组织等社会特征。简而言之，它针对的是不像自己那样“纯洁”的人。这种敌对思维又和下面描述的思维模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运作。

三、从反 AB 团和延安整风延续到土改和文革中的谬误推理、独裁、非人化思维

我们在这一部分讨论非黑即白、极端思维；只要结论、不要证据；无限推导、无限上纲；思想专制；蔑视人的尊严等问题思维。

1. 非黑即白、极端思维 (False Dichotomy)

在党的眼里，谁反对土地改革，谁就是人民的敌人，就是斗争的对象。²⁵每个地主都是邪恶的剥削者。地主阶级和国民党是人民的敌人。在石门口村，石拉宝、魏富傲、魏富锁三人，在侵华日军投降后，阎锡山军队返回平定时，没有与其他村民一起逃跑，因此，他们被视为国民党特务而在除奸反特时被用石头砸死。²⁶魏富傲的儿子和侄子随后自杀，以避免同样的命运。日占时期西郊村长郝崇孝，尽管他当时也为中共军队服务，但被视为叛徒并被用石头砸死。²⁷一个人必须要和中共站在一起，否则就是反共，就是国民党或日本占领者的同路人。这里没有灰色地带。

在文革期间，好人和坏人之间的二分法也非常明确。九类份子，包括他们的孩子，都是坏人，尽管对他们的指控很少或者根本就无法得到证实。事实上，好阶级与坏阶级、朋友与敌人、人民与敌人之间的大部分二分法都是错误的，就像之前的土改时期的情况一样。分类是基于主观感知而不是客观事实。尽管如此，非黑即白的二分法还是造成了严重后果，许多无辜者因此丧生。

2. 只要结论，不要证据 (Argument from Ignorance)

诉诸无知或者没有证据就下结论，在肃清 AB 团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中就是一个公认的方法。例如，在后一个运动中，师哲问康生，“要抓的这些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的材料，我们怎么抓人？怎么审问？”康回答说，“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²⁸到了核实谁是国民党特务、谁不是的时候，结论的常用语言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²⁹这等于还是给被审者留了一个尾巴。

在平定的土改运动中，人们甚至没有问师哲所问的问题。他们只是简单地相信并接受了别人给他们的结论。即使那些富人家庭的干部也是如此。这些人占县级以上所有干部的百分之五十以上。³⁰ 对他们来说，唯一的选择是相信党、坚决支持党的决定，要求家人将所有财产都交给农民。否则，他们的家人就会被斗争并被杀害。³¹ 无论如何，他们都要揭发自己家剥削农民的“恶劣事实”，认识到地主即是罪恶，穷人就是真理。³² 一位名叫杨怀旺的干部，痛斥自己的父亲是国民党特务、地主、恶霸，被群众处决是罪有应得。这里没有争论的余地，也不需要证据来给人定罪。

在小桥铺村，工作队长梁宝贤指责任何他不喜欢的人为国民党特务。因此，刘全孝因为没有用白面做美餐招待梁宝贤，被贴上了国民党特务的标签并被杀害，尽管村里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有任何国民党特务活动。³³

同样在文革中，如果有人被指控有不当行为，也不需要证据。平定中学的音乐老师陈元才，曾经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文革中他无法忍受斗争会的屈辱，逃到了东北自己的家乡。他回来以后就被指控说想向苏联修正主义者投降，因为他的家乡靠近苏联。³⁴ 像平定县委副书记郑忠华一样，所有干部都认为自己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³⁵ 但对他们的指控是不需要证据的。没有理性的分析，没有客观的判断，在他们被斗之前，结论就已经做出来了。

3. 无限推导，无限上纲 (Continuum Fallacy)

第三个谬误推理是无限推导、无限上纲。延安整风运动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名叫钱维仁的年轻人，在自然科学院的墙报上画了一朵向日葵，

便被怀疑是“心向日本”，因为他的画看起来像菊花，而菊花是日本国的国花。³⁶ 晏甬带了一队文化人到延安，在审干中，人家说“你这人什么都懂，肯定是特务！”³⁷ 当时流传说康生看人长得漂亮就怀疑人家是特务。如果有人在坦白大会上神情紧张，他或她一定是个大特务。³⁸ “脸变红的是特务、脸发白的也是特务、出汗的是特务、哆嗦的也是特务。”工作积极是潜伏特务的伪装；工作消极是敌对份子的破坏。³⁹ 只要有人指控你，就可以给你定罪。

同样的思维也贯穿在了平定的土改和文革中。一份文件给下面工作的人的建议说，如果地主来找政府官员询问他为什么被斗争，他应该被告知说你既然被斗，就证明你有问题。否则，群众为什么不斗别人呢？⁴⁰ 就像在整风运动中一样，如果你被斗了，说明你一定有问题。在南坪村，一位名叫小二巴的土改积极份子向一个工作队队员说，共产党的军队进攻太原（山西省会）现在遇到了困难。于是他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在散布对中共胜利的怀疑。他被殴打并被勒令交代他的国民党组织。最后，他承认他的小组一共有十一名成员。结果这十一个人都被脱光衣服，活活打死。⁴¹

在平定文革中，看似无辜的言论都可能将人投入监狱或遭到批斗。平定县的副县长之一郑子英被指责反大寨，因为她重复了一位同事的评论，说大寨也有缺点，就像旗杆上可能会长虫子一样。⁴² “反大寨”是一项危险的指控，是要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因为大寨是毛泽东树立起来的农业方面的模范。另一位干部张起杰也被指责反大寨，因为他说大寨去年底收成不如前年。⁴³ 县广播电台工人岳增寿因批评大寨虚报产量、说陈永贵在日本占领时期曾经有过汉奸行为而被投入监狱。⁴⁴ 一个叫付实征的县干部，因写打油诗抱怨三鲜汤价格太高而被指反社会主义，由于受不了那没完没了

的批斗而投入茅坑自杀身亡。⁴⁵ 县医院医生姜永禄，因为在一张纸上写了“社会统治着我的灵魂”，被按照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批斗导致他上吊自杀身亡。⁴⁶

4. 思想专制 (Thought Dictatorship)

上面引用的所有例子实际上都与思想专制有关。在思想专制的情况下，任何对主导意识形态提出的哪怕是轻微的挑战都会立即被镇压。无论是在土改运动还是文革期间，党的路线只有一条，也是唯一正确的路线，人人都必须遵循。在平定土改运动期间，中央局杨献珍召开的会议明确指出，只有支持土地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任何反对土地革命的人都不是真党员。⁴⁷ 如前所述，那些来自富裕家庭背景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并告诉他们的家人不要反抗土改。正确的思维方式是，农民和地主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后者与美国、蒋介石、阎锡山是站在一起的，前者则与共产党和八路军站在一起。农民阶级是好的，地主阶级是坏的。在思想或行为上，都不许有任何偏差。

在北京文革期间，韦君宜的丈夫杨述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被剃了阴阳头，被批斗时脖子上还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标语牌。韦君宜和他说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不如到厨房把煤气打开，了却残生，免的零碎受苦。”但是杨述却和她说，“不！我估计这次运动搞成这样一定是有反革命份子混进来了。也许是国民党搞的。这种事早晚能弄清。你得忍耐，得等待。”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相信毛泽东永远正确。坏事都是别人干的。他还嘱咐女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跟党走。⁴⁸

毛泽东本人和他的思想体系，包括他关于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指示、他对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专政、对党的领导的指示，就像林彪说的那样，一句顶一万句，任何人都不能质疑。文革当然也不能质疑。邓小平 1973 年复出的条件是不能翻文革的案。但是 1975 邓小平又被毛以右倾翻案的名义搞下台。对毛来说，任何思想上和行为上的越轨都是不可容忍的。毛是永远正确的。

正如平定中学红卫兵董成科在《平定小报》上的文章中所说，“我们红卫兵的战斗武器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认真地、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这是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谁要违背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坚决和他斗到底！”⁴⁹ 和这种越轨思想和行为斗争的方法包括将敌人视为非人类。这是我们下面一节讨论的问题。

5. 蔑视人的尊严

在土改运动中，要想让农民和地主划清界限，以便消灭革命的敌人，农民需要主动排除人道主义，克服“良心”思想。⁵⁰ 在平定城的一次斗争大会上，地主、绅士们吓成“一滩鸡毛”。“一气斗倒奸霸头子周克昌等四十九个。”⁵¹ 在这群被斗的人中，最著名的是周克昌。周克昌曾在民国初期担任过国会议员、天津市政府高官、平定中学校长。在平定（路北）的一个叫新庄的村子，有 69 户人家被作为地主、富农来斗争。在全村 233 户人家中，他们占了 33.7%。他们都被“扫地出门”，335 人流落街头，在村里或附近的村庄靠乞讨为生。⁵²

妇女受到的羞辱同样残酷。小桥铺的地主高重阳的妻子，被吊起来打，追问家里的粮食和珠宝藏在什么地方。她被打得尿尿从裤腿里流了出来。⁵³在大石门村，人们逼贾锁义的妻子交出所谓的银老虎，交不出来就用钳子夹拧她的肌肉。她被折磨的遍体鳞伤，最终也还是没有能交出银老虎，因为本来就没有。另一名来自富裕农民家庭的妇女因涉嫌与另一名男子发生男女关系而被剥光衣服吊在房梁上供年轻男子拍打抚摸。⁵⁴东回村的一位地主石海云被处死，他的妻子戴着一顶高高的纸帽，抹着花脸，指甲上钉着针，被游街示众。村民还让她扫街，有时候被人赶着，有时被人骑着，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⁵⁵有时人们还给斗争对象戴上牲口戴的铃铛，竭尽羞辱之能事。⁵⁶很少有人能忍受这种羞辱和折磨。

这就是前述韦君宜在文革中为什么要对她丈夫建议自杀。在被指控各种莫名的罪行并遭受各种虐待和羞辱时，平常人真的很难接受。她无法忍受这种羞辱，尽管她丈夫拒绝了这个建议，并劝她要相信党。⁵⁷一般人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回忆起学生们如何殴打他，向他脸上吐口水，他又如何在不同的批斗会上忍受屈辱。⁵⁸他描述了当有人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殴打他时，他几乎失去知觉时的感受。他不敢躲闪，“最初还有痛的感觉，后来逐渐麻木起来，只觉得头顶上、眼睛上、鼻子上、嘴上、耳朵上，一阵阵火辣辣的滋味，不是痛，而是比痛更难忍受的感觉。”他说自己的脸上、嘴里、耳朵上、鼻子上都流着血，好在眼睛还能张开、牙齿没有被打掉，“不至于生命交关。”第二天他还要照样干活、照样背毛主席语录。他感觉到自己也完全迷糊了，“迷糊到连自杀的念头都没有了。”⁵⁹他想知道人类怎么能忍受这样的残酷折磨。

对人类尊严的漠视也可见于平定的文革。我们在上一章已经做了一些讨论。

这里是更多的例子。一名据称与其他男子有不正当关系的妇女被强迫在脖子上挂着几双破鞋、耳朵上吊着两只西红柿游街（“破鞋”是对这些女性的羞辱性指代，“烂柿”是当地人对她的蔑称）。葛东海，一位精通《易经》的算命老先生，游街批斗的时候，脸被涂成黑色。当时的学生们并不觉得这是对人格的侮辱、人权的践踏，只是觉得好看、热闹。⁶⁰

以前的革命干部现在都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批斗，脖子上还挂着巨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等牌子。⁶¹张庄村的老革命干部张万祥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而跳桥自杀了。副县长郑子英说学生们用上面有钉子的板子打她手臂，流血不止，子宫也被踢得出血。学生们自己也害怕了，把她送到了医院。⁶²李成柱在两派武斗期间被兵团一派打死，后来局势稳定下来后，他的妻子去找县委书记李计春（任职期间1972-1974），要求落实政策恢复他的名声。但该书记说，“死了就死了，落实什么政策？”⁶³正如王蒙所说，当时的主导思想是，被组织抛弃、背离了领导的人，只能“向隅而泣，死了也不过是臭一块地。”⁶⁴

就像在苏区反AB团、延安整风、土改等时期一样，在文革期间，暴力和不把人当人是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特征。越残酷就越革命。红色恐怖随之而来。杨绛写到，她所在的五七干校当时收容了两千名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分子，那些自杀的人被埋葬时连棺材都没有；那些被关在那里的人们每天要在田里工作13到14小时，即使生病也不允许请假。⁶⁵没有人的尊严。一个人越残忍、越血腥、越暴力，他或她就会显得越革命。无情的斗争、恶毒的攻击、自虐、虐他、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已经算是太温和了。当时的想法是：只要目标是高尚的，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包括暴力。

阶级斗争的基本意识形态本来是要引向一个纯粹的未来，消除剥削，惩罚那些压迫劳动人民的人。但是为了这样一个看似高尚的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吗？

(未完待续)

注释 ······

1 本文原文题为“Cultural Revolution Thinking in China: Its Development and Manifestation in Pingzhou County from Land Reform Onwards,”发表于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27, 2018, Issue 110. 中文版略有修改。

2 关于文革思维的讨论，也见段协平：“关于文革恶习和文革思维”，共识网，2014年5月7日；唐开宏：“‘文革思维’的本质”，2013年3月14日；张梦阳：“论‘文革’思维”，《南方周末》，2012年8月6日。

3 我对这一主题和比较方法的强调，要归功于 Lynn White 教授和 Borge Bakken 教授的提醒。本文的论述因为他们的帮助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4 Michael O’Meara, “Carl Schmitt’s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he Occidental Quarterly*, April 5, 2010.

5 关于暴力的历史，请看 Steven Pinke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11); 特别是 Barend J. ter Harr, “Violence in Chinese Culture: Bibliography by Barend J. ter Haar,” at <https://bjterhaa.home.xs4all.nl/violence.htm>, last revised 5/4/2025.

6 平定县志编撰委员会，《平定县志》（社科文献出版社，1992），第6、9、67-68页。

7 郝志东：《生死存亡十二年：平定县的抗战、内战与土改》（台北：元华文创股份有限公司，2021）；郝志东、黎明：《平定县里不平定：山西省平定县文革史》（台北：致知学术出版社，2017）。

8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25页。

9 同上，第323页。

10 同上，第487-488页。

11 同上，第548页。

12 同上，第 504-505、546-547 页。

13 同上，第 593 页；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381-382 页。

14 引自高浦棠、曾鹿平：《延安抢救运动始末》（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第 410-411 页。

15 同上，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 597 页。

16 同上，第 599 页。

17 采访 LNPD0-2。关于平定土改的历史，也请参考本人上引专书《生死存亡十二年：平定县的抗战、内战与土改》。

18 平定联合办公室：《翻身通报》，第 3 期，1946 年 8 月 22 日，平定县档案第 23 卷。

19 “平定县委土地会议结论（1）”，1947 年，平定县档案第 54 卷，文件 #4。

20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 1956-1957》第一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大跃进 1958-1960》，（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2 年），第 165-129, 275-277 页。

21 Lynn T. White, *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9), p. 10.

22 Andrew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37.

23 Quoted in Roderick MacFarquar and Michael S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407.

24 引自胡鞍钢：《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 年），第 29、35 页。

25 《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布置与大会讨论结论 1》，平定县档案第 49 卷，1946 年 11 月 7 日。

26 采访 LNSMK6-6。

27 采访 LNXJ6-7。

28 郝在今：《文革前史：延安抢救运动纪实》（香港：利文出版社，2006 年），第 100 页。

- 29 同上，第 199 页。
- 30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 I》（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0-61 页。
- 31 见前引“平定县委土地会议结论(1)”。
- 32 二专署办公室、王力行、曹有壁：“二专署查挤行动成绩大，”新华日报太行版，1947 年 9 月 9 日，第 3 页。
- 33 采访 LNXQP6-8。当时的主食是玉米。
- 34 郝志东、黎明：《平定县里不平定》，第 167 页。
- 35 同上，第 466 页。
- 36 郝在今：《文革前史》，第 54 页。
- 37 同上，第 86 页。
- 38 同上，第 199 页。
- 39 同上，第 111、125 页。
- 40 “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布置与大会讨论结论 3”，平定县档案第 49 卷，1946 年 11 月 7 日。
- 41 访谈 LNNP6-3。
- 42 郝志东、黎明，《平定县里不平定》，第 280 页。
- 43 同上，第 534 页。
- 44 同上，第 572-79 页。
- 45 同上，第 493 页。
- 46 同上，第 542 页。
- 47 前引“平定县委土地会议结论(1)”。
- 48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第 115-117 页。
- 49 郝志东、黎明：《平定县里不平定》，第 124 页。
- 50 《平定县群运总结》，平定县档案第 23 卷，文件 #7,1946 年 10 月 10 日；王琦、张发：“平定群运中的问题与我们的解决意见，”新华日报太行版，1947 年 5 月 11 日，第 2 页。
- 51 龚胜荣、李秀峰、冯廷淮、志远：《平定城关连续斗争》，新华日报太行版，1947 年 7 月 15 日，第 2 页。

52 宣传部：《平定县土改工作总结》，1948 年，平定档案第 50 卷。

53 采访 LNXQP6-8。

54 访谈 LNDSM6-1。

55 采访 LNDH8-1。

56 采访 LNPD0-2。

57 韦君宜：《思痛录》，第 115 页。

58 季羡林：《牛棚杂忆》（北京：外语教研出版社，2010），第 81-88、107-110、143-46 页。

59 同上，第 159-160 页。

60 郝志东、黎明：《平定县里不平定》，第 175 页。

61 同上，第 217-34 页。

62 同上，第 280 页。

63 同上，第 437 页。

64 王蒙：《中国天机》（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第 159-160。

65 引自赵信：“五七干校，一个‘地上天国’的破灭，”FT 中文网，2016 年 5 月 19 日。



黄奕信画作

极权主义及其形成机制的心理暗流——一种新定义与分析视角

编按：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 60 周年，当此之际，为促进对极权主义的反思，本刊特发表徐贲教授此文。文章聚焦于一位比利时学者的最新研究——评析马蒂亚斯·德斯梅特《极权主义心理学》的核心理论，重点探讨“游离性焦虑”与“群众形成”在极权主义生成中的心理机制。文章指出，极权并非仅源于外在压迫或特定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植根于现代人心理结构的潜在倾向。在人工智能与技术官僚主义背景下，这种心理机制以“专家理性”和“算法中立”的形式重新显现，使民主社会同样面临思想同质化与异议压制的风险。作者认为，防范当代极权主义不仅依赖制度约束，更取决于心理韧性、批判性思维与开放公共讨论空间的维护。

《极权主义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Totalitarianism*, 2022）是比利时根特大学心理学教授马蒂亚斯·德斯梅特（Mattias Desmet）的一部开创性著作。这本书以其独特的心理学视角，对极权主义现象进行了深刻剖析，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极权主义及其形成机制的理解方式。德斯梅特不仅关注传统极权形式，更敏锐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以科学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为外衣的隐蔽极权主义，为我们理解当代世界的政治心理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

与传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分析不同，德斯梅特将焦点转向了人类心理的深层结构，提出了革命性的“群众形成”理论，揭示了个体如何在特定心理条件下逐渐丧失理性判断，最终投身于集体狂热和自愿奴役的复杂机制。

这部著作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对极权主义本质的重新定义。德斯梅特认为，极权主义并非某种外在强加的政治制度，而是一种深植于人类心理结构中的内在倾向。当社会中积累了足够的“游离性焦虑”——那种缺乏明确指向、四处寻找依附对象的深层不安时，民众就会主动寻求能够提供确定性

和归属感的集体叙事。这种心理需求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宁愿放弃独立思考的自由，也要获得融入群体的心理慰藉。

德斯梅特的理论最具颠覆性的地方在于，他指出“群众形成”不仅发生在历史上的法西斯政权中，也同样在当代民主社会中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存在着。特别是在科学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的外衣下，新型的极权倾向正以“专家权威”和“科学真理”的名义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这种现象不需要暴力镇压，却同样能够实现思想的统一和异议的消音。

更为深刻的是，德斯梅特揭示了极权主义的“成瘾性”（addictive nature）特征。所谓“成瘾性”，指的是极权主义带来的心理快感具有类似成瘾机制的特征，一旦个体进入“群众形成”（mass formation）状态，他们就会主动维护这种心理结构，即使在现实中遭受痛苦也不愿意放弃。这是因为心理上的确定性快感（the psychological pleasure of certainty）远比自由的重负更具吸引力，人们宁愿生活在一个简化的、确定的世界（simplified and certain worldview）中，也不愿面对复杂现实带来的焦虑和不安。

这一“成瘾性”与传统意义上的“奴性”（servility 或 slave mentality）密切相关，但又有所不同。奴性通常被理解为在外部压迫下形成的顺从心理，是对权力的被动屈服。而德斯梅特所揭示的极权主义成瘾性是一种主动的心理依赖，人们并非只是出于恐惧而服从权威，而是因为从中获得了心理上的快感与慰藉。这种主动维护极权结构的行为，正是现代“自愿奴役”（voluntary servitude）的心理基础。极权成瘾机制可以让奴性不再只是被动屈从，而成为一种主动选择，是一个为了逃避不确定性、避免面对复杂现实而甘愿接受控制的心理过程。

在学术层面，德斯梅特继承了勒庞 (Gustave Le Bon) 的群体心理学传统，与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的极权主义研究形成对话，同时融入了埃里希·弗洛姆 (Erich Fromm) 关于现代人“逃避自由”的深刻洞察。他的贡献在于将这些理论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不仅解释了历史上的极权现象，更为理解当代社会的心理动态提供了新的视角。

《极权主义心理学》因此成为一部极具现实意义的著作。它不仅警示我们极权主义心理在民主社会中的潜在威胁，更提醒我们维护开放讨论空间、保护异议表达权利的重要性。在信息茧房和算法推荐日益影响人们认知的今天，德斯梅特的理论为我们理解和应对新时代的思想控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

一、超越意识形态：极权主义研究的心理学转向

德斯梅特在《极权主义心理学》中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在于他将分析视角从传统的意识形态研究转向了深层的心理机制探索。这一转向不仅挑战了学界长期以来的研究范式，更为理解当代社会的政治动态开辟了全新的思路。

长期以来，对极权主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意识形态根基。汉娜·阿伦特在其经典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深入分析了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如何为极权政权提供思想支撑。这种研究路径将极权主义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强调其内容的独特性和历史的偶然性。然而，德斯梅特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分析框架可能遗漏了更为根本的心理动力学问题。

德斯梅特将研究重心转向了人类心理的深层结构，特别关注“游离性焦虑”(free-floating anxiety) 这一关键概念。他认为，当社会中存在大量缺乏明确指向的焦虑情绪时，民众内心的不安全感便如疲软的藤蔓，四处寻找可以依附的对象。这种焦虑不同于针对具体威胁的正常恐惧，它更像是一种弥散性的心理状态，让人们渴望找到某种确定性 (certainty) 来缓解内心的不安。正是在这种心理土壤中，“群众形成”(mass formation) 现象得以萌芽和发展。这一分析揭示了极权主义现象背后更为普遍和持久的心理规律。

这种分析视角的转换带来了深刻的理论启示。如果德斯梅特的观点成立，那么极权主义便不再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专属产物，而是人类心理结构中潜在的一种倾向。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政治运动，无论是宗教狂热还是世俗主义的极端形式，只要社会中积累了足够的游离性焦虑和孤立感，极权主义的倾向就可能在任何意识形态的外衣下重新显现。这意味着，防范极权主义不能仅仅依靠对特定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抵制，更需要关注社会心理健康的整体状况，关注个体焦虑的合理疏导和社会连接的有效建立。

德斯梅特的这一理论转向为我们理解当代政治现象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在信息爆炸和社会变迁加速的时代，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面临冲击，个体的心理压力和焦虑感普遍上升。从这个角度看，各种形式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现象，或许都可以在“游离性焦虑”和“群众形成”的框架下得到更深层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有助于我们诊断当前的社会问题，更为寻找有效的应对策略指明了方向。

二、“群众”的形成：一种跨越制度的普遍心理现象

德斯梅特在《极权主义心理学》中最具颠覆性的洞察之一，便是将“群众形成”重新定义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概念。这一重新定义彻底改变了我们对集体行为的理解，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却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群众形成的心理逻辑并非历史的孤立事件，而是深深植根于人类心理结构中的普遍机制。

传统的社会学研究往往将群众现象视为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强调外在环境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德斯梅特敏锐地观察到，群众形成首先是一个心理过程，它源于个体内在的心理需求和认知倾向。当人们面临不确定性和焦虑时，投身于某个更大的集体叙事往往能够提供心理慰藉和身份认同。这种心理动力如此强大，以至于它能够跨越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和历史时期，在各种社会环境中反复出现。

更为重要的是，德斯梅特指出群众形成绝非极权国家的专利，它同样会在民主社会中发生，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在民主社会，群众形成可能不会导致明显的政治迫害或暴力镇压，但它依然会影响公共讨论的质量，削弱理性辩论的空间，推动政策制定偏离理性轨道。这意味着，即便是拥有完善制度保障的现代民主社会，也无法完全免疫于群众形成的心理逻辑。

当群众形成过程启动后，参与其中的个体会表现出一系列典型的心理症状。首先是认知的简化，复杂的社会问题被归结为简单的二元对立，细致入微的分析被口号式的思维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批判性思维的逐步丧失，人们不再质疑主流叙事的合理性，而是自动接受群体共识，甚至主动排斥不

同观点。更为危险的是道德感知的钝化，个体开始对群体行为可能造成的伤害视而不见，或者为其寻找各种合理化的借口。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原本不可思议的非理性政策往往能够获得广泛支持。历史上诸多令后人匪夷所思的集体决定，都可以在群众形成的框架下得到解释。人们并非因为愚蠢或邪恶而做出这些选择，而是因为陷入了特定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压倒了个人的理性判断。

德斯梅特的这一理论框架对当代社会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它提醒我们，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和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清洗，并非遥远历史中的孤立事件，而是人类心理结构中潜在倾向的极端表现。更令人深思的是，支撑这些极端行为的心理机制在今天依然存在，它们可能以更加隐蔽、更加“文明”的方式在现代社会中运作。

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群众形成的过程可能变得更加迅速和广泛。社交媒体的回音室效应、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网络舆论的极化趋势，都为群众形成提供了新的土壤。当我们沉浸在志同道合者构成的信息环境中时，当我们习惯于接受符合既有观念的信息而排斥挑战性的声音时，我们实际上正在为群众形成创造条件。

认识到群众形成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对此感到绝望或无力。相反，这种认识为我们提供了防范的可能性。通过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保持对多元观点的开放态度，建立健康的社会连接和个人意义感，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群众形成的心理诱惑。德斯梅特的理论提醒我们，维护理性和人性不仅是个人修养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必须共同承担的责任。

三、游离的焦虑：现代人的存在困境与政治回应

德斯梅特在其理论体系中提出的“游离性焦虑”概念，为我们理解现代人的心理困境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析工具。这一概念不仅承继了埃里希·弗洛姆和罗洛·梅（Rollo May）等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关于现代人“逃避自由”的深刻洞察，更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心理状态如何为极权主义的兴起创造了肥沃的土壤。

游离性焦虑的本质在于其缺乏明确的指向性。与传统意义上针对具体威胁或挑战的焦虑不同，这种焦虑如同无根的浮萍，在个体的内心世界中四处飘荡，找不到可以依附的具体对象。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变迁速度使得个体难以建立稳定的知识框架和价值体系，传统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承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松动，留下了巨大的心理真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经常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和恐惧，这种情绪既深刻又持久，却又难以通过理性分析得到缓解。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敏锐地观察到，现代人虽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却也因此承担了前所未有的选择责任和存在重负。当传统社会的等级秩序和既定角色消失后，个体必须独自面对“我是谁”、“我应该如何生活”、“生命的意义何在”等根本性问题。这种自由的重负往往转化为深层的焦虑，促使人们寻找可以依赖的权威和确定性。罗洛·梅进一步指出，这种存在性焦虑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心理挑战，它源于个体对死亡、孤独和无意义的深层恐惧。

德斯梅特的贡献在于，他将这种心理状态与政治现象联系起来，揭示了游

离性焦虑如何成为极权主义动员的重要资源。当社会中积累了大量无处投射的焦虑能量时，任何能够为这种焦虑提供具体对象和解释框架的叙事都可能获得强大的感召力。极权主义的策略恰恰在于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心理需求，通过制造明确的“敌人”形象和提供看似绝对的“真理”体系，为民众的游离性焦虑找到了出口。

这种操作的心理逻辑极其精妙。当人们内心的不安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归因对象时，原本令人困扰的不确定感瞬间转化为明确的愤怒和行动力。无论这个“敌人”是种族、阶级、外国势力还是某种抽象的威胁，它都为个体提供了一个简化世界复杂性的认知框架。与此同时，极权主义提供的“绝对真理”不仅解答了存在的困惑，更重要的是，它免除了个体继续承担选择和判断责任的重负。在这种情况下，服从权威不再是被迫的行为，而是主动的心理选择，因为它能够有效缓解内心的焦虑和不确定感。

这一分析框架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揭示了极权主义崛起的心理必然性。极权主义的吸引力并非完全来自外在的强制或欺骗，更多地源于它对现代人内在心理需求的精准回应。当个体面临身份认同的危机和存在意义的质疑时，极权主义提供的完整世界观和明确行动指南往往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知识分子和理性个体也可能成为极权主义的支持者，因为他们同样需要应对现代生活带来的心理挑战。

从这个角度看，极权主义的兴起不仅仅是政治权力斗争的结果，更是现代社会心理结构的必然产物。它是人们对身份焦虑和存在不确定性的集体性心理回应，尽管这种回应最终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更好地认识到，防范极权主义不能仅仅依靠政治制度的完善，

更需要关注社会的心理健康状况，帮助个体建立更加成熟和稳定的身份认同，培养面对不确定性的心理韧性。

德斯梅特的游离性焦虑理论提醒我们，在一个变化日新月异的时代，如何帮助人们建立健康的心理结构，如何在保持社会活力的同时提供必要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个人幸福，更关乎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文明进步。

四、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官僚主义隐蔽极权

德斯梅特在《极权主义心理学》中最引人深思的洞察之一，正是他对当代极权主义新形态的敏锐识别。他指出，现代社会的极权威胁不再主要来源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政变或暴力革命，而是以一种更加隐蔽、更加欺骗性的“技术官僚主义极权”的形式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新型极权主义披着科学与理性的外衣，以“专业性”之名压制质疑、排斥异见，建立起一种表面温和、实则危险的思想统治。

科学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将科学方法和科学权威绝对化，宣称只有经过“科学验证”的知识才是唯一有效的真理。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复杂多面的社会问题被简化为技术性问题，政治决策则被伪装成纯粹的专业判断，而对这些决策的质疑被轻易贴上“反科学”的标签。此类话术之所以极具欺骗性，正是因为它巧妙利用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对“科学”的尊重与信任，将原本属于公共讨论范畴的议题悄然转化为“只有专家有资格发言”的技术专属领域。

技术官僚主义极权的真正危险，不在于其暴力性，而在于其隐蔽性与自我正当化机制。传统极权依赖暴力压制异议，而技术官僚主义极权则通过对话语权的垄断达到相同效果。一旦“专家唯一正确”的观念成为社会共识，普通民众的常识判断与道德直觉便被边缘化，公共辩论空间被极大压缩。质疑专家权威不再是理性讨论的一部分，而被视为“无知”甚至“危险”的表现，从而进一步强化人们对权威的依赖，压制独立思考的意愿。

这种机制与德斯梅特所揭示的“群众形成”过程高度契合。当社会弥漫着不确定性和焦虑情绪时，科学权威提供的“确定性答案”成为心理慰藉。人们宁愿相信某种“绝对正确”的科学真理，也不愿面对知识的局限与现实的复杂。这种心理需求，为技术官僚主义的扩张提供了极为肥沃的土壤，使“专家阶层”在民主社会内部建立起事实上的思想垄断。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这一趋势更显复杂与紧迫。人工智能算法作为技术官僚主义的最新工具，将德斯梅特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人工智能技术以“中立”“客观”“高效”的名义介入社会治理、公共舆论、知识生产等多个领域，将“算法正确性”塑造成新的权威形式。算法推荐系统、预测模型和自动决策程序不仅塑造着个人认知，还悄然重构着社会共识的形成机制。算法所构建的“理性”，正在取代人类的判断，成为不容置疑的“新专家”。

与德斯梅特所批判的科学主义相似，人工智能的技术神话也在将复杂的社会冲突简化为“技术问题”，将多元的意见空间压缩为单一的算法输出。批评算法偏见与决策不公的声音，往往被贴上“反技术”或“反进步”的标签。更具隐蔽性的是，算法背后的运作逻辑与利益结构常被包装为“技

术细节”，从而逃避公共讨论和民主监督。

人工智能时代对极权心理机制的强化，还体现在信息茧房与认知闭环的建构上。算法推荐、社交媒体回音室效应正不断加剧德斯梅特所描述的“群众形成”，将个体困锁在自我强化的信息回路之中，使人们更难接触到异见与多元视角。当算法成为塑造集体意识的主导力量时，技术极权主义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动员能力。

更令人警惕的是，这种技术形态的极权主义同样具备自我强化的结构。算法权威一旦确立，所有挑战声音都将被“数据不充分”“非专业发言”“无科学依据”等理由系统性排斥。持不同观点的研究者被边缘化，独立思考被视作“不理性”，媒体与教育机构也逐渐成为传播单一算法逻辑的工具。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便受过良好训练的学者和专业人士也可能放弃批判性思维，因为质疑主流技术话语所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

极权主义并非完全由上而下强加的统治结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众主动参与建构的心理机制。人工智能技术的扩展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心理结构带来的危险：人们不仅是算法运作的被动接受者，更是在无意识中成为它的维护者。面对技术带来的便利与秩序，人们更愿意牺牲自由与批判性思维，以换取心理上的确定感与安全感。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一隐蔽极权威胁，德斯梅特的警示显得尤为重要。保持开放讨论空间、抵制“算法唯一正确”的技术神话、鼓励对技术权威的质疑，不仅是防范技术极权的关键，更是维护心理健康与民主秩序的必要条件。在一个技术与科学高度发达的时代，坚持人的多样性与独立性，

抵制技术化、数据化对人的全面规训，成为维护自由社会的最基本要求。

德斯梅特的《极权主义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审视和反思当代社会的镜子。他的理论最大的价值不在于预言灾难，而在于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却必须面对的真相：极权主义的种子并非只存在于遥远的历史中，而是深深植根于人类心理结构的普遍特征中。它让我们认识到防范极权主义不能仅仅依靠完善的政治制度或法律条文，更需要从心理层面入手，关注个体的精神健康和社会的心理生态。当我们沉浸在信息茧房中时，当我们习惯于接受专家的绝对权威时，当我们放弃质疑和独立思考时，我们实际上正在为新型的极权主义铺平道路。

在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德斯梅特的警示是及时的。今天，维护思想的多元化和讨论的开放性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只有当我们保持对确定性的适度怀疑，对权威的理性审视，对异议的宽容接纳时，我们才能真正守护住人类文明中最珍贵的东西——自由思考的权利和独立判断的能力。人工智能本身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它。只有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保持必要的怀疑与批判精神，我们才能避免陷入那个以“理性”之名行极权之实的危险未来。

五、极权魅惑的心理根源与数字时代的延伸：批判性重读德斯梅特

马蒂亚斯·德斯梅特的《极权主义心理学》揭示了极权魅惑背后的深层心理机制，指出极权并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政治压迫形式，更是一种根植于人类内心、对确定性与归属感渴望的心理状态。他以“群众形成”为核心概念，解释现代社会中人们为何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甘愿放弃独立判断，

投身于集体性的叙事与权威中。这一理论无疑为理解极权心理提供了重要视角，尤其是其对现代社会“游离性焦虑”（free-floating anxiety）与意义匮乏的分析，切中了时代的精神困境。

然而，德斯梅特的理论并非无懈可击。他对“群众形成”作为极权魅惑之核心动力的强调，虽有启发性，却可能过度简化了复杂的社会动力结构。现实中，并非所有集体顺从行为都源自心理焦虑。例如，经济不平等、社会阶级压迫或长期政治高压等结构性因素，在某些社会运动或政治转向中往往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若忽略这些制度性背景，极易陷入“心理决定论”的偏误，从而无法全面解释极权兴起的多重根源。

此外，德斯梅特的理论以西方个体主义社会为主要背景，而在东亚等集体主义文化中，群体认同和社会角色服从并不总是出于焦虑驱动，而可能更多源于文化传统和社会规范。在这种语境下，对集体叙事的顺从是否等同于极权魅惑，便值得进一步辨析。例如，在一些东亚国家，个体对政府政策的广泛服从常常与维护社会和谐、尊重权威的儒家文化有关，而未必反映出个体处于焦虑状态或心理崩解。这种文化差异提醒我们，德斯梅特提出的极权心理机制虽具有普遍性，却仍需结合具体社会文化脉络加以校准，才能更精准地理解极权魅惑的诱惑力来源与表现方式。

极权魅惑的现实表现，在近年的全球社会事件中亦可见一斑。2020至2021年间，新冠疫情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管理争议，其中关于封锁措施与疫苗接种的公共讨论展现出典型的极权心理吸引力。在某些国家，强制性防疫措施引发社会高度撕裂：支持者将“科学权威”视为摆脱恐惧与混乱的救赎力量，反对者则视其为自由与人权的侵蚀。这种两极分化本质

上是一种对确定性叙事的心理投靠：在焦虑与不确定中，人们要么全盘接受官方科学话语，要么彻底否定体制，转向另一套具有心理安慰功能的替代叙事。它显示出，即使在自认为自由开放的民主社会中，极权魅惑也能以技术理性与善意治理的名义悄然渗透，诱导个体放弃理性与反思，沉溺于集体叙事所带来的心理慰藉。

面对极权魅惑的心理诱惑，如何增强个体的“心理免疫力”便成为当代社会的核心课题。德斯梅特指出，游离性焦虑的根源在于现代人对自由与不确定性的畏惧，因此，提升个体对不确定性的承受力，成为抵御极权心理机制的关键路径。这可以通过冥想、正念训练、哲学教育等形式，引导个体面对自身焦虑，减轻其对确定性叙事的心理依赖；也可以通过参与社区活动、建立真实的社会联系，缓解孤独与虚无感，从而降低对集体狂热的认同需求。

与此同时，提升媒体素养尤为重要。数字时代的信息流动加快，信息的真实性与来源愈加难辨，虚假叙事与意识形态操控也愈发隐蔽。教育系统应将媒体批判与认知心理纳入常规课程，帮助个体识别“信息茧房”效应，培养多元视角的判断能力。唯有如此，个体才能在真假叙事交错的舆论空间中保持清醒，避免成为集体狂热的牺牲品。

在人工智能与算法主导的数字时代，极权魅惑获得了更强大的隐形操控力量。算法推荐系统根据用户偏好推送内容，看似提高效率，实则放大了认知偏差与确认偏见，让人沉浸在高度个性化但单一的叙事中。这种技术化的信息操控机制正符合极权心理的核心结构——提供一种“无需质疑”的简单叙事，并将其包装为“技术中立”与“用户选择”。例如，2023年某

大型社交媒体因算法放大虚假信息而遭遇舆论批评，但其以“技术复杂性”为由规避责任，凸显出技术权威正成为新时代极权魅惑的重要载体。

算法的不透明性不仅使用户难以辨识信息来源，更塑造了一种难以质疑的“技术真理”。它代替传统的政治权威，成为新的心理支配机制。这一趋势要求我们推动算法透明度立法，赋予公众知情权与数据解释权，建立独立审计机制，防止技术权力滥用，削弱算法叙事的心理操控力。

全球视角亦揭示出极权魅惑在不同社会的多样化表现。在东亚集体主义社会中，极权魅惑往往表现为对政府政策的普遍顺从，其动力并非政治狂热，而可能是文化认同、家庭伦理与社会稳定的长期内化。而在拉丁美洲或非洲，历史的不稳定与经济失衡则使得民粹主义叙事更具吸引力，极权魅惑由此以救世主式领袖的面貌出现。这些差异说明，应对极权魅惑不能拘泥于普世模型，而应结合地方文化与历史经验因地制宜。例如，在集体主义语境中，强调社区责任感与多元价值之间的张力，可能比单纯推崇个体主义更有效地抵御魅惑结构的复归。

为对抗极权魅惑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必须将心理干预与制度设计结合。政策层面应推动算法治理框架，要求科技公司公开算法逻辑与数据模型，接受第三方监管，以技术伦理对抗技术魅惑。教育系统应强化批判性思维与媒介素养，帮助下一代在信息洪流中保持独立判断。同时，国家与社会机构应建设公共讨论平台，容纳异见声音。例如，2024年某欧洲国家推行“公民论坛”，通过结构化的民主对话平台，有效缓解社会极化，打破极权叙事的心理垄断。

德斯梅特的理论虽然存在局限，却为我们理解极权魅惑的心理根源提供了重要基础。他指出：极权从来不仅是体制的压迫，更是人心的投射。在人工智能和数字治理加速发展的时代，极权魅惑不再以铁腕统治的面貌出现，而是以“效率”“科学”“个性化”等现代话语的形式悄然入侵，隐藏在我们每日的选择与点击之间。正因如此，守护自由与理性的关键，不只是体制性的制衡，更是心灵的觉醒与思维的锻造。我们必须培养足够的心理韧性与认知觉察，以抵御那种“被理解”和“被组织”的虚假安全感。唯有如此，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不被剥夺，个人的尊严才能不被魅惑所俘。



黄奕信画作

低人权优势的化解之法——与秦晖先生商榷

摘要：正如秦晖在其新书《拯救德先生》中所充分论证的，片面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反而为昂纳克寓言的应验提供了必要条件。今天，高人权国家已终止单维经济全球化，却未重拾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的政策，而是转向关税。秦晖认为关税并非万能，对其推进民主的前景颇为悲观。作者认为若关税能针对低人权实体因偏离市场经济体制所造成的价格扭曲，则这种关税的征收不仅将更加师出有名，而且有助于市场制度的发育和完善，因而有利于人权的改善、民主的推进。

秦晖在其《拯救德先生：直面第三波民主潮的逆转》（上下两卷，下称《秦书》）中，发聩震聋地提出：“目前第三波民主¹遇到的危机，说到底与‘全球化中的低人权优势’有关”。秦晖为此发出救救德先生的呼吁。对所有支持民主事业的人们来说，在深感无奈的同时，也激起更大的动力，对民主化不进反退的深层原因及其拯救之道一探究竟。

秦晖多年来持续不断地对低人权优势予以批判，既反映了他的与时俱进，也使他的批判散在浩如烟海的各种文献之中，有被淹没之虑。这些文献终于由他本人汇集到上、下两卷之中，在允许言无不尽的美国出版，可省去读者和研究者为追踪这些散在各处的论文而不得不花的时间和精力，因而值得特别庆贺。

在中国的语境中，官方和接近官方的学者实际上将这一“优势”视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出奇制胜，弯道超车的杀手锏。为此，官方不惜坚持歧视农村人口、农民工以及民营企业家的诸多制度，以便维持基于低人权的所谓竞争优势。在看懂了官方意图的学者中，若无足够勇气，是不敢发声批判的。秦晖目睹低人权成为不臭反香的东西，招摇过市，知道长此以往

必对民主事业造成巨大危害，因而挺身而出，公开予以鞭笞。如此的胆识、文笔和口才，在大陆的学者中是千里挑一的。

得益于秦晖的多产和雄辩，他对低人权优势的批判在民间引起广泛共鸣。只是，共鸣虽然广泛，但多止于道德和伦理层面。由《秦书》可以看出，秦晖对低人权优势的批判远远超越道德和伦理层面。只是，当涉及更为复杂而敏感层面时，内中的道理不易为一般人透彻理解，因而曲高和寡。同时，低人权优势带来的弊病有个发展和显露过程。所以，对低人权优势的批判并非能一蹴而就。时至今日，按《秦书》的说法，人类已经面临四大危机，即经济社会危机，政治机制危机，国际关系危机和思想认识危机，可见长期忽视低人权优势之危害。

以下是本文的结构：第一部分将评述秦晖的重大学术贡献之一，在于识别出实现低人权优势的必要条件；第二部分指出，高人权实体应该引为教训的单边开放，在自废武功的同时，却未能促进低人权实体的市场化改革；第三部分讨论为何重回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的老路不切实际；第四部分讨论今后征收关税的目的，应旨在消解非市场行为带来的价格扭曲；最后是本文的小结。

一、秦晖的贡献—识别低人权实体实现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

用东德瓦解前的独裁者昂纳克（Erich Honecker）命名的寓言警告世人，是秦晖的首创。他证明，如果在推动经济一体化之前，不先以较高的（西德）人权标准为准绳实现两德人权标准的一体化，西德迟早会被迫面临三种选择，均对自己不利：1）在一段时期之后，不得不重新建立两国间的隔离

墙，以减缓乃至终止经济一体化进程；2）使自身的人权标准向东德靠拢，因而改变自身的经济-政治体制；3）自身经济因经济一体化的持续推行而崩溃。昂纳克寓言给出这三种结局，旨在警示人类，历史并不一定终结于福山所言的民主宪政和自由市场体制。如果忽视人权一体化这一必要前提，专制、独裁体制可以借助经济一体化，使民主潮流发生全球性的逆转。

对昂纳克寓言能否应验，许多人在当时是心存侥幸的。即便是秦晖自己，也曾希望这个寓言只是一个“笑话”而已。²当年东、西德之间的演变确实未出现昂纳克寓言所预言的惊悚结局，使人们一度对世界的未来走势多了一份乐观。在民主化潮流遇阻甚至逆转、全球化大幅倒退已成现实的今天，人们不禁会有世事不幸被秦晖言中的感慨和敬佩。

进入本世纪以来，以低人权优势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实力连续超越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直逼美国，成为最引人瞩目的世界性大事件。一度走上宪政民主轨道的俄国，不但重返专制轨道，而且三年前悍然武装入侵乌克兰这一民主国家，至今拒不撤军，拒不停战。归根结底，俄国也是自恃拥有低人权优势，能将大批本国青年作为炮灰投入战争，不用像高人权实体那样顾忌民意的反弹。

如果让上述低人权优势在经济和军事层面上持续下去，那昂纳克寓言不是将在世界范围内应验了吗？因此，以下两个问题对不但在思辨上富有挑战性而引人入胜，而且因探讨结果涉及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前途，而极具必要性和紧迫性：1）探讨这一寓言获得应验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前提条件，以及2）如何有效化解这一优势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第一个问题已被秦晖解决；第二个问题却未见秦晖有明确的答案，笔者愿借助此文与秦晖商榷。

为了有助于讨论，有必要重温一些定义。1) 众所周知，人权的定义不但涉及人性尊严的基本权利（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等），而且包括财权（个人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利）。2) 民主和人权两者互为基础，互相促进，因而互为因果。3) 秦晖对低人权优势所作的定义如下：“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低人权实体的竞争优势”（见《秦书》自序）。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低人权实体要实现竞争优势，1) 需要出现秦晖强调的，将人权、财权、政治权等等都暂时置于不顾，单维地推动经济一体化这一前提条件；2) 其实还需要能够持续地压低人权水平的制度安排这一必要条件。这一必要条件并未为秦晖明确强调，而在以下的讨论中将被重点提起。所谓制度安排，不但表现为将劳动的收入人为压低（例如，在中国现行的户籍和土地制度下，农民工的所得无以满足在打工地完成人口再生产的需要），还表现为不准土地私有，使私人产权失去依存之根据，其他产权也因此遭到强制性地剥夺、侵占、操控，致使生产要素的价格遭到人为扭曲。由此可见，不但农民和普通民众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民营企业家都常常难逃各种厄运。

需要说明的是，低劳动成本并不等价于低人权。劳动成本除了取决于人权的高低，还取决于劳动的供应。如果一个国家存在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因而长期抵达不了刘易斯的第二拐点，甚至抵达不了第一拐点，即使有高的人权标准，只要由市场决定性地配置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工人的工资就不可能高，例如实行民主政体的印度。

秦晖的贡献在于明确指出，只要存在经济一体化被单维度地在全球推行这

一必要条件，低人权实体就能实现自己的竞争优势，也即迟早战胜高人权实体。这是秦晖的昂纳克寓言的最主要的警世之处。理由如下：面对低人权实体的存在，高人权实体主动地推动经济一体化，则高人权实体中的资本和技术就不用顾及低人权实体的人权记录，出于逐利本性，会合法地流出高人权实体，使之产业空心化，同时源源不绝地流向低人权实体，使之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直至超越高人权实体。

东、西德之间之所以没有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结局，其实是因为发生了很幸运的事。在经济一体化发生之前，上面提到的第二条必要条件竟在汹涌的苏东波浪潮冲击下，因东德独裁政权的突然瓦解而自行消失。东德民众自愿接受了西德的宪法框架。如此一来，东德原有的低人权优势迅速失效。东、西德之间随后发生的经济一体化，便无法损害西德所存在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实力了。

二、教训：高人权实体的单边开放等于自废武功

南韩，台湾，智利等低人权实体在民众收入提高后，确实和平地完成了向高人权实体的转型。所以，人均收入的提高使低人权实体向高人权实体转变的可能性，不但得到理论的支持，也有了实证的支撑。如果算上南欧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及 1990 年代的东欧和前苏联，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关于历史已经终结、并终结于宪政民主的乐观情绪，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WTO 在 2001 年接纳中国为会员，重要原因是被中国拥抱世界的决心所感动。当时的中国，东西南北都响彻着要与世界接轨的宣誓声。同时，中国

的巨大市场散发着不可阻挡的诱惑。发达国家克服心中的重重疑虑，愿意相信中国一回，同意首先单边开放市场，换取中国用 15 年的时间，将自己改革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

15 年后，中国倒是成长为一个仅次于美国的强大经济体。令人惊愕的是，中国不是据此增大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信心，反而推出反市场导向的中国模式，以经济的飞跃发展作为这种模式具有优越性的证据，坚信世界已经出现百年未遇的东升西降大变局，决心根据举国体制下的党国需要来决定性地配置资源，通过弯道超车，不失时机地以最快的速度夺得世界经济老大的皇冠。至此，欧美日发达国家才发觉上当，中国已决心以这种在本质上与市场机制和民主体制不相洽的中国模式引领世界，争夺对国际格局的主导权。

可是，2001 年这些国家已经将自己的市场立即、单边、全面地向中国开放，等于丢了杀手锏。面对几乎不再设防的欧美日市场，在 WTO 所给的 15 年宽限期中，中国再也没有推出诸如 1980 年代解散几乎所有的人民公社，1990 年代私有化几乎所有的国营企业这样全局性的改革措施。这两大措施深刻改变了城乡全体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高度机会主义的中国当局，眼见高人权实体国门洞开，立刻抓住千载难逢的重商主义良机。在随之而来的滚滚贸易顺差面前，举国上下哪里还有动力去作艰苦的市场化改革？

在 WTO 给予的整个 15 年宽限期中，中国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 2013 年推出的一份《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³ 在这份《决定》中，中共自己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

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这是中共迄今为止，对自己的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所作的，最接近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一次表述，涉及到了资源配置机制这一所有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可是，这份《决定》出笼之时，WTO 给予中国的 15 年宽限期已经接近结束。而且，这份《决定》本来就姗姗来迟，又在几乎公布的同时，成了一份废纸。犹如儿戏一般，习近平宣读《决定》的话声未落，中共便在他的一声号令下，急剧地向党国体制回归。

不过，就在东方的秦晖用昂纳克寓言警示世界警惕低人权实体的竞争优势的几乎同时，在西方的哈佛大学，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在 2011 年出版的《全球化的悖论》一书中，也提出“全球化不可能三角形定理”（Trilemma of Globalization），即一国政府在追求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以及民主治理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与冲突。所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智者对激进全球化予以当头棒喝。高人权实体在事实面前，终于认识到，单维地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好为低人权实体得以实现其竞争优势提供了必要条件。目前，高人权实体为防被绑架，已停止单边推动经济全球化。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得出结论，WTO 起码犯了双重错误：1) 过速、过松地吸纳新成员国；2) 过快要老成员国开放市场。这两项错误使 WTO 不像 GATT 那样，由市场经济体制实体组成，却成了一个鱼龙混杂的贸易组织。因此，不但无法像当年的 GATT 那样顺利消化具有国家主义和重商主义倾向的德国和日本那样消化中国，反而给自己找来一场世纪鏖战。如果历史

能够再来一次的话，WTO 应该提高新会员的加入门槛，按照对等原则，只有确认新会员的市场机制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贸易壁垒在逐步减少之后，而不是之前，老成员国才能对等地、逐步地开放自己的市场，以避免上述错误。

三、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的老路为何不切实际？

吸取教训后的今天，高人权实体已不再坚持推动单维的经济全球一体化，因而使上文提到的，昂纳克寓言要应验必须具备的第一条必要条件不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昂纳克寓言还能应验吗？笔者认为仍有可能，理由如下。秦晖所识别的低人权实体实现自己的竞争优势的前提条件，即单维地推动经济一体化，其实是低人权实体能在竞争中获胜的强条件。低人权实体可以退而求其次，只需贸易自由化这一弱条件，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竞争优势。这是因为在目前的国际经济格局下，高人权实体的经济一时无法摆脱对低人权实体的供应链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允许自由贸易，低人权实体仍能实现自己的竞争优势。

读者会问，二次大战后，高人权实体一直在提倡自由贸易，为何没有出现昂纳克寓言的结局呢？这是因为当时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双方很少经济往来。高人权实体被迫只在自己内部搞自由贸易，反而使 GATT 因成员国在经济体制上的同类而获得极大成功。因此，上世纪 80 年代起，高人权实体考虑将 GATT 升级为 WTO 时，并无将社会主义阵营也包括进来的奢想。当中国对 GATT 的升级版感兴趣时，GATT 成员国对中国经济体制的高度异质性是极度戒备的。

可是，今日的形势已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由于轻信经济一体化口号，高人权实体单方面实行了大门洞开的政策，主动将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大量外移。作为主要的低人权实体的中国，却没有相信这个口号。中国一方面把取代英美，成为全球化新旗手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所作所为却严重违背全球化的主要原则，即各国根据比较优势组织分工合作。中国处处设防，处处留了后手，一边在关键部门拒人于千里之外，一边悄悄建成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最完整的供应链。

在全球化时代，一国能出现这种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供应链本身，就是对全球化的最大讽刺，对比较优势原则的严重违反。中国利用党国体制来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不管有没有比较优势，不惜代价地予以扶植国营企业。同时，中国利用高人权实体的不设防，向高人权实体的商业、产业、教育和科研作了全面渗透，攻占世界市场和科技的前沿阵地，企图击败靠市场决定性配置资源的高人权实体。

所以，这场世纪鏖战的难度在于：1) 高人权实体的产业已经空洞化，无法构成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供应链也变得残缺不全，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像中国这样的低人权实体。2) 中国不但拥有了最完整的制造业和供应链，而且在需要时，可以用最低廉的价格向世界倾销（例如钢铁、电动汽车、光伏产品等），或用最严厉的措施对其他国家予以封锁（例如稀土产品和锂电池等）。而且，中国的生产要素是由党进行决定性的配置的，而不是至今没有发育完善的要素市场。所以，要素价格严重扭曲。众所周知，所有产品的价格都可分解为要素价格的组合。只要要素价格扭曲，所有产品的价格都存在扭曲。

高人权实体面对严重扭曲的中国的价格形成机制，纷纷否认中国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反对让中国继续享有市场经济地位。但是，说易行难，真要从书面声明落实到贸易和经济的限制措施，必定遇到中国的强烈抵制和凶猛报复，因为中国的党国体制最善于用战斗的姿态对付各国。在排除了与中国在经济上彻底脱钩，以减少自身的伤害后，人们想起 1990 年代早期美国国会使用过的武器，即将人权记录和最惠国待遇挂钩。既然维持低人权的制度安排是昂纳克寓言应验的第二条必要条件，使这一条件失效，能否化解低人权实体的竞争优势呢？

如果检视美国国会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记录相联系的实际效果，就会发现，挂钩的效果并不理想。首先，人权记录的收集是否完整、评估标准的确立是否客观、选择和培训评估人员是否公正、评估报告的撰写和散发是否有效，对评估的结果有极大的影响。为了使评估结果尽可能完善而客观，需要庞大的资金，除了用以维持评估人员的生计，还要使他们拥有及时抵达现场的交通工具，还要保护那些作证的人员免除后顾之忧等。对人口众多、幅员广大、信息不透明、评估人和接受采访者容易受到当局报复的低人权实体来说，除了所需资金变得不胜负担外，收集和评估人权记录这项工作也会变得冗长而危险，评估结果是否全面而公正，更常常引起无谓的争议。

而且，低人权实体很快学会如何操控评估效果，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它们会无故关押已经获得国际声誉的人权活动家，又赶在国会即将讨论人权记录时，将他们高调释放，送至国外，利用暂时的国际轰动效应彰显自己从善如流，人权记录大有改进。欧美日政府为了显示自己的人权政策有效，也会默认低人权实体的这种“示好”和“做戏”，以便对本国纳税人

有所交代。当然，对人权斗士和活动家的勇气应致以崇高的敬意，对于他们获得解救也应予以庆贺。只是，少数人的解救毕竟不等于人权的普遍改进。正是后者，才能根本扭转低人权实体的优势。

可见，将人权与最惠国待遇直接挂钩，在操作中的整体效果十分有限。而且，仅仅根据人权记录，决定给不给最惠国待遇，相当于在零与一之间博弈，对两国的经济交往带来极大的冲击。在两国的经济交往十分有限的1990年代初，这种挂钩也许可行。在高人权实体实行大门洞开政策二十多年之后，美中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已经如此之高，各类中国企业早已名正言顺地进入高人权实体的各个部门，与这些国家的各个阶层、行业、集团形成了利益共生体。并不是所有的利益共同体都涉及军工和国家安全，可以用国家安全的名义予以全面禁止。高人权实体都是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民主政体，经济的稳定和民生的改善会影响选票。所以，对利益共生体针对最惠国待遇发出的呼吁或抗议，民主政府不能一概漠然处之。

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将最惠国待遇和人权挂钩，理由是相当勉强的。回顾实施挂钩政策的1990年代就会发现，很快，其他盟国不愿追随挂钩政策，最后只剩美国独自一国在坚持挂钩政策。即使在美国国会，每次审议中共人权记录，以便决定是否继续给予最惠国待遇时，最后都是同意给予的一派占了上风。这种投票结果并不反映中国的人权记录在改善，更多地反映出对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会对本国经济伤害更甚的担忧。

根据WTO的规定，一旦某国成为WTO成员国，便自动享有任何一个成员国给予其他成员国的待遇。其中，含金量最高的，就是美国给予其他成员国的最惠国待遇。美国不但市场容量世界第一，而且关税最低、贸易障

碍最少、人员和资源流动最为自由，对外国投资最为开放，科技又发达。中国之所以对 WTO 的成员国身份志在必得，也在于一旦获得，美国就无法再用国会审议人权记录的手段，阻碍中国获得这一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最惠国待遇。所以，在中国已经成为 WTO 成员国后，再谈最惠国待遇，已经为时已晚。

四、关税虽非万能，却不应轻言废用

以上讨论旨在表明，高人权实体既无法与中国经济完全脱钩，将人权与最惠国待遇重新挂钩也已时过境迁。至于借助战争手段解决贸易纠纷更匪夷所思。所以，高人权实体究竟如何应对一个经济实力已经直逼，甚至已经超过美国，却又坚持非市场体制的低人权实体呢？自从高人权实体否定中共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并反对继续给予中国以市场经济待遇，已过去将近 10 年了。尽管人们在急不可待地寻找有效对策，以便消解低人权实体的竞争优势，笔者并未见到秦晖有具体的建议，倒是见到秦晖严厉批判关税万能论。关税万能论自然是错的，因为没有何物是万能的。但反对关税万能论，不等于关税作为一个工具就真的一无是处。

秦晖在讨论世界面临的经济社会危机时十分悲观，也是笔者难以苟同的。他认为，“20 多年全球化的结果出人意料！全球性制度碰撞的‘新冷战’其实早就存在，只是它比旧冷战更‘冷’，也更‘战’。而由于西方的‘自由贸易’派和‘关税壁垒’派，都长期无视这种挑战，西方事实上已经在这种‘新冷战’中失败。”（见《秦书》“自序”）我觉得秦晖言重了，其实不必如此悲观。正像历史没有像福山推演的那般直线前行一样，东方大国虽然拥有低人权优势，但是，由于以下原因，它无法保证今后能沿着昂纳克寓言所警示的

路径继续高歌猛进。

笔者认为，低人权优势并不是中国经济能够高速发展的全部原因。客观地说，中国经济的一度高速增长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国内和国外因素。例如，即使市场化改革只部分完成，已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资源配置优化。上文提到，1980年代用分田单干代替人民公社这种农奴制，以及1990年代将绝大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使城乡本来沉睡的巨量土地、资产和劳动力得到更有效的利用。由于中国拒绝将市场化的改革进行到底，今后，资源配置优化这一因素已无法再起作用。再以国际因素为例，高人权实体在市场、教育、科技、资金、贸易等领域向中国全面开放的态势已成昨日黄花，迅速被“小院高墙”和各种关税和投资壁垒替代。正因为国内外的美景不再，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快速走低，由一度的百分之十几降到近年来的百分之几了。这段时期，中国的低人权状况其实未见有显著变化，因而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为何断崖式地下降。

令人深思的是，上文指出，人权与最惠国待遇直接挂钩，对人权的改善效果极为有限。意想不到的是，伴随着资源配置的部分市场化，不但配置效率得到极大的优化，人权也获得显著而普遍地改善。例如，随着全体农奴变成了半农奴，他们获得了排他性的土地使用权，对自己的产品有了占有权，有权进城打工，因而人身依附性显著减少。又如，本来工人犹如被国家完全支配的工奴，终生被绑定在国家或集体的某个“单位”之中，生杀大权被掌握在单位的领导手中，完全没有择业自由，更无自行创业的权利。可是，1990年的城市地区以大规模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改革，使这些工奴们有了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中谋求工作的选择自由、创业自由、以及迁徙自由。这些自由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我们可以说，城市居民的人

权和农民一样，也得到了普遍的改善，尽管离开理想状态仍有遥远的距离。

这说明，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和人权、和民主宪政是相洽的。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对人权的改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惠及所有人。由此可见，尽管将最惠国待遇和人权挂钩，旨在直接改进人权的努力受到了挫折，但市场化的结果，却使中国本来长期存在的农奴制和工奴制遭到瓦解。无论是农村人口还是城市人口，他们的人权获得重要而显著的改善。这种人权的改善，是市场化带来的，受益者是每一位农民和工人，而并非被救到海外的少数幸运者。

之所以说今日的农民仍是半农奴，是因为他们仍处于强制性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下，无权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无权携带土地退出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无权自由买卖土地来改变自己的生产规模，无权组织农会，无权迁移到打工地定居，组织家庭，完成在打工地的人口再生产，使子女融入到打工地所在的城市，纳入城市的福利体系中，成为真正的市民。因而，他们仍是半农奴。即使是拥有城市户籍的工人，他们仍没有罢工的权利，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更没有组织政党、自由选举的权利。这样的工人也只能称为半工奴。可见，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中国人权仍有普遍改善的巨大空间。

笔者认为，不应一般性地否认关税的作用。对于美国这样的高人权实体来说，为了使自己征收的关税师出有名，应更具针对性。关税可以是：1) 针对低人权实体中，因借助非市场机制决定性配置要素而引起的价格扭曲部分，而非单纯地针对因过剩劳动力的存在而引起的低工资。后者正是不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作这种区别，才能使关税的征收符合市场经济的原

则，又不会扰乱比较优势的正常发挥。2) 关税可以是针对非市场经济体制的，因而是一种制度性的关税。3) 关税可以是针对知识产权的盗窃，因而对含有盗窃来的技术的产品可以征收知识产权盗窃税。以上只是随手举的例子。由于关税的税种和税率可以层出不穷，可以灵活多变，因而关税战可说是方兴未艾。而且，征收关税的目的不仅在于保护高人权实体本国的产业和就业，也是为了最终使非市场经济体制能向市场经济体转化。它们转化得越快，越能面对较低，甚至为零的关税。

五、小结

秦晖的昂纳克寓言及其背后的逻辑发人深省。他的学术贡献之一，在于鉴定出了使昂纳克寓言应验的一个必要条件，即单维地推行经济一体化，成了低人权实体得以实现低人权竞争优势。不过，人权如此重要，欧美日发达国家却没有重新回到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的做法上去，而是转向“小院高墙”和关税，其中原因值得深思。笔者对川普的关税政策并不完全同意，但并不全盘否定，因而认为秦晖对关税的功能太过悲观。如果高人权实体在对低人权实体征收关税时，更有针对性，例如针对低人权实体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偏离程度，针对价格的扭曲程度，针对知识产权遭到盗窃的程度等，则关税的征收既能保留市场配置，保留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又能迫使低人权实体向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演进。本文并且论证了，用关税迫使低人权实体向市场化演进，其实可以显著促进人权的改进，从而间接地使低人权实体自称的世上最全的、其实是高度扭曲的制造业和供应链得到纠正。

注释

- 1 第三波民主潮指苏联东欧的“剧变”后，自由民主体制对这些国家原有的各种专制体制的胜利，并带动了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进程。于是，自由民主的支持者信心满满，以至于有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提出，乐观地认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较量，已经决定性地分出了胜负。
- 2 秦晖的原话是：“当时听到的德国人都觉得这只是一个‘反事实的笑话’（因为事实是西德与东德先实现了‘人权一体化’，然后才有的经济一体化），但是我说：在昂纳克时代的德国，这确实只是一个‘寓言’，但在今后的世界上呢？……我多么希望今天这也只是一个寓言啊！”见《秦书》的自序。
- 3 摘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报、说明（全文）。见 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1311/18/t20131118_1767104.shtml



黄奕信画作

民主
转型

约翰·希格雷
黄东益
林泽民
徐行健 译
王天成 审校

作者约翰·希格雷 (John Higley) 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政府与社会学教授；黄东益 (Tong-yi Huang) 在此文原文发表时为该校政府学博士候选人；林泽民 (Tse-min Lin) 系该校政府学助理教授

译者徐行健为中国大陆专业人士；审校者王天成系《中国民主季刊》主编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1期
2026年0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台湾的精英和解

编按：台湾的民主转型一向为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所关注，但关注往往停留在表面，对于转型发生的具体过程缺乏细致研究分析。约翰·希格雷（John Higley）、黄东益（Tong-yi Huang）和林泽民（Tse-min Lin）的这篇文章聚焦于台湾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精英和解所发挥的作用。原文首发于美国《民主季刊》1998年第2期（*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9, Number 2, April 1998）。

自1980年代末以来，主导台湾政治的、相互对立的政治精英们通过谈判与妥协，达成了基本的和解（accommodation），并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民主政体。1991年和1992年的选举首次呈现了全面的选举和政党竞争。新当选的立法委员取代了“万年国大”——其成员最初是在1947年当选的，即国民党（KMT）政权从中国大陆迁出，在台湾延续中华民国（ROC）的两年前。

1996年3月举行了首次自由竞争的总统直选；在任总统李登辉以54%的得票率连任。“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称赞这次选举是当年全球五大民主进步事件之一，并首次将台湾列为“政治自由”国家。按照标准的程序规范——自由的政党竞争、广泛的选民参与以及对基本公民自由的尊重——台湾在1990年代实现了从威权主义到民主制度的转型。1996年3月的总统选举被视为这一转型结束的完美标志。¹

我们想探讨三个问题：这一转型是如何发生的？什么模型最能描述它？台湾现在可以被视为一个巩固的民主国家吗？²如同1970年代末的西班牙，台湾的转型始于“文官化”（civilianized）的威权政权内部，这个威权政权已经历了显著的自由化。非暴力的反对派压力和外部影响在这两个案例中

都很突出。两国都涉及基本的宪法变革（西班牙是制定一部全新的宪法，台湾则是自 1991 年以来的重大修宪），随后立即进行了一系列自由选举。两国都存在着分裂性的“国家认同”（stateness）问题——西班牙的多语言和多民族构成，台湾的本省人与大陆人冲突以及关于台湾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政治地位这个压倒性问题。

最重要的是，这两个转型都涉及温和派政权精英与反对派精英之间的激烈谈判。在西班牙，谈判产生了胡安·林兹（Juan Linz）和阿尔弗雷德·斯特潘（Alfred Stepan）所称的“协约性改革，协约性破裂”（reforma-pactada, ruptura-pactada）类型的“协议转型”（pacted transition），即威权政权由政权和反对派双方的温和派协商的改革所打破，代之以民主结构。³这一模型是否抓住了台湾转型的本质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协约性改革，协约性破裂”模型（reforma-pactada, ruptura-pactada model）似乎为民主巩固提供了最好的前景。

我们将重点关注台湾精英之间两个重要但研究不足的发展：1990 年 6 月和 7 月的“国是会议”（NAC），以及 1996 年 12 月的“国家发展会议”（NDC）。这两次会议都是李登辉总统召集的、解决重大争端的宪法之外的（extraconstitutional）会议。与会者是台湾政治、经济和知识界的领袖。在“国是会议”之前和期间，执政的国民党和反对党“民主进步党”（DPP）的精英就政治改革议程达成了实质性一致。在随后的数月和数年里，会议讨论的大部分改革得以实施，包括总统的全民直选。“国是会议”之后，国民党内反改革的保守派要么被清洗，要么被说服默许，使得执政党对民进党和其他反对派团体明显比以前宽容。著名的异议人士——其中一些人在 1980 年代曾在狱中度过，另一些人则在流亡——被允许重返政坛后，

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赢得了选举职位。

六年后，在“国家发展会议”上，国民党和民进党领导人在台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这一分裂性问题、以及各种宪法改革议题上达成了共识。“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在1997年7月通过了其中的大部分；还需要再来一次会议完成这一过程。改革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其对台湾民主巩固的意义需要研究。

为了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应用“精英和解”（elite settlement）这一概念，即相互对立的精英阵营的领导人，对造成双方撕裂的核心争端进行谈判、达成妥协，突然而有意地重组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1990年的“国是会议”（NAC）构成了初步但仍然是部分的精英和解，而“国家发展会议”则是完成这一和解所必需的。

政治能够被“驯化”（tamed），即从敌对的僵局走向和平竞争，而达成这一点的最戏剧性方式，就是精英和解。⁴如果没有这样的和解，精英们对于政府制度存在分歧，进行无节制的主导权争夺，并将政治视为赢家通吃的游戏。和解达成后，精英们虽然仍隶属于相互冲突的政党、运动和信仰体系，但对政府制度和政治竞争的规则有着基本的共识。简而言之，通过在相互竞争的精英之间促成默契的相互包容与公开的自我克制的行为方式，和解可以“驯化”政治。以台湾为例，国民党和反对派精英长期处于激烈冲突中，那些冲突包括宣布戒严、制造数以千计的政治犯和流亡者，以及旨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零星地下与海外行动。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切都结束了。

更具体地说，精英和解促进了这样一个网络的形成，即连接所有重要精英群体的权力与影响力网络。虽然各方继续竞争和争吵，但他们遵循“有舍有得”(give to get)的准则，避免殊死斗争。⁵在和解达成后，竞争的精英越来越愿意认可和实施他们所领导的组织、机构彼此之间的边界及横向的责任(horizontal accountabilities)。⁶和解起初产生的精英结构可能达不到稳定民主国家所具有的多元化和对选民的责任制。然而，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从长远来看，精英竞争的驯化和渠道化(taming and channeling)会增进多元化、加强程序性民主。

尽管如此，精英和解的概念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地位有些模糊。和解本质上是高度依赖情况而定的偶然事件，正因为如此，它给政治变革理论带来了难题。和解发生的条件大致有两方面：第一，组织良好的精英阵营之间存在着激烈、代价高昂但无结果的冲突背景；第二，发生新的严重政治危机，有加剧冲突而又不会产生明确赢家的危险，从而可能引发旨在避免这种结果的精英谈判。但是，激烈的精英对立和严重的危机是政治的常态，仅凭它们不足以带来和解。还必须有一小圈领导人，他们对过去的冲突有着痛苦的个人记忆，懂得如何在精英阵营之间和内部施加政治影响力，并有足够的权威带动顽固的盟友和追随者。此外，这一小圈领导人面对同僚和大众的压力必须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因为在和解过程中，精英实际上采取了这样的原则：他们的竞争将不再由根深蒂固的教条支配。这样的转变对于追随者来说是如此不可思议，因而只有当关键性的领导人能相对自由地从事“离经叛道的交易”(heretical bargain)时才能实现。

最后，和解可能需要多年时间才能逐渐定型。它可能会排除一些因僵化的意识形态、宗教、种族或地区忠诚而无法妥协的精英团体。或者，有些问

题太复杂和飘移不定，因而势必妨碍协议的达成。排除不妥协的精英团体可能会产生反弹，而不处理太棘手的问题则使和解的结果蒙上疑云。因此，和解的巩固是一个不稳定的过 程，需要许多协调和忍耐。对于研究政治变革的理论家来说，理清这种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一堆乱麻并非易事。

此外，精英和解这一概念之所以显得模糊，还在于其特征与比较分析民主转型时常见的其他精英过程和“博弈”高度相似。大多数精英协议 (elite pacts) 并不能驯化政治；它们通常只是两三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性、策略性协议，是掩盖而非解决核心争端。塞缪尔·P·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称之为“置换”(transplacements) 和“转化”(transformations) 的某些民主转型，更接近于精英和解，因为它们涉及关键精英采取联合行动，以摆脱威权政权下的僵持，转向民主竞争。⁷ 但即使在这些案例中，也未达成根本性妥协。政治斗争仍然未被驯化，新兴的民主很快就会崩溃，或者成为持续威权主义的门面。另一方面，在西班牙佛朗哥死后的民主转型，以及 1989 年匈牙利从“成熟的后极权主义”到民主政权的协商转型 (negotiated transition) 中，林兹和斯泰潘从中观察到的“协约性改革，协约性破裂”(reforma-pactada, ruptura-pactada) 过程，是精英和解可能展开的一种特定方式。⁸ 但也有一些精英和解，是在没有西班牙和匈牙利那种先决条件和精心准备、谈判及步骤序列的情况下发生的。

台湾的转型具有真正的精英和解的大部分特征，这使其区别于亚洲其他的民主转型，例如韩国和泰国。⁹ 因此，台湾的转型比大多数学者所认识到的更为独特。特别是，如果我们关于台湾发生了精英和解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其民主巩固的前景（假设继续保持对中国大陆的自主权）就是光明的。事实上，我们认为其民主巩固已基本完成。

1990 年的部分和解

1990 年年中的“国是会议”，是在蒋经国（蒋介石之子）于 1988 年 1 月去世前后国民党威权政权自由化的背景下召开的。1986 年，蒋经国放松了对反对党的禁令，允许一个反对派团体（后来成为民进党）出现并在当年 12 月的立法院选举中赢得十几个席位。（台湾的议会融合了西方和传统中国元素，由国民大会、立法院和监察院组成。在 1994 年采用总统直选之前，国大的主要职责是选举和罢免总统以及修改宪法。立法院制定法律并审查国家预算。监察院弹劾和纠举官员。在 1980 年代，国大和立法院中只有一小部分席位是通过普选产生的。）

蒋经国去世后，副总统李登辉（本省人）继任总统并继续蒋的自由化政策（其中包括在蒋的最后几年增加了政权对街头示威的容忍度）。1989 年，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明显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的族群划分，即本省人（其政治领导人聚合在李登辉领导的主流派）和大陆人（其领导人形成了竞争派系）。两个派系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并对李登辉在国民大会竞选总统的资格发出公开挑战。尽管李登辉在 1990 年 3 月的选举中轻松获胜，但国民党内部的这场动荡促使他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加强政权日益弱化的稳定性。

之所以认为有必要召开一场议会之外的会议来讨论国家事务，正是因为以国民党为主导的议会是宪法改革的障碍。

在这些措施中，到当时为止最重要的一步，是李登辉决定召开一次会议，以详细讨论有争议的宪法问题和其他国家议题。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要求，来自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李登辉当选总统的前一周，即 1990 年 3 月 16 日，他们

在台北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两万人规模的示威活动。示威者的抗议对象是那些试图利用这次选举来扩大自己权力的“万年国大代表”（终身制国民大会代表）。他们之所以认为有必要在议会之外（extraparliamentary）召开一次会议来处理国家事务，正是因为由国民党主导的国民大会是宪法改革的障碍。为了安抚抗议者，李登辉指示国民党秘书长与民进党主席及秘书长会面，这些人同意举行一次“国是会议”（National Affairs Conference）。此外，在正式批准这一会议构想之前，李登辉本人还会见了 50 名学生运动代表。¹⁰

在 6 月底的“国是会议”召开之前，李登辉还与民进党主席黄信介达成了几项协议。最重要的是确保那些多年前当选的、代表中国大陆的“万年国代”必须卸任。两位领导人还同意，新的国民大会和立法院选举，以及台湾省省长、台北和高雄市长直选，是可取的。此外，李登辉同意认真考虑大赦政治犯、恢复他们的政治权利。

这两位最高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关键会议，为政治精英内部更和解的氛围定下了基调。例如，尽管民进党的激进派最初表示将抵制“国是会议”，但其大多数领导人最终都参加了。5 月 20 日，李登辉总统就职当天，释放了 25 名政治犯。¹¹ 几天后，国是会议筹备委员会邀请著名异见人士参加。最后，在 6 月 21 日，即“国是会议”开幕前几天，法院裁定“国民大会”中所有的“万年国代”（终身代表）都应在 1991 年底前卸任。

在这些和解举措发生之后，“国是会议”于 6 月 28 日召开。与会名单包括 150 位政界、商界和知识界领袖，其中包括 5 位曾流亡的异议人士和 6 位前政治犯。¹² 历经五天辩论和讨论，加上许多走廊会晤和幕后磋商，与会

者仍未能就总统直接民选的提案达成一致。然而，他们确实就李登辉和民进党领导人黄信介两个月前讨论的几项改革达成了一致：“万年国代”退职；新的国民大会和立法院选举；台湾省省长及台北、高雄市长直选；废除长期以来用于压制政权反对派的臭名昭著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及在制定对中国大陆政策时以保障台湾居民利益为最高准则。在“国是会议”的闭幕宴会上，昔日不共戴天的政治对手在电视镜头前举杯互敬。

“国是会议”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分水岭，体现了昔日敌对精英之间的部分和解。首先，它让先前流亡或入狱的异见人士与曾流放或监禁他们的国民党领导人面对面会谈。其次，它产生了一个政治改革的共识议程，尽管“国是会议”并无法律上的权力，但达成协议的议程仍得以推进。第三，李登辉及其同僚，由于与政权反对者成功谈判、赢得学运人士的赞赏，而加强了对政府的掌控，孤立了国民党内的顽固守旧派。

然而，“国是会议”并未能达成全面的精英和解。部分原因在于环境。尽管台湾精英阵营之间的冲突长期存在，而且是激烈的，但与其他地方发生和解前的情况相比，它并不是特别“代价高昂”(costly) 或“结局难料”(inconclusive) 的。¹³ 很难说国民党在冲突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即便1990年3月有学生示威，也没有发生危机。此外，各党派领导人无论在会议上多么缓和，显然都没有足够的自主权来达成全面的和解。李登辉本人面临来自国民党内非主流派的坚决反对，并且在宪法上受制于国民大会的改选，非主流派在“国民大会”中势力强大。事实上，李登辉在会议后遭到了严厉批评，不得不通过成立由党内元老组成的“宪政规划十三人小组”，来安抚国民党保守派。民进党领导层在面对其激进派方面也有类似困境，激进派提出了自己的宪法蓝图。¹⁴

因此，“国是会议”达成的协议是有限的。他们回避了台湾从中国独立这一爆炸性问题。¹⁵ 同样，关于宪法设计也存在很多分歧。虽然达成了应改革现行总统选举程序的共识，但直选并未得到国民党的全力支持。¹⁶ 关于中央政府应该是总统制、议会制还是混合制，也没有达成一致。这些未解决的基本问题将继续给台湾政治投下阴影。

精英合作——以及冲突

“国是会议”之后六年间，精英政治在结构与运作方式上的变化，构成了1996年国家发展会议召开的背景。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随着政治分野（cleavages）结构的变化，实际政治上的学习所得，使反对派精英越来越有动力按照民主的“游戏规则”行事。由于对“国是会议”未能解决国家认同问题感到失望，民进党激进派迫使该党在1991年的纲领中加入了要求台湾独立的条款。大多数民进党候选人在那年晚些时候竞选国大代表时组成了“台湾共和国连线”。同时，围绕社会经济问题和国民党“金权政治”的新分野出现，跨越了国家认同上的分野。¹⁷ 民进党以及几位即将组建“新党”（New Party, NP）的国民党非主流派年轻成员，在1992年的立法院选举中利用了这些新分野。当“新党”于1993年从国民党分裂出来时，政治变成了三方对立。尽管国民党仍然是主要政治力量，但它面临着来自民进党和新党日益激烈的选举竞争。

这种三党格局，加上双重分野结构，催生了联盟政治。特别是，民进党面临着是与新党还是国民党结盟的两难。1992年选举后，民进党和新党合作通过了反腐败立法；在1995年立法院选举中，国民党勉强保住多数席位，两个反对党随后宣布“大和解”（great conciliation）。但是，由民进党主

席施明德倡导的与新党结盟的策略，在 1995 年民进党 - 新党联合竞选新选举后的立法院长失败，证明不太成功。其政治代价在次年显现，当时民进党内激进的台湾民族主义者，不再甘愿为了得到新党的支持而在独立议题上让步，分裂出去成立了“建国党”。

这给了民进党领导人某种自由进一步缓和其立场。当民进党“美丽岛系”领袖许信良重返党主席职位并开始向国民党示好时，这一进程加速了。¹⁸ 但许信良关于“大联盟”政府的构想，在遭到党内成员抨击后破产了。

与此同时，民主化进程和精英合作的有限，在不断演变的宪政秩序中导致了僵局。台湾的宪法规定了一种总统 - 议会制的混合体制，总统只有在其所属政党在立法院拥有有效多数时才是强有力的。因此，行政院长虽由总统提名，但必须经立法院多数同意才能任命，并且总统和行政院长都无权解散立法院、举行新选举。民进党和新党组成的特定议题联盟带来了经常性的立法瘫痪——人们预计总统直选只会使这一问题恶化。一种担忧是，直选总统尽管有选举授权，却可能无法让立法院批准他提名的行政院长。另一种担忧是，1994 年首次普选产生的台湾省省长，其选区范围达到总统选区的五分之四，可能强大到足以抵制一个软弱且陷入僵局的中央政府的指令。¹⁹

然而，直到精英们准备搁置他们在困难的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分歧，再次召开宪法外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呼声，才得以实现。令人意外的是，促成妥协的主要动力来自北京，北京在 1995 年 11 月立法院选举前夕至 1996 年 3 月总统大选期间对台湾发起了一系列好战行动。大陆军队在台湾外海进行了一系列导弹发射和海军演习。这些恐吓行动似乎是对李登辉试图为

台湾争取更大国际承认的反应。这些行动的时机也暴露了北京方面担心台湾的全面民主会导致宣布独立。

1995 年 11 月，在股价暴跌和资本外逃的情况下，反独立的新党赢得了 13% 的普选票和立法院 164 个竞争席位中的 21 个，主要以牺牲国民党为代价。但北京的威胁在 1996 年 3 月的总统选举中似乎适得其反，李登辉轻松获胜。

北京的好战震惊了国际社会和台湾人民，特别是政治精英。这场危机虽然因两艘美国航母战斗群部署到附近水域而得到遏制，但对精英们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香港定于 1997 年 7 月归北京统治，澳门于 1999 年紧随其后，许多领导人担心台湾将是统一议程上的下一个。对精英们来说，很明显，推动完全独立将冒着与中国开战的风险。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与霸凌的中国进行统一在选民中已失去曾经拥有的任何吸引力。从根本上说，这场危机使得精英们迫切需要寻找一条走出国家认同困境的出路，这是“国是会议”未能做到的，但对于台湾成为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却至关重要。

在 1996 年 5 月 20 日的就职演说中，李登辉总统呼吁进行新的尝试，就关键问题达成共识。各政党精英都得出结论，他们可以从李登辉的提议中获益，因此都对此表示欢迎。通过在新的国家论坛上与反对党合作，国民党精英可以加强国家团结，并在北京的威胁变得更加凶险时为分担责任奠定基础。就民进党领导人而言，他们对该党是两岸局势恶化主要责任方的指责很敏感，他们希望软化民进党在独立问题上僵硬的形象。由于新党在支持统一方面同样僵化，其领导人担心受到被中国威胁激怒的选民的政治反弹。这场危机——或者更具体地说，它促使关键精英在独立问题上的温

和化——解释了为何在 1996 年 12 月最后一周“国家发展会议”召开之前，关于如何处理该问题的三党共识便已形成的原因。

最终的和解

作为迈向最终精英和解的重要一步，国民党、民进党和新党的代表就一系列两岸议题达成了初步共识：同意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因此与海峡对岸政权“地位平等”）；台湾岛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拒绝北京的“一国两制”方案）；并且应积极争取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但仅作为长期目标。新党和民进党——在国家认同问题上最对立的政党——为了达成这一共识都做出了重大让步。精英们在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上成功寻求共识，令人印象深刻且意义重大。

“国家发展会议”于 12 月 23 日召开，由行政院长连战和三大党领袖共同主持，共有来自社会各重要领域的 170 名代表参加。由于精英们在会前的准备工作，两岸关系和经济发展议题的开场讨论几乎没有发生冲突。但在第二天，当重大宪法改革议题被列入议程时，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代表希望精简或废除台湾省政府。新党代表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相当于废除台湾作为中国 35 个省份之一的正式地位，从而构成迈向独立的危险一步。在激烈磋商、谣言四起和对国民党与民进党秘密交易的怀疑中，新党代表威胁要退席。

由于在第三天议程中其他宪法改革议题上与国民党和民进党存在分歧，新党代表的决心愈发坚定。新党偏好强有力的内阁制政府，反对任何涉及扩大总统权力的混合制度。当国民党领导人拒绝进一步让步时，新党成员于

12月27日上午退席。

新党的离开防止了宪法问题上的僵局，并加速了国民党和民进党精英之间的共识建立。他们迅速同意重新设计中央政府，精简省级政府（部分通过冻结其省长和议会选举来实现），并限制党营事业的范围。这一共识使得会议能够通过多项决议，它们涉及深远的宪法改革、政党制度改革、两岸关系及经济发展等领域。

这些决议体现了两个精英阵营做出的基本让步，正如党派间妥协有予有取（give-and-take）的记录所清楚表明的那样。甚至新党也同意了关键的两岸议题；其领导人在会议后宣布，该党将遵守在新党退席前达成的一致协议。民进党在会议报告正文中接受了对台湾采用的中华民国称谓。与此同时，国民党和新党接受将“‘两个’对等政治实体”表述作为“共同意见”，将他们偏好的“一个国家”表述降格至“其他意见”部分。他们还采纳了民进党的“台湾优先”（Taiwan foremost）原则，即必须保障台湾控制地区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国民党和民进党同意调整外交政策优先级，放缓台湾重返联合国的努力。尽管新党主张大幅增加与中国的经济、贸易、文化和学术交流，但它同意台湾的国家安全和繁荣必须优先于这些联系，新党并与其他政党一起宣布北京的“一国两制”方案是不可接受的。

关于宪法和政党制度改革的共识仅限于国民党和民进党。为了克服频繁的行政-立法僵局，国民党强烈倾向于这种宪法制度，即总统不仅无需立法院同意即可任命行政院长，而且还能解散立法院、安排新的选举。民进党对扩大的总统权力保持警惕，坚持立法院应能举行不信任投票，审计行政部门，启动弹劾，并就政府行动和政策举行公开听证会和调查。民进党还

希望废除国民大会和台湾省政府。根据其经常谴责国民党垄断性企业和“金权政治”的立场，民进党另外希望禁止所有党营企业参与政府事业和在中国的投资。总的来说，国民党在扩大总统权力这一主要目标上取得了成功，而民进党实现了其大部分关键目标。尽管新党不是“国家发展会议”决议的参与方，但它将从转移给立法院的新权力中受益，并且它支持禁止党营企业涉足政府项目。

“国家发展会议”达成的协议预定在国民大会 1997 年 5 月的会议上成为宪法修正案和法律。然而，就在“国家发展会议”仅仅四个月后，一位名人的十几岁女儿被绑架和谋杀（白晓燕案——译者注），连同其他两起未破获的重大谋杀案，导致公众对李登辉政府失去信任。数万人和平示威，要求李登辉道歉和连战院长辞职。这大大削弱了李登辉，促使批评者在“国民大会”反对这些决议。台湾省省长宋楚瑜此前曾威胁要辞职，以抗议“国家发展会议”缩减其政府规模的协议，此时态度愈发强硬。民进党主席许信良，是李登辉公开的坚定支持者，也在党内遭到削弱。

在国民党内部，反对立法通过“国家发展会议”决议的，主要来自知识分子，他们将总统权力的扩张视为反民主；省级和地方的官员也反对，他们在现行体制中拥有既得利益。在民进党内部，“总统制联盟”（Alliance for the Presidential System）预期台北市长陈水扁将参选总统，而积极倡导建立美国式的总统制。这些“国家发展会议”协议的强硬反对者，使 1997 年 5 月开幕的“国民大会”会议出现激烈对抗，多次险些使整个改革进程脱轨。然而李登辉总统仍决心推进这最后一轮宪法修正案。他聚焦于两项议题：终止立法院对行政院长的议会确认程序，以及缩减省级政府。自李登辉 1996 年 3 月当选总统后，立法院僵局持续未解，国民党在下次选举中可能

失去多数席位的阴云日益浓重。李登辉尤其对他决定留任副总统连战为行政院长而引发的宪法争议感到沮丧，同时他也意图遏制宋楚瑜角逐国民党2000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势头。

经过两次会议延期和马拉松式的谈判，国民党和民进党领导人于六月下旬宣布就法式总统-议会制的主要特征达成协议。在国民党和民进党领导人的大力推动以及新党的多次阻挠和抗议之后，“国民大会”于7月18日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立法落实了“国家发展会议”的关键决议。这些修正案取消了立法院确认总统任命行政院长的权力，并赋予总统在特定情况下解散立法院的权力。为了平衡总统权力的扩大，立法院获得了对行政院长进行不信任投票的权利。另一项修正案暂停了省长和省议员的选举，并设立了一个由内阁任命的委员会来监督省政府。由于“国民大会”未能立法通过“国家发展会议”的所有决议，国民党和民进党同意在1998年举行另一次会议，以完成宪法改革。然而，民进党在1997年地方选举中的意外大胜，使召开这次会议的可能性变得不明朗。

锦上添花

“国民大会”在1997年年中的行动，为台湾政治精英六个月前在“国家发展会议”上“烘焙的蛋糕”加上了糖霜。就其本质而言，“国家发展会议”近似于一次典型的精英和解。它由一场重大危机引发，促使对立的精英调整其在基本问题上的对立立场。在它之前出现了具有足够权威的领导人，特别是在国民党和民进党内，能够克服同僚和群众对背离既定纲领目标的抵制。李登辉通过在1990年代初击败国民党非主流派的挑战，掌握进程让其挑战者在1993年脱党组建新党（NP），并在1996年3月的总统直选中

获得强大的民众授权，达到了一个可以带领国民党超越其先前意识形态界限的地位。与此同时，民进党领导人学会了如何成功地玩转选举和立法政治的游戏，并控制了党内根深蒂固的派系斗争。随着教条主义者(ideologues)被边缘化，政治符号让位于实质性的、可解决的问题，这使得“国家发展会议”能够达成一个相对全面的协议。尽管李登辉和许信良在1997年上半年都遭遇了严峻的领导力挑战，但最终他们还是取得了胜利，并且“国家发展会议”的关键决议也成为了宪法的一部分。

由于“国家发展会议”所处理的两岸议题，本质上是深刻分裂台湾精英群体的国家认同问题，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就尤为重要。任何在国家认同上存在严重分歧的国家，不能认为其民主是稳固的。²⁰ 诚然，在两岸议题上达成的一些共识，更多的是掩饰分歧，而非根本性的协议；政党精英们对于两岸关系应如何发展，仍然持有不同看法。“国家发展会议”上就两岸议题表达的“共同意见”，之所以能获得所有政党的认可，正是因为它在台湾地位问题上的模糊性。甚至“台湾优先”(Taiwan foremost)这一原则，也可以被用来推动“独立”和“统一”的两种主张。尽管如此，精英们——当然，他们是在北京的威胁阴影下行事的——设法在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上找到了共同表述，这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发展会议”就经济发展达成的协议同样意义重大，因为它们表明精英之间不存在深刻的阶级分化。1990年代台湾政治中社会经济裂痕的出现，确实反映了对经济不平等的严重不满。然而，“国家发展会议”淡化了民进党在近期选举中倡导的那种有争议的福利国家提议。与会者转而聚焦三大发展战略：加速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更有效地利用台湾有限的经济资源，以及提高政府效率。与两岸决议一样，与会者几乎没有争议地认可了

这些发展战略。

“国家发展会议”的大多数批评者，对这个会议处理两岸问题和经济发展的方面几乎没有异议。他们的大部分火力反而集中在由国民党—民进党协议所建立的“改良混合制”(reformed mixed)（即总统—议会体制）宪法秩序，他们认为这可能带来不稳定。批评者还担心，总统权力的加强以及省级和地方选举的暂停是反民主的预兆。

虽然这些担忧中有一些是合理的，但“国家发展会议”协议所阐明的理由——避免宪法僵局、提高行政效率，以及关闭受金钱政治困扰的选举领域——也同样合理。尽管“国家发展会议”就两岸关系和经济发展达成了协议，但台湾的二维分野结构(two-dimensional cleavage structure)依然牢固，使得不同的联盟模式成为可能。归根结底，评判“国家发展会议”的标准，不应该是新宪法秩序是否接近完美，而应该是这一方面的成功，即曾经分裂的精英们在民主游戏规则上达成广泛协议、从而驯化了原本相当不节制的政治竞争。

新党(NP)拒绝参加大部分“国家发展会议”，拒绝批准其正式决议，但这并不能否定“国家发展会议”达成了最终精英和解的观点。和解很少能达到绝对包容的状态；一个或多个重要的精英群体常常会被武断地排除在外（或者像新党这样，选择退出）。对于一次和解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主要的精英阵营达成了根本性的妥协；事实上，这似乎正是1996年底国民党和民进党（至少在两岸问题上也包括新党）之间所发生的情况。无论是新党还是在“国家发展会议”筹备工作开始后才成立的“建国党”(TAIP)，都没有诉诸大规模动员或其他破坏性策略来推翻“国家发展会议”的决议。

比起新党和建国党缺席“国家发展会议”，可能更具影响的是宋楚瑜拒绝认可这些协议。宋楚瑜此后一直试图缓和与李登辉总统及中央政府的紧张关系，但其拒绝的代价，要等到2000年总统大选时才能得到充分评估，那时他几乎肯定会是主要竞争者之一。

台湾出现联合的政治精英和巩固的民主政体，其过程之清晰与戏剧性堪称独一无二。主要原因在于“国是会议”(NAC)和“国家发展会议”(NDC)所达成的和解。就其审慎的筹备、对立精英阵营的参与、对核心争端的处理，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让步和达成的宪法与政策变革而言，这两次精英会议在亚洲其他地区是无可比拟的。

注释 ······

- 1 民主转型完成的标志是：“一个政府通过自由和民众投票直接产生而上台执政，该政府在事实上(*de facto*)拥有制定新政策的权力，并且新民主制度产生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在法律上(*de jure*)不必与其他机构分享权力。”胡安·林兹和阿尔弗雷德斯特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难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3.]
- 2 换句话说，对于所有重要的政治参与者、对于绝大多数公众以及对于一个领土完整的国家内的所有政府和非政府力量来说，民主是否是“唯一的选择”(“only game in town”？)林兹和斯特潘：《民主转型问题》(Linz an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6.)
- 3 林兹和斯特潘：《民主转型问题》(Linz an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61, 87–115.)
- 4 乔万尼·萨托利：《自由政府能走多远？》(Giovanni Sartori, “How Far Can Free Government Travel?” *Journal of Democracy* 6 (July 1995): 101–11.) 本节借鉴了John Higley和Michael Burton对精英和解的比较分析，《精英和解与民主的驯化》，[“Elite Settlements and the Taming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3 (Winter 1998): 98–115.]
- 5 乔万尼·萨托利：《民主理论再探》第一部分：当代争论[Giovanni Sartori,

Democratic Theory Revisited. Part I: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1987), 224.]

- 6 吉列尔莫·奥唐奈：《关于巩固的幻觉》[Guillermo O'Donnell, "Illusions About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7 (April 1996): 34–51.]
- 7 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 8 林兹和斯特潘：《民主转型的难题》(Linz an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61n. 1.)
- 9 但参见迈克尔·G·伯顿和贾伊·P·柳：《韩国的精英和解与民主巩固》[But cf. Michael G. Burton and Jai P. Ryu, "South Korea's Elite Settlement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25 (Summer 1997): 1–24.)]
- 10 有关学生运动的详细记载，请参阅：何进山、管鸿志、张丽倩、郭承启：《台北学运》[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student movement, see He Chin-shan, Kuan Hung-chih, Chang Li ch'ieh, and Kuo Ch'eng-ch'i, *Taipei-hsüehyun* (Taipei Student Movement) (Taipei: Shih-pao Wen-hua, 1990).]
- 11 曾身陷囹圄并进行四年绝食抗议的政治犯施明德，以及在偷渡回台湾后被捕的流亡异见人士许信良，均在获释之列。许信良和施明德分别于1991年和1993年成为民进党的连续两任主席。
- 12 少数受邀的知名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例如彭明敏）仍然抵制了这次会议。
- 13 参见希格雷和伯顿：《精英和解与民主的驯化》(See Higley and Burton, "Elite Settlements and the Taming of Democracy," n. 4.)
- 14 民进党官方的《民主大宪章》规定了一个类似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总统-议会混合制。然而，激进派起草的《台湾共和国宪法》主张实行议会制，总统仅具象征性权力。
- 15 民进党前主席、参会者之一姚嘉文事后评论说，在“国是会议”的每次会议上，“国家”的定义——究竟是指仅限台湾，还是指台湾加中国——都存在争议。姚嘉文的结论是，“国是会议”因未能就这一紧迫问题达成协议而不得不被视为一次失败。费浩伟（编）《宪政改革与中华民国的未来》[Harvey Feldman, ed.,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he Futur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1991), 27.]
- 16 那些反对全民直选的人支持采用类似于美国选举人团的制度，以“国民大会”成员作为选举人。
- 17 林泽民、朱云汉和梅尔文·J·希尼奇，《台湾的冲突位移与政权转型：一项空间分析》[Tse-min Lin, Yun-han Chu, and Melvin J. Hinich, "Conflict Displacement

and Regime Transition in Taiwan: A Spati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48 (July 1996): 453–81.]

18 许信良为民主进党在1993年台湾省长选举中的败选承担责任，辞去了党主席职务，但他于1996年再次当选。

19 由于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台湾正式保留了其作为中国“一省”的地位，它也保留了自己的“省级”政府。中央政府长期被国民党外省人主导，而台湾本地人在省级层面更为突出。如何处理这个“多余的”省级政府，成为1990年代台湾的一个分歧性议题：一方面，强大的既得利益者希望其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它的废除被北京和台北的许多人认为是走向断绝与大陆所有政治联系的重要一步。

20 林兹和斯特潘：《民主转型问题》（Linz an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19–20n. 1.）



黃奕信画作

制度设计

迈克尔·平托 - 杜辛斯基

言晓义 译
余浩风 审校

迈克尔·平托 - 杜辛斯基 (Michael Pinto-Duschinsky) 是西伦敦布鲁内尔大学政治学高级研究员，兼任国际政治科学协会“政治筹资与政治腐败”研究委员会主席

译者言晓义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获台湾梁实秋文学翻译奖；审校者余浩风曾获政治学博士，系《中国民主季刊》编辑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1期
2026年0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全球视野下的 政治筹资

编按：“金钱与政治”在许多民主国家都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未来民主化后也会面临这个问题。迈克尔·平托-杜辛斯基 (Michael Pinto-Duschinsky) 此文从全球范围对政治筹资问题的挑战与管理做了比较研究，原载于美国《民主季刊》2002 年第 4 期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3, Number 4, October 2002)。

民主选举和民主治理涉及崇高理念，却又往往掺杂了可疑甚至肮脏的做法。选举活动、政党组织、压力团体以及广告都需要花钱。这些资金必须从某个地方筹得。政治生活的筹资是必要的——同时也很麻烦。

有关竞选和政党筹资的新法规频繁出台，这证明了许多现有的监管和补贴制度的失败。全球各地几乎每个月都会在某地爆出一桩与政治献金有关的新丑闻。1995 年在比利时，威利·克拉斯 (Willi Claes) 被迫辞去北约秘书长一职，事件源自四年前一起耸人听闻的案件：当时比利时社会党领袖安德烈·库尔斯 (André Cools) 在家门外被枪杀，因他卷入了法国和意大利军火制造商向比利时社会党提供政治捐款以换取军火合同的交易。2000 年秋天的乌克兰，网络记者乔尔吉·贡加泽 (Georgi Gongadze) 丧命，部分原因是他曾调查商界寡头涉嫌参与政治筹资有关的腐败交易。

尽管全球不断涌现此类新闻，也尽管学术研究日渐增多，政治筹资及其滥用仍笼罩在神秘之中。围绕它们的许多广为流传的看法并未得到证实，甚至是错误的。原因部分在于“政治筹资”形式繁多、难以定义，部分则在于对其的研究仍存在巨大空白（特别是关于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资金的研究）。我无法在此提供穷尽一切的论述，但将进行大致的考察并总结出当前对此议题的认知状况。

我们或许首先要问：“什么是‘政治筹资’？”最狭义的定义是“用于竞选拉票活动的资金”。由于政党在世界许多地方的选举活动中扮演关键角色，而且选举期间的党务开支与日常开支之间难以划出清晰界线，因此政党资金也可以合理地被视为“政治筹资”。政党资金不仅包括竞选开支，也包括维持常设办事处的费用、进行政策研究、开展政治教育、选民登记及政党其他常规职能的开销。

在竞选和政党之外，资金也以许多其他方式用于直接的政治目的。若要全面描述，我们必须研究：1) 政治“基金会”以及其他与政党虽在法理上独立、却与之结盟并推动其利益的组织；2) 政治游说的成本；3) 为推行特定党派立场而设立并付费的报纸与媒体开支；4) 与政治相关的案件的诉讼费用。显然，可注入政治的资金渠道数量之多，不仅造成定义和研究上的困难，也使得政治筹资在实践上难以控制。一旦某个政治资金渠道被堵住，其他渠道就会取而代之。

腐败问题

除了会引发丑闻和腐败，政治活动的资金来源方式也可能导致严重的不平等。如果竞选成本过高，没有私人财富的公民可能被迫无法参选公职。而且，当富有的候选人或有钱人支持的政党能够比对手花费更多时，选举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公平的。因此，为改革政治资金的使用而制定的法规和补贴可能具有不同的目标。一个旨在控制政党资金及竞选活动筹资腐败的制度，往往与主要致力于促进“公平”的制度不同。

让我们先从腐败问题说起。毫无疑问，与政治资金有关的丑闻，已成为许

多国家努力推动改革的主要刺激因素。然而，就像“政治筹资”一词本身一样，“腐败性”政治筹资的含义也常常含糊不清。政治腐败的传统定义（如“利用公职谋取未经授权的私人利益”）往往并不适用于腐败性政治筹资。首先，将政治腐败定义为“利用公职”并非适用于所有形式的政治筹款。例如，竞逐现任职位的候选人按定义来说还没有当选上公职，但他们仍可能接受金钱，以换取在当选后滥用职权的承诺。政治腐败与政治筹资腐败之间的第二个区别是，在后一种情况下，资金不一定用于私人获利，而是用于政党或候选人利益。

日常用语中提到的“腐败”的政治筹资通常指以下几类：

违反现有政治筹资法律的政治捐款。非法捐赠通常被视为丑闻，即使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捐赠者从中获得了不正当利益。著名例子包括肇始于 1991 年的“菲莱萨 (Filesa) 案”，该案导致西班牙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 (Felipe González) 在选举中失利；2000 年德国的“科尔门” (Kohlgate) 丑闻；以及同年以色列的“一个以色列事件” (One Israel Affair)。

政治公职人员将其从腐败交易中获得的金钱用于竞选或政党目的。在此情况下，腐败政治资金与其他形式的政治腐败的唯一区别，是受贿者将贿赂用于何处。1990 年代的例子包括罗马尼亚的“科斯特亚事件” (Costea Affair) 和肯尼亚的“戈尔登伯格事件” (Goldenberg Affair)。在这两起案件中，据报道，涉及数亿美元的腐败所得部分流入私人腰包，也部分进入竞选金库。

未经授权将国家资源用于党派政治目的。这是执政党竞选的一个常见特

征，在成熟的和发展中的民主国家中都一样。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1996 年连任竞选期间，曾邀请支持者参加白宫咖啡会和入住林肯卧室，这属于他利用公共资源筹款的较为“温和”的方式。更重要的是，用公共资金支付给从事党派活动的工作人员，这一做法相当普遍。据称，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 (Jacques Chirac) 就曾利用其担任巴黎市长时可支配的数百个酬庸职位，使其政党无需为总部筹集私人资金。在非洲部分地区及前苏联，国家和地方官员可支配的资源被公开用于竞选拉票。

接受金钱以换取未经授权的好处，或承诺在当选后给予好处。这一类别的代表性实例恐怕足以填满一部百科全书。在撰写本文而进行的调查中，我发现了来自 28 个国家的重大案件，从安提瓜和巴布达到英国和美国，从比利时与巴西到意大利与印度，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到喀麦隆。必须强调的是，所有例子均为涉嫌。本文并不暗示文中提到的任何人都必然有罪，因为在这一领域中，虚假与真实的指控都极为常见。

一些出现严重指控的国家已在下面的方框中列出。显而易见，世界各地都曾有政治人物卷入重大丑闻。在政治筹资的清廉问题上，西方无权向发展中民主国家说教。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指控往往涉及最高级别的政治人物。除了前文已提到的人物之外，还包括：美国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 (Spiro Agnew)、安提瓜和巴布达的伯德家族成员、苏里南总统德西·鲍特瑟 (Dési Bouterse)、巴基斯坦总理贝娜齐尔·布托 (Benazir Bhutto)、西班牙副首相阿方索·格拉 (Alfonso Guerra)、捷克总理瓦茨拉夫·克劳斯 (Václav Klaus)、德国经济部长奥托·格拉夫·兰布斯多夫 (Otto Graf Lambsdorff)、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 (Carlos Andrés Pérez)、巴哈马总理林登·平德林 (Lynden O. Pindling)、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 (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以及日本首相竹下登 (Noboru Takeshita)。

来自名声不佳来源的捐款。即便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存在利益交换或承诺过未来利益，普遍的推定仍是：不洁的来源可能带有不洁的动机。据 1960 年的一项学术测评，当时美国各州及地方竞选资金中约有 15% 来自黑社会势力，这些势力渴望保护其罪恶的营生。在俄罗斯，关于犯罪头目染指拉票与竞选资金的传闻广泛流传。一些最有戏剧性、最确凿的犯罪根源案例，则与中美洲、南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毒贩对政治活动的资助有关。1994 年，随着所谓的“毒品录音带”曝光 [这些录音暗示毒资注入了埃内斯托·桑佩尔 (Ernesto Samper) 的哥伦比亚总统竞选]，桑佩尔竞选团队的主任及其他高层官员锒铛入狱。

将资金用于被禁止的用途，如收买选票。这一代价昂贵的竞选手段已有悠久历史。十九世纪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 的小说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如今这种现象似乎更多发生在相对贫困的国家，尽管在美国某些大城市仍存残余迹象。在许多地方，一般选民都期待候选人向他们派送各种礼物，通常包括食物，尤其是免费酒水（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此举称为“用朗姆酒灌醉农场主”¹⁾）。我近期的研究发现，大规模买票现象广泛出现在很多国家，包括亚洲的柬埔寨、马来西亚和台湾；非洲的喀麦隆、肯尼亚、乌干达和津巴布韦；美洲的安提瓜和巴布达、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苏里南；甚至包括太平洋的萨摩亚。

竞选资金丑闻样本

巴西：1992 年 12 月下旬，面临弹劾压力的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总

统 (Fernando Collor de Mello) 辞职，当时社会上盛传政府承包商向德梅洛竞选团队提供回扣和非法捐款的指控。最高法院后来判他无罪。他的竞选筹款人保罗法里亚斯 (Paulo Cesar Farias) 被判软禁，并于 1996 年被发现遭枪杀。

克罗地亚：2001 年克罗地亚民主联盟 (CDU) 下台后，有消息披露该党大部分经费是通过“敲诈式”方案筹得的——根据这些方案，政府承包商必须向该党的金库提供大量捐款，才会收到政府支付的合同款项。²

厄瓜多尔：基督教民主党 1998 年成功当选总统的贾米尔·马乌阿德 (Jorge Jamil Mahuad Witt)，在候选人阶段曾收受普罗格雷索银行所有者 310 万美元，此一未公开的捐款被曝光而成为丑闻。基督教民主党因此面临 620 万美元罚款。

德国：2002 年春，科隆市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前领导人诺伯特罗伊特 (Norbert Reuther) 因接受非法政治捐款被逮捕。这些款项据称与一家垃圾处理公司获建并运营一座价值 3.53 亿美元焚化炉的合同有关。

印度：自 1987 年起的博福斯事件 (Bofors Affair)，以及 2001 年 3 月的 Tehelka.com 案，都涉及为军火合同提供政治捐款的指控。前者涉及与总理拉吉夫·甘地关系密切的政治人物，以及瑞典军火制造商博福斯公司 FH-778 火炮的合同。

意大利：在冷战结束后，长期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被铺天盖地的指控吞没，并最终瓦解。相关调查被称为“洁手行动”。到 1994 年，至少有七名党内高级官员在接受调查期间自杀。2000 年，为躲避起诉而逃亡并在逃亡期间获缺席审判的前社会主义总理贝蒂诺·克拉克西 (Bettino Craxi) 在突尼斯去世。

日本：1990 年代发生多起疑似“捐款换合同”的案件，包括 1998 年大阪油商

辻俊一的定罪，以及 2000 年涉及前建设大臣中尾荣一与某建筑公司关系的丑闻。

巴布亚新几内亚： 所谓的“大规模腐败”案例包括外国公司支付选举经费以换取许可证，以及向政治人物提供个人贿赂。这些款项往往来自海外伐木企业。

韩国： 1996 年，前总统卢泰愚 (Roh Tae-woo) 与全斗煥 (Chun Doo-hwan) 被判处长期监禁，并被处以总计 6 亿美元罚款。他们的罪行之一是筹集秘密资金，并将其中三分之二用于他们的政党。1997 年的韩宝事件则涉及破产的韩宝集团被控通过利益交换获得特殊待遇，其曾对时任总统金泳三 (Kim Young-sam) 1992 年竞选提供大量政治献金。

西班牙： 根据政治筹资学者兼西班牙内阁部长皮拉尔·德尔·卡斯蒂略 (Pilar del Castillo) 的说法，有建筑业相关人士曾在 1991 年承认，向党库支付 2% 至 4% 的佣金被视为“获得工程合同的常见方式”。³

英国： 在 1997 年的“一级方程式事件” (Formula One Affair) 中，新上任的工党政府 (由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领导) 被指控更改政策，允许在大奖赛赛事中播放烟草广告，以满足一位捐赠 155 万美元的金主的商业利益。不确定该捐款是否影响了工党政府的政策转变，但捐款后来被退回。

“请客送礼”在乌干达十分常见，其中包括“提供……肥皂、糖、盐和酒”。⁴ 在孟加拉国，“贿赂是无所不包的，从茶、槟榔……香烟、午餐……一块铁皮屋顶……到给贫穷选民派发现金等”。⁵ 在加勒比地区昔日的荷兰属地苏里南，1996 年选举期间，新阵线联盟“仍在发放传统的咸鱼和朗姆酒”。⁶

在保加利亚，代表罗姆人的政党的口号是：“吃他们的肉丸子，但用你自己的心去投票！”阿纳托利·罗曼纽克（Anatoliy Romaniuk）报告称，在乌克兰利沃夫（Lviv）附近的一个选区，一名议会候选人把“选举中的猪肉政治”发挥到极致，他花了相当于10万美元的代价，派发小猪给当地农民以吸引选票！

在泰国，行贿直接以现金进行。正如一位权威人士的描述，在该国：

购买选票至少有两轮。第一轮称为“铺地毯”，意思是发给每位选民一小笔现金，以此作为候选人的自荐。在最后一轮中，选民可以根据选区候选人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获得更多金额。这一轮通常发生在投票日前夜，这一夜被称为“狗吠之夜”，因为太多买票者深夜拜访村民，以至于看家狗整夜狂吠。⁷

上述所有腐败政治资金的形式——从非法献金到买票——都与政党和选举活动有直接关系。当然，金钱在政治中发挥作用还有很多其它的可疑方式。仅举最近的一个例子：2001年迫使秘鲁总统藤森（Alberto Fujimori）下台的丑闻涉及一段录像，内容是国会议员收受以藤森总统名义提供的金钱，以换取在议会中的投票支持。

规制与补贴

与政治资金相关的各类规章制度与补贴并不罕见——其中许多都是因应丑闻的出现而产生的。表1总结了全球范围内各种与政治筹资相关的公共措施的普及情况。这些统计数据基于作者对世界各国地区国家的研究。为撰写

本文，本分析仅限于 2001 年由自由之家评为“自由”或“部分自由”的国家。表 2 则提供了 104 个国家的相关信息，显示它们是否有三种重要的法规和补贴：公开披露政治筹资的法规、直接公共补贴，以及提供免费政治广播。

对于美国读者而言，表 1 和表 2 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在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中，美国因没有为政党或候选人提供任何形式的免费政治广播而显得一枝独秀。大多数国家都提供此类免费广播，而那些不提供的国家通常要么是小国，要么十分贫弱。

第二点是，具有英语文化背景的国家，其政治筹资制度和选举制度往往与欧洲大陆国家以及受到欧洲大陆传统影响的国家（例如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有所不同。因此，属于英联邦（即前英国领地组成的联盟）的国家通常具有较少的公共资助以及较少的政治筹资监管。这些国家也更有可能采用多数选举制度，而公共资助则与比例代表制密切相关。

第三，在政治筹资规则方面，从前苏联集团中独立出来的国家，其规则与西欧大陆国家非常接近。

筹资表 1——104 个国家的监管与补贴

监管措施 / 补贴措施	百分比
任何形式的披露规定	62%
禁止外国捐款（部分或全部）	49%
任何形式的竞选支出上限	41%
披露个人捐赠者（部分或全部）	32%
任何形式的捐款限额	28%

禁止在电视上播放付费竞选广告	22%
禁止企业捐款（部分或全部）	16%
禁止企业捐款（完全禁止）	8%
免费政治广播	79%
直接公共资助	59%
实物补贴（不含政治广播）	49%
政治捐款的税收减免	18%

表2——三种竞选财务措施

国家（以斜体字显示的国家为“自由之家”未将其归类为选举民主的国家。）	直接公共资助？	披露法律？（星号表示个人捐款必须由政党披露）	免费电视时间？（星号表示禁止付费政治广告上电视）
阿尔巴尼亚	是	否	是
安提瓜和巴布达*	否	否	否
阿根廷	是	是*	是
亚美尼亚	是	是*	是
澳大利亚	是	是*	是
奥地利	是	是	是
阿塞拜疆	是	是	是
巴哈马	否	否	是
孟加拉国	否	是	否
巴巴多斯	否	是	否
比利时	是	是*	是*
伯利兹	否	否	是
玻利维亚	是	否	是
波黑*	是	是*	是
博茨瓦纳	否	是	是
巴西	是	是*	是*
保加利亚	是	是	是
加拿大	是	是*	是

智利	否	是	是
哥伦比亚	是	是 *	是
哥斯达黎加	是	是 *	是
克罗地亚	是	否	是
捷克	是	是 *	是 *
丹麦	是	是 *	是
多米尼克	否	否	否
多米尼加共和国	否	否	是
厄瓜多尔	是	是	否
萨尔瓦多	否	否	是
爱沙尼亚	是	是 *	是
斐济群岛	否	否	是
芬兰	是	否	是
法国	是	是 *	是 *
冈比亚	否	否	是
德国	是	是 *	是
加纳	否	否	是
希腊	是	是 *	是
格林纳达	否	否	否
危地马拉	是	否	是
圭亚那	否	否	否
洪都拉斯	是	否	是
匈牙利	是	是 *	是 *
印度	否	是	是
印尼	是	是	否
爱尔兰	是	是 *	是 *
以色列	是	是	是
意大利	是	是 *	是 *
牙买加	否	是	否
日本	是	是 *	是 *
基里巴斯	否	否	是
韩国	是	是	是

拉脱维亚	否	是 *	是
莱索托	是	是 *	是
立陶宛	是	是 *	是
马其顿	是	是	是
马拉维	是	否	是
马来西亚 *	否	否	否 *
马耳他	否	是	是
毛里求斯	否	是	否
墨西哥	是	是	是
摩尔多瓦	否	是 *	是
莫桑比克	是	否	是
纳米比亚	是	是	是
荷兰	是	是	是 *
新西兰	否	是 *	是
尼加拉瓜	是	是 *	是
尼日利亚	否	是	否
挪威	是	否	是 *
巴拿马	是	否	是
巴布亚新几内亚	是	是 *	否
巴拉圭	否	否	是
秘鲁	否	是	是
菲律宾	否	是 *	是
波兰	是	是 *	是
葡萄牙	是	是	是 *
罗马尼亚	是	是 *	是
俄罗斯	是	是 *	是
圣基茨和尼维斯	否	否	否
圣卢西亚	否	否	是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否	否	否
萨摩亚	否	否	是
塞内加尔	否	否	是 *
塞舌尔	是	否	是 *

新加坡 *	否	否	否
斯洛伐克	是	是 *	是
南非	是	否	是
西班牙	是	是	是
斯里兰卡	是	否	是
瑞典	是	否	是
瑞士	否	否	是 *
台湾（中华民国）	否	是	是
坦桑尼亚 *	是	是 *	否
泰国	是	是 *	是
汤加 *	否	否	否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否	是	是
土耳其	是	否	是 *
图瓦卢	否	否	否
乌干达	是	否	是
乌克兰	否	是 *	是
英国	是	是 *	是 *
美国	否	是 *	否
乌拉圭	是	否	是
瓦努阿图	否	否	是
委内瑞拉	否	否	否
赞比亚	否	否	否

注：表 1 不包含限制购买选票的法律以及候选人财产申报的规定，尽管这两者都相当重要。统计数据基于表 2 中列出的 104 个国家的信息，但竞选开支上限 (N=103)、税收减免 (N=103)、公开披露规定 (N=114) 以及直接公共资助 (N=143) 除外。

表 2 仅包含自由之家在其 2001 年末发布的报告中评为“自由”或“部分自由”的国家，这是本文写作时可获得的最新报告。这些国家的总数为 143 个。关于自由之家的图表，可参见 Adrian Karatnycky：《2001 年自由之家调查：穆斯林国家与民主落差》（刊载于《民主杂志》2002 年 1 月号，第 13 卷，108–109 页）。这些统计数据指的是 2000–2002 年间不同时间点上有效的法律，未能完全反映该期间发生的所有变化。关于公开披露规定的数据来自《金钱与政治手册：提高新兴民主国家透明度指南》（华盛顿特区：民主与治理办公室，技术出版系列，2002）。其他

来源包括：迈克尔·平托-杜辛斯基：《政党与竞选活动经费手册：概述》（斯德哥尔摩：国际理念组织，2001年，145–165页）；詹尼伊克斯顿、丹尼尔斯米洛夫、玛辛瓦勒基，《中东欧竞选财务》（华盛顿特区：国际选举基金会，2002——为2001年报告的修订版，可于http://www.ifes.org/reg_activities/pdf/ACEEEO-campaign-finance-01-31.pdf获取）；迈克尔·平托-杜辛斯基：《英联邦的政治资助》（伦敦：英联邦秘书处，2001）；以及作者本人收集的信息。另见注8。

由于公共资助是最常论及的措施之一，它值得特别关注。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大量国家开始向政党的议会外组织以及个人候选人提供公共补贴。虽然也有一些国家（例如1990年代的意大利和委内瑞拉）曾试图限制或废除现有补贴，但总体趋势显然是朝国家补贴的方向发展。我本人对自由之家最新评级中被列为“自由”或“部分自由”的143个国家（这一样本范围比表2所列国家更广）进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有84个国家（占59%）制定了有关向政党或候选人提供直接公共资金的法律。⁸其他发现还包括：国家援助（以及其他类别的法规和补贴）在人口非常少的主权国家中几乎不存在，⁹并且，在大多数国家，国家援助在政治阶层中广受欢迎，却深受选民反感。国家援助在西欧以及前苏联集团中脱离出来的国家特别常见，在亚洲、加勒比地区和太平洋地区则较为少见。¹⁰

国家援助的金额以及从这一来源获得的政治筹资比例差异极大。在某些非洲国家，财政拮据的政府尽管法律上有所规定，却取消了公共资助。关于政党和选举活动总支出中来自国家援助的占比，目前只有部分国家有完整资料。据卡尔—海因茨·纳斯马赫（Karl-Heinz Nassmacher）估计，在13个相对富裕国家中，来自公共补贴的总支出比例差异巨大：最低的是英国的2%和美国的3%，最高的是奥地利的68%。介于两者之间的国家数据包括：意大利4%；加拿大6%；澳大利亚12%；荷兰16%；西班牙43%；日本47%；德国54%；法国56%；以色列56%；瑞典65%。¹¹在

这 13 个国家中，公共资金平均提供了政党与竞选总支出的不到三分之一。在东欧和中欧曾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中，如果这些国家向政党或公职候选人提供直接公共补贴，其情况大体相似，其中保加利亚、立陶宛和俄罗斯等国提供的国家援助金额只是象征性的。¹²

选举政治中的公共补贴似乎既未产生支持者所承诺的好处，也没有出现批评者所担心的弊端。一方面，公共补贴显然没有解决腐败政治资金的问题。一些最严重的政治丑闻发生在那些公共补贴最为慷慨的国家，如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一个获得公共资金的政党或候选人，清楚地知道这样的资金对竞争者同样可用，因此不会停止寻找更多资金，以便在支出上超越并在策略上压倒政治对手。

另一方面，一些批评者担心，公共资助会减少政党吸收新成员及向现有党员筹款的动力，从而导致政党衰落，但这种担心似乎并没有得到证实。¹³

现代公共资助法律的现象很容易被误读。此类法律既不是公共资源流入选举活动和政党金库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它们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如前所述，法律规定的补贴金额可能微不足道，甚至根本不存在；它们不是必要条件，因为过去及现在仍有许多其他方式能将公共资金导入政治活动。

首先，在相当数量的一些国家，总统或总理掌握着可以用于任何目的的秘密“灰色基金”。19 世纪时，英国首相就拥有一个“特勤基金”，按照惯例，此基金用于补贴其支持者的政治竞选活动。德意志帝国时期，首相俾斯麦 (Otto von Bismarck) 的“爬虫基金”具有类似用途；英国与德国的主要差

别在于，英国在 1880 年代废除了这一特勤基金，而德国的首相们一直使用类似基金直到二战之后。在赞比亚以及迄今的法国，此类资金在政治中都发挥过关键作用。赞比亚的案例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该国没有向政党或候选人提供直接公共资助，却以总统自由支配基金作为替代手段来资助执政党。

其次，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公共资金被分配给国会议员，名义上用于推动其选区的发展项目；但在实践中，这笔钱非常容易变成竞选资源。

第三，在许多国家和政党中，受薪的公职人员被要求将其薪资的一定比例捐给政党。这类“政党税”可以在账面上被记为党费或捐款，但本质上，它们构成一种间接的公共筹资。

第四，为竞选目的而动用国家资源，也构成一种间接的公共补贴。在包括津巴布韦在内的若干非洲国家，一个典型做法是利用国家拥有的车辆运送选民参加执政党集会，并在投票日运送他们前往投票站。另一种由来已久的方式，是利用公职任命的好处，将政党支持者安置在政府薪资体系中。这些表面上是公务员的人员，实际上肩负将大量时间投入政治拉票的工作。第三种公共资源挪用机会同样普遍，出现在大多数民主国家，即立法机构成员可获取的愈加慷慨的资源，例如用于雇用研究助理、秘书的公共资金，以及免费办公室与差旅津贴。现任议员至少部分地将这些津贴用于竞选，这几乎不足为奇。

对公共筹资的全面探讨还必须包括实物补贴。在一些国家，最重要的实物补贴形式是向政党及其候选人提供免费的广播和电视时间。

由此得出的总体结论是：第一，向政党和候选人提供来自公共财政的直接资金补贴已经成为常态。第二，不同国家所提供的公共资助金额差异极大，有时微不足道。第三，由于公共资助不仅限于直接补贴，还包括其他类型的公共资源，因此无法确定实际公共资助的规模与比例究竟是在增加、持平还是减少。第四，公共筹资的影响似乎比支持者或批评者原先预期的都要小。

法规多多，执行寥寥

有法可依是一回事，是否有法必依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那些调查政治筹资的人收到的警示都是：法律形同虚设，或是被公开违反。确保法规切实有效的难度，可通过最基本的规则来体现：即那些有关公开披露的规定。正如表 1 所示，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项大型研究，在有案可查的 114 个国家中，62% 的国家有法规要求公开披露至少部分政党或候选人的财务账目。然而，研究政治筹资的学者在描述这些规则的无效性时，几乎已将所有贬义词用尽。据法国国民议会的一位专家称：“政党财务在官方账目中公布的统计数据——在法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纯属虚构。”在意大利，诚实的披露“几乎从未发生”。在日本，公布的账目“只是冰山一角”。韩国亦然，政党提交的例行运作与竞选经费的报告“也只是冰山一角”。在台湾，“当许多捐款可能以现金形式进行时，监督尤其困难”。在英国，就议会候选人在竞选中申报的支出而言，“某些个案中的滥用规模令人咋舌”。在美国，有关政治捐款的披露规则“简直是个笑话”。¹⁴

除了因缺乏执行意愿而导致依法披露被忽视之外，此类法规还经常被规避，

因为它们通常只适用于有限范围的政治支付。要使财务披露真正有效，法规的适用范围必须非常广泛。这包括要求披露：1) 初选及其他重要的党内候选人提名活动的财务；2) 个别候选人参与公共职务选举的竞选经费；3) 政党在全国及地方组织的例行（非竞选）预算；4) 个别政治人物的私人政治基金；5) 参与政治竞选活动的利益团体（常被称为“第三方”）的资金；6) 公投活动的经费。甚至有观点主张应将监管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党派报纸、宗教组织的政治活动，甚至政治相关诉讼的资金来源。

但是否实际有可能将所有这些活动纳入政治资金披露规则，实属值得怀疑。改革者所面临的两难在于：若仅有少数政治支付渠道受披露规则约束，那么那些希望通过秘密资金施加影响的人自然会转向那些未受监管的渠道。另一个问题则是政党捐赠伪装成贷款、志愿服务、商业交易或其他形式。卡尔·海因茨·纳斯马赫总结了西方国家政治筹资改革者所面对的普遍困难：

“近二十年的政治实践……再次凸显宪制改革措施的普遍悖论。改革立法的实施会催生更多（且更复杂的）改革立法的需求。……为控制资金流入政治过程而设计的繁复制约，反而激励职业政治家积极寻找现行法律在适用上，或在修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漏洞。”¹⁵

支持这一观察的实例是，多个国家（包括法国、美国、意大利和德国）不断出现“一轮又一轮改革”。政治筹资法规和补贴的理想范围注定将仍是见仁见智的话题。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法律过于频繁地只表达目标（例如政治捐赠透明化），却未足够详细地规划如何落实这些目标。简言之，法规多多，执行寥寥。

真切可辨的趋势

对法律补救措施的探索，不仅是对丑闻的回应，也源于一系列广泛存在、但未经证实的关于政治生活筹资总体趋势的假设。例如，许多评论家认为，世界大部分地区政治成本上升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并认为形成这一上升趋势的原因，是电视和其他大众媒体作为现代竞选主要形式的发展。政治支出上的所谓“军备竞赛”，被推定为政治筹资腐败的主要原因。然而，似乎很少有系统性研究来验证政治成本是否真的在上升。¹⁶一些初步的警示性思考是必要的。

首先，是大众媒体广告成本的问题。电视及其他媒体在世界许多地区的现代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即便在电视机普及率最高的国家（如美国），电视政治广告的重要性也很容易被夸大。诚然，电视在美国总统大选及其他主要公职选举的竞选活动中至关重要。但也有成千上万的次要职位的选举中，电视几乎或根本不起作用。对 1988 年美国总统选举年度的标准研究发现：电视占所有公职选举竞选总支出的不到十分之一：

根据 1987 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美国共有 504,404 个由公众选举产生的职位……但这些职位的候选人大多从不购买电视广告时间，甚至从未接近过电视摄像机。通常，只有竞选主要职位（总统、参议员、州长）的严肃候选人才大量使用电视广告。可能只有约一半的众议院候选人会购买电视时段，而其费用通常仅占其竞选支出的很小部分。¹⁷

在其他经济发达国家中，电视在政治支出中所占比例可能比美国更低。这

部分是因为政党与候选人能够获得免费的广告时段；部分原因是一些国家（如英国）禁止在电视上播放付费政治广告；还有部分原因是相当大比例的政治支出用于支付政党的全国及地方办事处及工作人员。

第二，电视尚未统治世界。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区，城市以外的地方很难找到电视机，甚至收音机。在加纳、肯尼亚和孟加拉国等国家，政治集会仍是候选人接触选民的最佳方式。因此，购买车辆与电子扩音设备反而成为主要开支。

第三，新式政治，亦即强调大众媒体、专业形象塑造与民意调查，其成本并非明显高于旧式政治。老派的竞选方式围绕够买选票、送礼，以及以大量人力接触个别选民等技术运作，而这些往往极其破费。事实上，来自多个国家的证据表明，老式政治中那些历史悠久的技法，其实比彻底现代化、以媒体为导向的竞选方式成本更高。

证据似乎指向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老式的、面对面的政治动员，其成本高于新式的、大众营销与侧重媒体的方式

虽然目前掌握的证据带有一定印象性，但这些证据似乎确实指向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老式的、面对面的政治动员，其成本高于新式的、大众营销与侧重媒体的方式。如果再考虑到不同国家人均收入的差异，这一点就更加明显。阿诺德·J·海登

海默（Arnold J. Heidenheimer）发现，在1960—61年间，菲律宾每张选票的支出（相对于平均产业工资而言）是美国的14倍。1996年，在选票买卖盛行的泰国，其人均选举成本（按平均收入比例计算）据报比美国高4到5倍。对乌干达、安提瓜和巴布达的研究，以及我自己对肯尼亚立法者的非正式访谈，都表明传统的恩庇式政治造成的财政负担远比电视为基础

的竞选方式大得多。在 1999 年安提瓜和巴布达的选举中，“大量发放进口火腿、火鸡和其他赠品”的做法，使得每票成本至少达到 60 美元（据执政党安提瓜工党的估计），甚至可能高达 300 美元（反对党的估计）。考虑到收入水平差异，这场选举的人均成本比美国 1996 年举行的所有选举——州、地方与联邦选举——都高出 9 到 44 倍。¹⁸

如果老式的恩庇政治比新媒体政治更昂贵，那么人们可能会预期，在仍以旧政治为常态的国家，支出水平应当保持稳定；而在发展出新政治的国家，支出水平应当下降。然而，根据多个针对具体国家的研究，即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近几十年来的成本仍有所上升。如何调和这些看似矛盾的发现？

对此有几种可能的解释，但必须强调，这些解释在现阶段仅属推测。首先，选民群体扩大了，妇女与年轻人获得选举权，人口也在增长。选民数量因此而增多了。因此，有必要计算每位选民的成本，而不是仅看总成本。

其次，研究往往过度集中于经济发达国家的全国性竞选成本。但孤立地考虑这些全国大选是错误的。在从传统的挨家挨户动员转向基于全国广告与现代大众营销技术的过程中，支出可能从地方党组织转移到全国党组织。这种情况很可能已在英国发生。因此，研究政治支出的趋势，必须考虑所有层级的竞选总成本，而不仅仅是全国一级。

第三，存在一个技术性的但又是关键性的问题：衡量政治支出长期趋势时应采用哪一种通胀指数。一个常见错误是采用零售物价指数或其他生活成本指数。但这些指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大多数国家，平均收入的增长快于生活成本。由于政党组织运作与竞选活动都高度依赖人力，从政

治筹资角度看，更相关的通胀指标应当是人均收入，而不是生活成本指数。

经过这些调整，“政治成本普遍上升”的情形就不那么清晰了。根据最近对美国的一项学术研究，“与改革者及媒体的说法相反，竞选开支近年来并未爆炸式增长……竞选支出并未比国家收入增长得更快。总统选举年的总竞选开支徘徊在 GDP 的千分之一左右。这种关系……自 1912 年以来保持相对稳定。”¹⁹

总而言之，掌握的证据过少，无法支持这样一种普遍观点：即竞选成本显著上升，且这一上升是导致政治筹资腐败的主要原因。

汲取教训

从上述考察中可以得出几点结论。第一，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而言，这是一个教训。这些机构在反腐败的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却一直不愿涉足政治筹资这片荆棘之地。政治筹资与政治腐败之间的联系如此普遍、如此重要，如果这些机构对政治资金问题视而不见，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打击腐败。

第二，上述经验也给改革者一个教训：不要假定政治筹资问题可以通过简单的立法办法来解决，因为这种想当然是危险的。改革应当更加重视少数关键法律的有效执行（例如关于信息公开的法律），而不是不断制定一大堆却形同虚设的新规则。

第三，虽然篇幅所限，我无法充分展开，但不得不说：在政治筹资改革领域，

“公共利益”游说团体和“公民社会”组织的价值常常被高估。除少数可敬的例外，这些团体往往只是小规模的精英，更擅长吹嘘自己、夸大其代表公众的合法性、以及通过各种资助来充实自己的口袋，而不是作为有效的变革推动者。他们往往倾向于倡导简单化的国际规范和简单粗暴的解决措施。

第四，非常迫切地需要由学者、记者还有——同样重要的——政治家们，对政治筹资的实际情况展开调查。这一点尤其适用于许多发展中民主国家，其中许多国家对政治筹资的研究仍处于萌芽阶段。这样的调查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好奇心（尽管这本身也很重要）。在举行竞争性选举、并存在组织化政党的政治体制中，各类滥用行为往往具有高度的发生可能性。正是在这种制度背景下，细致而持续的审查，才为遏制此类滥用行为的努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注释

1 “Planters”指农场主；“bumbo”是一种朗姆酒潘趣酒。我感谢 Phil Costopoulos 提醒我，乔治·华盛顿正是这种“款待式拉票”的主要实践者之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的文稿中，有他在 1758 年 7 月首次参加政治选举——竞选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议员——时，为竞选用途购买朗姆酒的收据：160 加仑，用来招待 391 名选民。

2 所谓“克罗地亚民盟式的敲诈体系”，参见（“Constitution Watch: Croatia,”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10 (Spring-Summer 2001): 12–13.)

3 皮拉尔·德尔·卡斯蒂略：《西班牙政党筹资中的问题》(Pilar del Castillo, “Problems in the Financing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Spain”, in Herbert E. Alexander and Rei Shiratori, eds., *Political Finance among the Democracies* (Boulder, Colo.:Westview, 1994), 100.)

4 弗洛拉·恩库鲁肯达：《地方选举的管理》(Flora Nkurukenda, “Administration of Local Elections”, in *Report of the Inaugural Meeting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Association of African Election Authorities* , Accra, Ghana: Association of African Election Authorities, 1998 , 55–56.)

- 5 穆罕默德·Y·阿赫特：《孟加拉国的选举腐败》（Muhammed Y. Akhter, *Electoral Corruption in Bangladesh*,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2001, 22–23.）
- 6 道格拉斯·W·佩恩：《1996 年苏里南选举：选后报告》（Douglas W. Payne, “The 1996 Suriname Elections: Post-Election Repor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Western Hemisphere Election Study Series* 14, Study 4, September 1996.）
- 7 利曼努·阿诺松：《泰国》（Limmanu Anosorn, “Thailand,” in Wolfgang Sachsenröder and Ulrike E. Frings, eds., *Political Party System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Volume 1: South-East Asia*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1998), 437）
- 8 我们已收集关于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 2001 年评为“自由”（Free）或“部分自由”（Partly Free）的全部 143 个国家中，是否存在直接公共资助制度的信息。除了表 2 中列出的国家外，其他拥有直接公共资助的国家包括：安道尔*、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塞浦路斯（希腊区）、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加蓬、格鲁吉亚、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里、摩纳哥*、蒙古、摩洛哥、尼日尔、圣马力诺、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无公共资助的国家包括：中非共和国、科摩罗、刚果（布）、科特迪瓦、东帝汶、几内亚比绍、冰岛、约旦、科威特、马达加斯加、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瑙鲁、尼泊尔、帕劳、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拉利昂、所罗门群岛、苏里南* 和多哥。在本注释中，星号表示相关信息由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研究所（IDEA）的 Lotta Lann 收集。
- 9 在 143 个“自由”和“部分自由”的国家中，人口少于 100 万的国家中有 26% 设有直接公共资助；人口超过 100 万的国家中这一比例为 69%。
- 10 在 143 个“自由”和“部分自由”的国家中，不同地区采用直接公共资助的比例如下：西欧 87.5%；前共产国家 86%；美洲 76%；非洲 50%；亚洲 47%；大洋洲 14%；加勒比地区 8%。
- 11 卡尔·海因茨·纳斯马赫：《西方民主国家政党活动的成本》（Karl-Heinz Nassmacher, “Die Kosten der Parteitätigkeit in westlichen Demokratien,”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wissenschaft* 31 (2002): 16.）
- 12 关于保加利亚与俄罗斯：参见《中东欧政治资金：一份中期报告》（Janis Ikstens, Michael Pinto-Duschinsky, Daniel Smilov, and Marcin Walecki, “Political Finance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An Interim Report,”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wissenschaft* 31 (2002): 34.）
- 13 乔恩·皮埃尔、拉尔斯·斯瓦桑德、安德斯·维德费尔特：《国家对政党的补贴：让修辞面对现实》（Jon Pierre, Lars Svasand, and Anders Widfeldt, “State Subsidies to Political Parties: Confronting Rhetoric with Reality,”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3 (2000): 1–24.）
- 14 迈克尔·平托-杜辛斯基：《政党与竞选经费手册：概述》（Michael Pinto-Duschinsky, *Handbook on Funding of Parties and Election Campaigns: Overview*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2001),

14—15.)

- 15 卡尔·海因茨·纳斯马赫：《比较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与竞选资金》（Karl-Heinz Nassmacher, “Comparing Party and Campaign Financ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in Arthur B. Gunlicks, ed., *Campaign and Party Finance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2), 260.)
- 16 参见希尔特鲁德纳斯马赫、卡尔·海因茨纳斯马赫：《政治资金制度的主要影响》（Hiltrud Nassmacher and Karl-Heinz Nassmacher, “Major Impacts of Political Finance Regimes,” in Karl-Heinz Nassmacher, ed., *Foundations for Democracy: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Political Finance—Essays in Honour of Herbert E. Alexander* (Baden-Baden and Washington, D.C.: Nomo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lection Systems, 2001), 182 ff.)
- 17 赫伯特·E·亚历山大、莫妮卡·鲍尔：《1988年选举的资金筹措》（Herbert E. Alexander and Monica Bauer, *Financing the 1988 Election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1), 98.)
- 18 梅丽莎·托马斯、乔尔·巴坎：《非洲的腐败与政治资金》（Melissa Thomas and Joel Barkan,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Finance in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8).)；另参见道格拉斯·W·佩恩，《安提瓜和巴布达的治理失败：1999年选举》（Douglas W. Payne, *The Failings of Governance in Antigua and Barbuda: The Elections of 1999*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9).)
- 19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府研究所于2002年4月8日为斯蒂芬·安萨拉贝黑、亚兰·格贝尔、詹姆斯·M·小斯奈德准备的宣传摘要，此摘要与其论文《腐败与竞选开支增长》（Stephen Ansolabehere, Alan Gerber, and James M. Snyder, Jr., “Corruption and the Growth of Campaign Spending,” in Gerald Lubenow, ed., *A User's Guide to Campaign Finance Refor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ch. 2.)

读书

李聿脩

作者李聿脩为旅居伦敦的中国政治学者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1期

2026年0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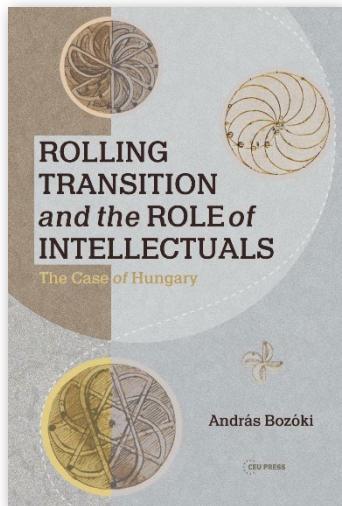
社会运动与知识分子互相创造

评博佐基《匈牙利滚动式转型与知识分子角色》

题记：“社运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由耶鲁大学社会学家罗纳德·埃尔曼 (Ronald Eyerman) 提出，原指在社会运动中成长并起来推动社会运动发展的知识分子。但事实上，社运知识分子也可能先于社会运动，也就是说不一定先有社会运动才有社运知识分子。

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里讲，18 世纪中叶，法国文人政治盛极一时。其典型做法是将公共政治讨论包装成“哲学”输入到文学写作中，用以引导社会舆论。其结果是文人实质上承担着主要政治家的角色，包括贵族在内，没人有能力挑战当时文人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最终这些被包装成“哲学”的新思想、新观念，成了引发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诱因之一。¹

关于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承担的角色，普罗大众往往估计不足。随着反智主义情绪高涨，普罗大众反而鄙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站在执政者角度来看，其看法却与反智主义观念截然相反，因为知识分子确实可能领导社会变革。正因如此，专制政权往往才不惜一切代价打压知识分子，包括诱导普罗大众莫名仇恨知识分子。



Rolling Transition and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by András Bozóki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22

由知识分子领导的社会变革，较近的案例莫过于东欧剧变，尤其以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最为突出。1977 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七七

宪章》签署者团体中，作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无疑是其中思想领袖，后来不但领导了天鹅绒革命，还当选首任捷克总统。《七七宪章》的影响力还跨越国界，引起波兰和匈牙利知识界积极响应（后来中国的《零八宪章》也受此启发）。

1976年波兰知识分子成立了“保卫工人委员会”，其骨干成员包括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和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ń，后在新政府任劳工和社会政策部部长）等人，后来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团结运动”（此为推动波兰民主转型的决定性运动）。1977-1981年间，波兰知识分子团体自发复兴了该国19世纪末“飞行大学”传统，以“科学讲座协会”（Towarzystwo Kursów Naukowych）名义展开秘密结社活动（后来也汇入到“团结运动”）。其杰出成员除前面提到的两位，还包括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Bronisław Geremek，后在新政府任外交部长）、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Władysław Bartoszewski，后在新政府任驻奥地利大使和外交部长）和安德烈·切林斯基（Andrzej Celiński，后在新政府任文化部长）等等，这些还不包括后来跟米奇尼克一样淡出政治的其他重要活动家。可以说波兰知识界为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贡献了巨大的才智力量，其规模和程度恐怕连匈牙利也难与之匹敌。

匈牙利也主要由知识分子推动民主转型，其形式相当与众不同。匈牙利政治社会学家博佐基·安德拉什（Bozóki András）在2022年出版的《匈牙利滚动式转型与知识分子角色》一书中，将匈牙利民主转型分为五个时期：异议时期（1977-1987）、公开网络建设时期（1988）、圆桌谈判时期（1989）、议会政治时期（1990-1991）和新民主运动时期（1991-1994）。其中该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呈现打车轮战式滚动参与：如从异议时期

算起，每个转型期都有大约 3/4 的知识分子被新加入的知识分子替换掉，剩余约 1/4 又进入下一转型期继续领导社会转型；主要参与者和最活跃成员像轮班或打车轮战一样，轮番参与政治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匈牙利社运知识分子自身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成长历程：异议人士阶段、职业化阶段和建立新政权以后的新政治运动阶段。²

博佐基认为中欧国家批判型知识分子，在推动前共产政权更迭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他们使共产主义政治体制失去了合法性，是他们形成了新的政治语言、创造了新的政治机遇，以及定义了冷战后新民主政治的全新特点。博佐基说的情况，特指“社会运动知识分子”，与已经取得一定社会地位的“体制化知识分子”相区别。二者比较关键的差别包括：体制化知识分子可能是诱发社会运动的重要力量，可以说主要负责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社运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运动激进化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才是社会运动主要组织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其主要角色是将社会问题政治化，以及推动社会来解决问题。但社会运动产生的新知识主要来自于社运知识分子，这种新知识也可能在社运知识分子和体制化知识分子之间造成紧张关系，尽管这两类知识分子也可能在社会活动中合作。³

根据博佐基的说法，米奇尼克和哈维尔显然是社运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不但在社会运动中承担了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生产，还树立了新的道德权威，尤其对其他社运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匈牙利知识分子群体存在较大分化，缺少跟米奇尼克和哈维尔相提并论的最突出代表，但仍然呈现出鲜明的群体性特点。1970 年代以前，匈牙利就形成都市派和民粹派两大反对派团体（这一分化也延续到往后反对运动中）：都市派知识分子主要由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Lukács György）的学生圈子

和一些作家组成，比较突出的代表有哲学家基石·亚诺什（Kis János）和作家哈拉兹第·密克罗什（Haraszti Miklós）——作家康拉德·哲尔吉（Konrád György）是社运知识分子最重要代表之一，广义上也属于这个圈子；民粹派则包括作家丘尔卡·伊斯特万（Csurka István）和诗人乔里·山多尔（Csoóri Sándor）等人。⁴ 从这些构成可以看出，文人和思想家是匈牙利社会运动主体。

事实也确实如此。根据博佐基和西蒙·阿格尼斯（Simon Agnes）的统计，1977-1994 年间，最活跃的社运知识分子占比最高的前十种职业分别是：文人（13.61%）、艺术家（13.43%）、记者（12.65%）、经济学家（7.17%）、历史学家（6.14%）、教师（6.02%）、社会学家（5.96%）、工程师（5.66%）、律师（5.54%）、大学生（4.94%）。从中可以看出，文人和人文社科类从业人员参与社会运动的热忱明显高于理工类。其中核心社运知识分子（即充当领导者角色、长期活跃以及主要影响力者）占比最高的前五种职业包括：文人（35%）、哲学家（15%）、社会学家（12.5%）、经济学家（10%）、工程师（7.5%）。依然是文人和人文社科占比最高。⁵

博佐基（和西蒙）并未解释这种比例构成的成因，但我们可以想象：思想最活跃和最善于表达的群体更倾向组织、参加和推动社会运动。这一点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可以得到验证。1976 年米奇尼克重新反思波兰知识分子与天主教会矛盾来龙去脉，从中发现了知识界和天主教会可以寻求合作的契机，为将来的反对联盟跨出了关键性一步，可以说是引导波兰走向社会团结的第一步。⁶ 哈维尔的名言“生活在真实中”则更加家喻户晓，几乎可以说树立了一种普遍的反抗信念。

但博佐基也指出，匈牙利产生社运知识分子跟该国自身环境独特性有关。1996年美国社会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还列举了知识分子可能反对、乃至反抗政权的八项条件，包括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组织化和政治化程度、知识分子阶层相对独立性、政权压迫性相对较低、统治集团内部分化（或自我削弱）、国家失能、历史上有反权威的文化传统等等。⁷比如东德和罗马尼亚就出现了有社会运动，但知识分子缺席的奇怪现象。⁸

就东德的情况而言，知识分子缺席跟政权压迫性没有多大相关性（反而是一般社运人士带头克服恐惧心理）。东德政权压迫程度跟波兰比并不见得严重多少，而且两国都有教会做中间人调停政府与社会冲突（尽管有人喜欢夸大教会实际影响力，忽视教会在社会上感受到的敌意和孤立）。⁹但东德知识分子为什么缺席呢？这恐怕跟该国知识分子群体自身孱弱有关系。

“社运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由耶鲁大学社会学家罗纳德·埃尔曼（Ronald Eyerman）提出，原指在社会运动中成长并起来推动社会运动发展的知识分子。¹⁰但事实上，后来很多研究证明社运知识分子也可能先于社会运动，也就是说不一定先有社会运动才有社运知识分子。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在美国传播甘地思想的霍华德·瑟曼牧师（Howard Thurman）、社会活动家贝雅得·拉斯丁（Bayard Rustin）和詹姆士·劳森牧师（James Lawson），正是他们的思想传播工作引发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 [后来他们也跟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一起领导这场运动]。¹¹可见社运知识分子形成思想传播者角色也可能先于社会运动。

博佐基的研究给中国读者带来了新的展望，也鼓励中国知识分子主动去探索新的知识生产和思想生产角色。不见得是社会运动创造这种新角色，也

可能是这种新角色创造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政治高压事实上并不能囚禁思想探索，也不能阻止社会自发寻求出路。如果有人觉得想一些前人之所未想之事也有一种遭人围追堵截的压迫感，不妨先想一想是不是自己给自己画地为牢了。

社运知识分子这一角色在中国至今缺席。一个尚未产生的新事物并不能证明其不可能产生，最多只能说明中国知识分子被想象中的“封控政策”画地为牢。如果知识分子像 2022 年底突破防疫封控政策那样，主动克服自身恐惧心理，主动去成为社会变革引领者，届时我们会发现，所谓政治高压也不过如此，说来说去也就是各人自己给自己画地为牢。

注释

- 1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Ancien Ré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27-30, 15-6.
- 2 András Bozóki, *Rolling Transition and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The Case of Hungary, 1977–1994*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22), 11, 524-6, 8. 注意：匈牙利人一般姓氏在前、名字在后（同中国和日本姓名习惯），英语出版物按英语国家习惯调整了姓名顺序；中文译名则一般尊重匈牙利习惯，将匈牙利原名“Bozóki András”译为博佐基·安德拉什，其中博佐基为姓氏。
- 3 Ibid., 60-1, 50-2.
- 4 Máté Szabó, “Hungary,” in *Dissent and Opposition in 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Origins of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ed. Detlef Pollack and Jan Wielgohs (Ashgate, 2004), 51-71.
- 5 András Bozóki, *Rolling Transition and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490. 有关“文人”这种说法，原文用词是“litterateur”。在英语中，“litterateur”这种说法，对应法语的“littérateur”和“gens de lettres”，以及拉丁语的“litterātor”（单数 litterātus），跟中文的“文人”最接近。除作家之外，文化修养高的群体也可以被称为“文人”。“litterateur”这个词虽然来自拉丁语“litterātor”（指教读写和文法的教师），但其在英文读者群体中已经偏离了“litterātor”这种用法（法语也偏离了这个词的拉丁语原意），其对应的意义是“litterātus”（也即文人）。
- 6 Adam Michnik, *The Church and the Left*, trans. David Os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 7 Jerome Karabel, "Toward a Theory of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Theory and Society* 25, no. 2 (1996): 205–33.
- 8 Helena Flam, "Dissenting Intellectuals and Plain Dissenters: The Cases of Poland and East Germany," in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Europe*, ed. András Bozóki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41; Irina Culic, "The Strategies of Intellectuals: Romania under Communist Rul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Europe*, ed. András Bozóki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43–71; Alina Mungiu-Pippidi, "Romanian Political Intellectual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in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Europe*, ed. András Bozóki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73–99.
- 9 有关东德相对宽容的社会环境及其教会角色参考: Werner Volkmer, "East Germany: Dissenting Views during the Last Decade," in *Oppo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ed. Rudolf L. Tökés (Palgrave Macmillan, 1979), 113–41; Andreas Glaeser, *Political Epistemics: The Secret Police, the Opposition, and the End of East German Social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 10 Ronald Eyerman, *Between Culture and Politics: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Society* (Polity, 1994).
- 11 Sean Chabot, "Framing, Transnational Diffusion, and African-American Intellectuals in the Land of Gandhi," in *Popular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 Movements: Framing Protest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9–40.

简记

弥正平

作者弥正平为中国留美学生、青年社会运动活动者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1期

2026年0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全球民主人权事件

1、澳门举行立法会选举，中间派议员被取消资格

2025年9月14日，澳门举行了新一届立法会选举。立法会共设33个议席，其中14席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其余议席通过界别间接选举或由行政长官委任。

官方数据显示，超过17.5万名选民参与直接选举，为主权移交以来投票人数最多的一次。为吸引投票，当局采取了提供免费巴士等多项措施。尽管投票人数创下新高，但整体投票率约为53%，为1999年主权移交以来第三低。同时，空白票与无效票数量亦受到关注，合计超过1.3万张。

这是2024年修订选举法后，被澳门政府视为体现“爱国者治澳”原则的首次立法会选举。修订后的选举法规定，候选人资格需经“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以确认其拥护基本法及澳门特别行政区。

在选举前，澳门选举管理委员会于7月15日宣布，12名候选人被裁定不符合资格，无法参加直接选举。根据法律，被取消资格的候选人不得就该决定提出上诉。四年前，澳门选管会曾“DQ”（取消参选资格）了21人，清除了所有民主派候选人。此次被裁定未能通过国安审查的12人中，包括唯一中间派、现任立法会议员林宇滔。

林宇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是通过新闻报道才得知被取消资格的，并称这让其感到意外。与他同属一份参选名单的，还有多名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士，包括曾从事新闻工作的协会成员、前职业运动员及环保组织负责人等。

舆论分析认为，澳门选管会的决定源自政治气候的变化，符合港澳两地收窄异见声音的政治轨迹：先除掉“激进”的民主派，再到温和中间的声音，未来或到建制较开明的一派。

2、叙利亚举行推翻阿萨德政权后首次议会选举

在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ssad）政权垮台近1年后，叙利亚于2025年10月5日举行了首次议会选举。这次选举被视为经历十多年来内战后该国政治过渡的重要事件。选举产生的人民议会（People's Assembly）将制定新选举法和宪法。

但选举过程被舆论认为是非民主的，因为改组后的议会共210个议席，由全国60个选区共7000名选举团（electoral college）成员投票产生三分之二席，其余三分之一将由该国临时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Ahmed al-Sharaa）直接任命。批评者认为，这很可能将权力重新集中在叙利亚新统治者手中，而不是为真正的民主转型奠定基础。

部分地区选举因安全和政治原因被推迟，包括斯韦达省以及库尔德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区。与阿萨德时期相比，选举参与者感受到更大的自由。

少数群体在选举前态度谨慎。部分阿拉维派、德鲁兹（Druze）及基督徒候选人担心参选会带来安全风险。塔尔图斯（Tartous）省的阿拉维派候选人海达尔·沙欣（Haydar Shaheen）在选举前被暗杀，增加了他们的顾虑。但仍有一些少数群体选择参选，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推动国家重建。计票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女性和少数族裔当选比例有限。在119名获胜候选人中，

仅 6 人为女性，10 人为宗教少数派群体。

3、孟加拉国前总理因镇压学生运动被判死刑

11 月 17 日，孟加拉国前总理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在缺席情况下，被位于首都达卡的刑事法庭判处死刑。法庭裁定哈西娜 2024 年下令对一场由学生主导的反政府抗议实施血腥镇压构成了严重犯罪。这一裁决被认为 是孟加拉国历史上对一名前国家领导人做出的最严厉判决。

现年 78 岁的哈西娜被认定在抗议期间犯有煽动、下令杀人以及未能阻止政府暴行等多项罪名。同一案件中，前内政部长阿萨杜扎曼·汗·卡马尔（Asaduzzaman Khan Kamal）也被判处死刑。两人均于 2024 年 8 月在反政府抗议达到高潮时逃往邻国印度，本案判决均为缺席判决。

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领导的临时政府对裁决表示欢迎，称其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判决。判决作出后，孟加拉国外交部呼吁印度引渡哈西娜及阿萨杜扎曼·汗·卡马尔，称两人已被本国法院定罪。印度方面回应称已注意到该裁决，并表示为了孟加拉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愿意“进行建设性接触”，但未就是否执行引渡做出明确表态。

联合国此前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孟加拉在 2024 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5 日期间发生的反政府示威中，最多有 1400 人被杀、数千人受伤，其中大多数死于安全部队的枪击。这被认为是自 1971 年独立战争以来，孟加拉国最严重的一次政治暴力事件。

4、欧洲最高法院裁定各国需承认他国同性婚姻

欧盟最高法院 11 月 25 日裁定，在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合法缔结的同性婚姻，必须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得到承认，并谴责波兰拒绝承认两名本国公民在德国登记的婚姻。这对伴侣于 2018 年在柏林结婚，随后计划返回波兰定居，但波兰方面以本国法律不允许同性婚姻为由，拒绝承认这一婚姻关系。

在这项具有约束力的裁决中，法院认定，波兰的做法不仅侵犯了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也侵犯了对私人和家庭生活应予以尊重的基本权利。法院认为，当欧盟公民在某一成员国建立家庭生活，尤其是通过婚姻形式时，他们必须确信，在返回其原籍国时，能够继续这种家庭生活。与此同时，法院强调，该裁决并不要求成员国修改本国法律以允许同性婚姻。但法院补充说，各国在承认外国婚姻时，不得以歧视方式对待同性伴侣。

在以天主教为主的波兰，LGBTQ+ 群体长期面临法律障碍，同性婚姻和民事伴侣关系至今仍属非法。多年来，争取 LGBTQ+ 平权的努力一直被当权者描绘成一种危险的外来意识形态。由总理唐纳德·图斯克 (Donald Tusk) 领导的波兰现政府一直在推动一项规范民事伴侣关系的立法，其中包括同性伴侣。然而，由于执政联盟中保守派成员的反对，相关进展受到掣肘。波兰民族主义总统卡罗尔·纳夫罗茨基 (Karol Nawrocki) 则表示，他将否决“任何削弱宪法所保护的婚姻地位的法案”。

5、深圳易力声工人罢工，当局被迫释放被捕工人

2025 年 12 月 4 日，广东易力声（深圳）科技有限公司约 3000 名工人发起

罢工，抗议公司取消加班导致工资骤降，要求恢复加班以保障收入。工人表示，公司 10 月取消加班安排后，月实发工资降至不足 2000 元，低于深圳法定最低工资标准 2520 元，导致他们生活压力增大。

罢工当日，工人聚集厂门口，阻挡运输车辆，要求公司回应诉求。随着罢工持续，部分罢工工人于 12 月 9 日被捕。消息传出后，工人迅速围堵工厂大门，高喊口号要求释放同伴。迫于压力，警方最终在当晚释放了被捕工人。工人代表表示，警方释放被捕者的举动，体现了罢工行动部分取得成效。

公司随后向工人发出通知，称继续罢工者将被视为“自动离职且不予赔偿”，部分工人因此复工。然而，仍有大批工人坚持罢工。

易力声主要生产蓝牙耳机等电子产品，曾雇佣数万工人。近年来，由于国际贸易摩擦及全球产业链转移，公司缩减规模、削减开支。工人表示，公司取消加班制度表面符合法定工时，但实际上降低了工资，迫使员工离职而无需支付赔偿。

罢工前一天，公司还宣布对 12 月不加班员工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 200-300 元，工人认为远不足以维持生活，最终引发集体行动。

2018 年夏天，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工人曾因争取依法组建工会，揭露公司存在超时加班、苛刻罚款与欠薪等问题，引发维权行动，并得到左翼青年团体声援，但后遭到警方镇压。深圳易力声、佳士公司事件揭示了中国劳资矛盾与制度压力的深层问题。

6、智利极端保守派卡斯特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智利前国会议员、极端保守派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 (José Antonio Kast) 在 2025 年 12 月 14 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击败左翼候选人珍妮特·哈拉 (Jeannette Jara)，使智利在民主化 35 年后迎来最右翼的一届政府。根据计票结果，卡斯特获得 58.2% 的选票，他的对手则获得 41.8% 的选票。

卡斯特在同性婚姻与堕胎问题上持强硬保守立场，曾在过去两次竞选中遭到日益自由化的智利社会否定。但在博里奇 (Gabriel Boric) 执政期间，非法移民与有组织犯罪激增，引发广泛恐惧，成为此次选举的主导议题。卡斯特承诺以铁腕方式打击犯罪与非法移民，并振兴经济，但其共和党 (Republican Party) 在国会并未取得多数，未来施政势必面临谈判与妥协的压力。

7、黎智英被判违反国安法，勾结煽动罪成

2025 年 12 月 15 日，前香港媒体大亨、民主派人士黎智英 (Jimmy Lai) 在一宗标志性的国家安全审判案中被裁定有罪。

在审判中，检方指控黎智英与《苹果日报》高层及其他人士密谋，请求外国势力对香港或中国实施制裁或封锁，并从事其他敌对活动。检方特别提及他在 2019 年 7 月反送中运动高潮期间与美国前副总统迈克·彭斯 (Mike Pence) 及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Mike Pompeo) 会面。三位政府指定的法官裁定，78 岁的黎智英犯有与他人密谋与外国势力勾结以危害国家安全，

以及密谋发布煽动性文章等三项罪名全部成立。黎智英对所有指控均表示不认罪。

黎智英案是香港实施《国安法》后的首宗“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的审讯。黎智英案由三名指定法官杜丽冰、李运腾和李素兰审理，未设陪审团。

该案的有罪裁定受到了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的强烈谴责。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高级研究员黎恩灏对审讯的公平性提出质疑。他指出：“在一个由行政长官钦点法官审理特定案件、陪审团制度被取消、黎智英及其他被告被强制还押长达4年，以及亲政府力量曾公开批评法院保障黎智英程序公义决定的司法环境下，审讯结果几乎是注定的——法院几乎没有空间作出偏离北京意志的裁决。”

2020年8月，香港政府根据国家安全法将黎智英逮捕。自被捕以来，黎智英已被拘押5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处于单独监禁状态。2021年，警方突袭了黎智英创办的《苹果日报》新闻编辑室并逮捕多名高层管理人员，并冻结其资产，迫使这家长期批评北京和香港政府的媒体停刊。黎智英案的判决很可能让他的余生都在监狱中度过。

ABSTRACTS IN ENGLISH

INTERVIEWS

Will China Fall Behind Again? Democratic Capitalism and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enggang Xu / Tiancheng Wang

“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has never been a purely technological matter. It is a social phenomenon that requires an entire social system as its foundation—and that foundation is democratic capitalism,” said Professor Xu Chenggang, a leading Chinese economist and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Stanford Center on China’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Why have successiv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to date all first emerged in Western democratic countries? What factors give rise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s? Will China once again fall behind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center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at social problems might this emerging industrial revolution bring about? Compared with democratic capitalism, will authoritarian systems be at a disadvantage in addressing these social challenges?

On those questions, Tiancheng Wang, editor-in-chief of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conducted this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Xu Chenggang. Professor Xu is a prolific scholar; his most recent book is *The Institutional Genes of Totalitarianism*, published in 2025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s.

How Is Change Possible?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in China

Adam King / Yuxiu Li

“Political moments will inevitably come. However, if China’s civil society is unprepared, it may well miss those moments,” said Adam J. King, Director for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at the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For many years, Mr. King has worked with local partners in numerous countries across 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to promote civil society, elections, media freedom,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ethnic minorities, youth civic engagement, and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e has also served as an election observer in countries such as Bangladesh, Cambodia, Mongolia, and Timor-Leste.

Commissioned by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the young political scientist Li Yuxiu, based in London, conducted this transcontinental interview with Mr. King. Mr. King’s work has given him a rare vantage point from which to compare and refl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many Asian countries—China included. He believes that although civil society in China is severely constrained and extremely fragile, there remains substantial hope, an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be prepared to support China’s civil society.

“People Hope That Everything Can Change”

Marie Holzman / Kun Zhang

“Don’t worry—after I’m gone, go and ask for Mary’s help,” a Chinese exile once instructed his wife before his death. The “Mary” he referred to was Marie Holzman, a French-based specialist on China living in Paris, known in Chinese

as Zhiming Hou. Marie Holzman is a scholar, writer, journalist, and translator, and for many years served as a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Paris Diderot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Paris VII). Her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Chinese dissidents. Since 1995, she has been placed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blacklist and barred from entering China, a ban that has now lasted more than thirty years. In this interview, which spans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Professor Marie Holzman reflects on her thoughts and experiences at several critical moments, major events in the Chinese democratic movement that she encountered or witnessed, and the efforts she has participated in internationally to promote human rights in China. We thank Mr. Zhang Kun, PhD in history and based in Paris, for conducting this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Marie Holzman at the request of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This interview is part of the journal's series of conversations with leading international experts on China.

CONVERSATION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mmunity of Resistance

Kinman Chan, Ping Hu, Pin Lü, Aimei Zhang, Kuide Chen, and Qiang Wu

In the arduous struggle for freedom in non-democratic countries,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intellectuals see their primary responsibility as producing and disseminating knowledge and ideas, with speech as their basic mode of expression. This is, of course, not wrong. Yet speech is usually individual in nature, and the space in which it can be expressed is always quite limited. “The individual alone is not enough; there must also be collective action,” Václav Havel once said.

For this reason, we introduce here a concept for discussion—“the community of resistance”—in order to reconsider, to some extent, the role and positioning of

intellectuals. Within the scope of this discussion, a “community of resistance” involves linkages on two levels: among intellectuals themselves, and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broader social groups. For example, when it comes to the very small number of “sensitive” intellectual figures who dare to speak out and are punished by the authorities, should one make every effort to avoid them, or maintain contact and resist the authorities’ attempts to isolate dissenters? Or, when student protest movements like those of 1989 occur, should intellectuals act at most as “messengers” or “intermediarie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tudents, or should they join the protesting side and assume greater responsibility? In the Solidarity movement that led to Poland’s democratization, intellectuals early on established the Workers’ Defense Committee—might this form of linkage also be worth learning from for Chinese scholars?

Clearly, whether to form linkages or to sever them, whether to remain on the sidelines or to participate, are questions that those who yearn for freedom will confront in a very real way—questions that may have profound consequences. Is the “community of resistance” a valuable idea? How should its meaning be defined, and what kinds of goals can be set for it? How might such a community come into being? Is it possible—and if so, how—to begin from the immediate contexts of everyday life? What experiences from opposition movements in other countries are worth drawing upon?

On these questions,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has invited **Kinman Chan**, **Ping Hu**, **Aimei Zhang**, **Kuide Chen**, and **Qiang Wu** offer their views, forming this conversation.

SOCIETY AND POLITICS

Cultural Revolution Thinking: From the Anti-AB League Campaign and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to Land Refor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art I)

Zhidong Ha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in the last century caused the deaths of two million people and affected the lives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Such outcomes must have some fundamental reasons, one of which i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indset’, which continues to influence the behavior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 to varying degrees,” said Mr. Zhidong Hao, retired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This year, 2026, marks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launch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article is specially published our journal to commemorate one of the most absurd and crazy periods in China’s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to reflect on the tragic consequences caused by totalitarianism in China.

Totalitarianism and the Psychological Undercurrents of Its Formation Mechanisms: A New Definition and Analytical Perspective

Ben Xu

This year marks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launch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ommemoration, to promote reflection on totalitarianism, our journal specially publishes Prof. Ben Xu’s article.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latest research of a Belgian scholar - analyzing the core theory of Matthias Desmet’s “Psychology of Totalitarianism”, and specifically discusses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free-floating anxiety” and “mass formation” in the generation of totalitarianism.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otalitarianism does not only stem from external oppression or specific ideologies, but is a latent tendency rooted in the psycholog-

ical structure of modern individuals. In the contex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echnocratic bureaucracy, thi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reappears in the form of “expert rationality” and “algorithmic neutrality”, posing risks of ideological homogenization and suppression of dissent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preventing contemporary totalitarianism relies not only on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but also on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critical thinking,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an open space for public discourse.

How to Resolve the “Low Human Rights Advantage”: A Discussion with Mr. Hui Qin

Guanzhong James Wen

As thoroughly argued by Qin Hui in his new book *Saving Mr. De*, the one-sided promotion of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has instead provided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fulfillment of the parable of Honecker. Today, high-human-rights countries have ended one-dimensional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ut have not resumed the policy of linking 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with human rights. Instead, they have shifted towards tariffs. Qin Hui believes that tariffs are not a panacea. He is quite pessimistic about their prospects for advancing democrac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f tariffs can target low-human-rights entities that cause price distortions due to deviating from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n the imposition of such tariffs would not only be more justified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market system, thereby benefiting human rights and promoting democracy.

DEMOCRATIC TRANSITION

Elite Settlements in Taiwan

John Higley , Tong-yi Huang , and Tse-min Lin

Translated by Xingjian Xu

Taiwan's democratic transition has always been of interest to intellectuals in mainland China, but the attention has often been superficial, with a lack of detailed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process by which the transition took place. This article by John Higley, Tong-yi Huang, and Tse-min Lin focuses on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aiwan's transition, namely the role of elite reconciliation. The original article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9, Number 2, April 1998.

INSTITUTIONAL DESIGN

Financing Politics: A Global View

Michael Pinto-Duschinsky

Translated by Xiaoyi Yan

“Money and Politics” is an acute issue in many democratic countries, and one that China will face in its future democratization. This article by Michael Pinto-Duschinsky conduc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allenges and management of financing politics on a global scal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3, Number 4, October 2002.

BOOK REVIEW

Social Movements and Intellectuals as Mutual Creators: On Bozóki's Rolling Transition and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Yuxiu Li

The concept of “social movement intellectuals” was proposed by sociologist Ronald Eyerman from Yale University, originally referring to intellectuals who grew up within social movements and later promoted their development. However, in reality, social movement intellectuals may also emerge prior to social movements, meaning that social movements are not necessarily a prerequisite for the existence of social movement intellectuals.

NOTES

Global Events o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Zhengping Mi

《中国民主季刊》征稿启事

由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民主季刊》(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旨在为中文读者提供关于中国与世界的新观点、新知识，特别是关于中国政治、社会、民主转型的深入探讨。它注重现实性、学术性与可读性。敬请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美欧、澳洲等广泛地域范围以及比较政治、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学、历史等专业背景不同的专家学者不吝赐稿。

欢迎就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赐稿——

1. 关于中国重要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外交问题；
2. 关于中国民主转型可能前景、路径、风险、战略等问题；
3. 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转型过程、经验、教训；
4. 关于民主理论、宪法设计与民主建构；
5. 关于民族与国家性问题；
6. 新书与重要著作的推荐、评论。

投稿要求如下：

1. 稿件应为汉语。也欢迎用藏语、维吾尔语投稿，我们将协助译成汉语发表。来稿请标明篇名、关键词、摘要(不超过200字)、作者姓名及简介、联系方式。
2. 国内作者：由于是学术刊物，鼓励国内作者用实名，但出于安全考虑，国内作者基于自己的判断选择用笔名。
3. 稿件字数：论文，以5000-8000字为最适宜，建议不超过10000字；更长的文章可以考虑分期发表。书评，建议在2000-3000字之间。译作，建议在4000—10000字之间。
4. 来稿须符合写作规范要求，详细注释体例在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站上：
<https://chinademocrats.org/?p=24>。
5. 投稿邮箱：cjd@chinademocrats.org。您也可以通过此邮箱向我们提出选题策划、建议意见、咨询或者合作方案。
6. 《中国民主季刊》拟每年1月、4月、7月、10月中出版，截稿日期分别为每年3月1日，6月1日，9月1日与12月1日。
7. 稿件刊发后将按字数支付稿酬。

《中国民主季刊》订阅方式

How to Subscribe to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中国民主季刊》是电子出版物，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免费下载，也可以提供您的电子邮箱地址，我们免费通过电子邮件定期发送给您。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is an electronic publication that can be downloaded for free from our website, or you can provide your email address and we will send it to you periodically by email free of charge.

我们也印刷少量纸质版，以满足个人、机构、图书馆收藏需要。纸质版每期价格为 38 美元。

In addition, we print a small number of paper copies to meet the needs of individual, institutional, and library collections. Paper copies are available for \$38 per issue.

下载电子版：请登录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站 <https://chinademocrats.org/>。

To download an electronic copy: Please visit the China Institute for Democratic Transition website at <https://chinademocrats.org/>.

订阅电子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https://chinademocrats.org/?p=821> 或将您的电子邮箱发送至 cjd@chinademocrats.org。

To subscribe to the electronic edition: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s://chinademocrats.org/?p=821> or send your email address to cjd@chinademocrats.org.

订购纸质版：请电邮 cclassics1994@gmail.com 联系代理商 China Classics Inc.。

To order paper copies: Please contact our agent China Classics Inc. by email atcclassics1994@gmail.com , or by phone at 858 229 9677.

中国民主季刊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回顾历史，从晚清到当代，中国发生的、争取自由民主的每一次重要努力，知识分子都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务莫过于实现民主宪政，为此而探索、写作，以及传播相关的知识和思想，是知识分子的第一责任。



ISBN 979-8-9875925-0-2



9 798987 592502